

# 美国评论集

赵京

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文库 A-4

 中日美  
日米中 比较政策研究所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美国评论集

出版: Lulu Enterprises, 860 Aviation Parkway, Morristville, NC  
27560, USA

发行: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中  
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262 Altadena Cir. Bay Point, CA  
94565 USA. <http://cpri.tripod.com>  
[zhao.cpri@gmail.com](mailto:zhao.cpri@gmail.com)

字数: 约11万

第4版, 2017年1月4日

ISBN 国际书号: 978-1-257-43927-0

ISBN 978-1-257-43927-0 90000



## 序言

本书继我编辑的巴金译著《万塞蒂与沙珂的故事》、《一个安那祺主义者的狱中回忆》和《芝加哥的殉难者》，作为《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文库》美国部分第四册，收入我从1994年到2015年写成的相关论文，用语、观点略有变迁，但总的关注是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传统如何影响美国建构更加公平理性的社会自由秩序。2011年5月1日以《美国政治的安那祺主义传统》书名出版第一版；2013年12月6日出版第二版；2015年2月1日加入的当代评论与安那祺主义传统关联不太直接，突出美国政治中对社会自由的追求，第三版改名为《自由美国政治评论》；第四版加入6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改名《美国评论集》<http://cpri.tripod.com/cpr2017/americanreview.pdf>。

另外，我的《美日同盟及其与中国的互动》（2001年第三版，ISBN 978-0-557-06772-5）专注于美国的对外政策，《企业治理与社会责任 Corporate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 Social Responsibility》（2017年，ISBN 978-0-557-05663-7）专注于美国的公司治理，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Review (2009, ISBN: 978-0-557-04635-5)、《日米中：研究と評論》（2001年，ISBN 978-0-557-04475-7）包括对当代美国事务的英、日文评论，值得同时参阅。

赵京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2017年1月4日第四版

## 目 录

1. 新型领导性国家的出现
2. 帕森斯论近代诸社会形态的体系
3. 无政府主义对普遍政治自由的追求
4. 墨西哥革命的良知和灵魂：安那祺使徒理加图·佛罗里斯·马公
5. 美国工联主义的光与影
6. 二战期间伤亡最大的爆炸悲剧
7. 访美掠影
8. 海外华人神学政治随感
9. 美国校园里的社会主义活动
10. 正统老铺的美国社会主义劳动党
11. 战争状态下的恰巴斯（译文）
12. 作为外交政策的美国民主
13. 论恐怖主义
14. 劳动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15. 年轻的美国劳动党
16. 国际经济学的政治条件
17. 具有深远意义的美国反战运动
18. 库辛尼奇竞选总统宣言（译文）
19.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四日的反战游行
20. 美国期中选举以后的局势展望
21. 中美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困误
22. 为什么戈尔不再出马竞选美国总统
23. 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政治条件
24. 华尔街日报的政策取向

25. 瓦德·丘吉尔对西方和平主义政治的病理分析
26. 废除核武器的国际政治条件
27. 美国向何处去？
28. 美国能实现中东政策的转换吗？
29. 我平生的第一张政府投票
30. Re-define and Measure Unemployment in Japan, the U. S. and China
31. 四小时工作制与完全雇用
32. 乔姆斯基教授的局限性
33. 支持巴勒斯坦的联合国成员国地位
34. 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义者斯诺登
35. 作为文明开化程度衡量的国家机构的透明化与民主化
36. 美国海军海空陆特种兵队的战略使用
37.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治理的原点

## 1. 新型领导性国家的出现

日本的二月十一日是挂历上标出的红日子，是除上帝安排之外由国家（政府）制定的休息日。我不经意地留心到墙上的赤旗挂历<sup>1</sup>没有印上任何文字说明，立即想到十二月二十三日<sup>2</sup>在日本共产党的出版物中也没有解释。普通的挂历中没有注释出二月十一日是日本国家设立多久的纪念日，一般日本人也从来不去关心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两个日子（加上1994年的“皇太子御成婚”休息日）是日本民族文明未开化的象征，政府权力宁肯无视最基本的经济效益<sup>3</sup>也要把皇权观念强加在国民的身上，表明皇权虽然比过去改变了形象，仍是国家统治形式的不可缺少之一环。这种现象倒也并不是日本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挂历的七月一日、八月一日也是如此。为什么某一个人、某一政党、某一军队的纪念日要强迫全体国民的敬礼呢？<sup>4</sup>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是文明世界热闹地欢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纪念日，但同时传来了截然相反的非难，这种非难在它足以强大到被文明社会听到之前已经呻吟了五百年。实际上，每一个真正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都不是一种僵化的结局，而是除了归结至此为止的历史外，同时还必须随着年月的增长而显出当初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的本质。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sup>5</sup>即是这样的日子，首先，它是自从哥伦布登陆以来的欧洲殖民历史的归结；其次，它是人类在西半球出现的新型的以近代国家形态组织社会生活的先导。

---

<sup>1</sup>我订阅了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刊，在喧哗的日本社会中时常可以听到一贯的、几乎是相反的声音，这是一种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生活中的独立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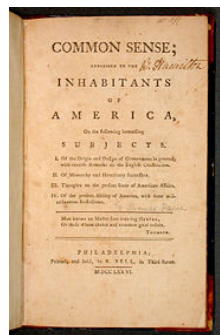
<sup>2</sup>日本“平成天皇”的生日，当然，它不同于“昭和天皇”的生日。

<sup>3</sup>一年工作日大约为两百天，休息三天大约直接损失1.5%。

<sup>4</sup>倒是很有理由向国民提议设立一个每天都存在纪念日：个人生日纪念日。闰月二十九日出生者可调为三月一日，当天有紧要工作者可以自行调整（一周内有效）。

<sup>5</sup>请注意：我们并不特别在意具体的天日，因为一个运动总是要经历过一定的时间，定出某一天来只是为了记忆的方便。

时常可以听到“美国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论调，表白出文化优越论者的政治（国家）判断偏见。“我们看到作家们不太注意社会与政府的不同或干脆把两者混为一体，此两者不但有别，连起源也不相同。社会产生于人们的需要、政府产生于人们的罪过；前者积极促进我们的爱情、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只能通过消极地抑制我们的恶行来保护我们的幸福；前者鼓励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后者造成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总之，前者是保护神，后者是对人类的处罚。/社会在各种场合施与恩惠，政府在最善的场合也只是恶之必须。……喜欢把英国说成是由国王、贵族院、平民院构成的政府，只是基于国民自负而不是理性的偏见。确实，从每一个人的立场来看，不可否认在英国比在别处安全，但无论英法，国王的意志都是国家的法律，两国的区别仅在于：英国的法律并不是直接从国王的口中发出的，而是以议会的庄严形式向国民公布的。……英国的国王不象土耳其的那样残暴，并不是政府的构成方式不同，而是因为国民性格的差异。”（插图）<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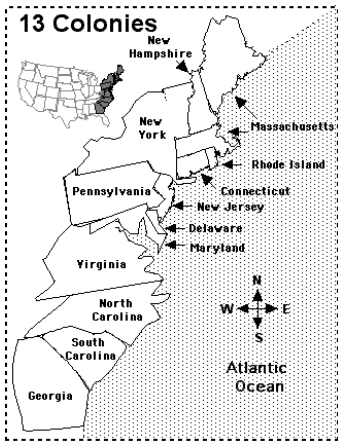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建成的政府，才是对人类历史的继承，《独立宣言》正是人类反省自身组织形态（特别是社会契约论与人权论）的结晶：“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人在造物主面前生而平等、被授予了包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等不可让渡的权利；为了确保这些权利、人们成立政府授予其经过被统治者同意的正当权力；当任何政府践踏了这一目的时，人民有权利废除旧政府设立新政府、基于最符合实现人民安全与幸福的原理改造政府基础、改变权力形式。当然，实际上我们很明白，没有理由地或者只是基于一时理由而改废长年统治的政府，是不合适的。所以，至今为止的历史中，人们与其废止习惯熟悉的政府而重新设立政府，还不如尽力忍受那些可

<sup>6</sup>托马斯·潘恩：《常识》，1766年1月10日。此文出版后三个月即发行十二万部，极大地影响了独立意志的形成。引自大下尚一等编《美国史料：1584—1988年》，有斐阁版，1989年10月。

以容忍的政府弊端而维持政府。/但是，当我们在一个政府之下看到权力乱用专横、人民不断被置于绝对专制时，推翻这样的政府、为了确保将来的安全而树立新政府，就不仅是人民的权利又是人民的义务。美洲殖民地正是一直忍受着这样的状态，基于以上的理由现在不得不改变旧的政府机构了。”<sup>7</sup>

与大不列颠、法兰西产生出的思想家相比，新兴的美国伴随着大量近代市民的产生，最著名的当推富兰克林（1706—1790年）。在他的《自传》中，我们从一个只读过两年书的印刷徒工变为出版商、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慈善家、外交官、名著作家、音乐家甚至巴黎社交界名人的生涯，看到一个不同于欧洲民族的新的世界文明一员的诞生。在这里，无论你出身多么低微，没有社会的不平等制度阻碍你爬上可以与君主平起平坐的地位。当我们读到内森·黑尔的故事：

“我遗憾不能第二次为祖国献身”，曾深为向往。他们追求树立的不是旧有的政府形态，而是国民可以决定国家命运进而主动为祖国服务的那样一种新型政府。



如果仅仅从政治权力（更不用提军事战斗）的意义上看，美国的独立本身尚不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独立胜利后（1783年）十三个州的面积只有89万平方哩（不足今天国土的四分之一），50万人口中据说有三分之一的忠诚英国的王党派、三分之一的观望

派，独立的意志尚需在外延（向西部扩张）和内涵（制度的确立）方面进一步展开。首先，在获得独立的十三个州之间会形成什么样的联合体呢？以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者看出了新生美国的未来面临着威胁到其独立理念的自由的危机，独立胜利之后的

<sup>7</sup> 《独立宣言》，大下尚一等编《美国史料：1584—1988年》，有斐阁版，1989年10月。



松散联盟如此放置下去，就会形成十三个（或合并为三、四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必然会重复在欧洲大陆上发生过的争斗历史。一七八一年三月终于通过的《联邦规约》<sup>8</sup>只是在第一条“联邦定名为美利坚合众国”（此国名也来自于潘恩）中赋予了宪法的雏形，但紧接着第二条“各州保持主权、自由、独立以及此规约中没有明文委让给联邦会议的所有权能、领域及权利。”连课税和通商统制权都没有的这个联邦政府，在联邦主义者看来，无疑将步希腊（雅典、斯巴达）式联盟的后尘而溃散。实际上，独立胜利后不久，当各州开始显示出独立主权国家的统治本性时，就发生了谢司大尉起义那样的叛乱冲突（起因于由波士顿商人控制的马萨诸塞州政府压迫农民的反动政策）。这督促联邦会议在费城召开全国会议（1787年5月），拟定修改实行八年之久的《联邦规约》，但代表们经过近三个月的秘密讨论，最终认识到必须彻底否定这个规约，这次会议就成了制宪会议。

这是一部崭新的宪法并沿用至今，第一条“第一项 本宪法所授予之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与众议院组成之合众国国会。”“第八项 国会拥有以下权力：赋课并征收直接税、间接税、输入税与国产税；偿付国债，并供应合众国之共同防务与一般福利经费；惟各种税收、输入税与国产税应全国划一；以合众国之信用借贷款项；规定合众国与外国，各州间及与印第安种族间之贸易；制定全国一律之归化条例及破产法；铸造货币、规定国币及外币之价格，并规定度量衡之标准；……宣战，……征集陆军并供应给养，……”“第十项 任何州均不得缔结条约、结盟或加入联盟；不得颁发捕押及报复性扣押外国船只之许可证；不得铸造货币；不得发行纸币；不得使用金银币以外之物偿还债务；不得通过公权褫夺令、追溯既往之法律或损害契约义

---

<sup>8</sup> 《联邦规约》（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大下尚一等编《美国史料：1584—1988年》，有斐阁版，1989年10月。《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0年6月。程译版本的一些用词似乎不太合适：如“联邦党人”给人一种误解似乎联邦主义者组成了严密的政党，把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译为邦联条款或邦联条例，以及“美国邦联国会”这样的译词、条文中的定语位置不准确等等。在中文里区分出“联邦”与“邦联”是无益的，会引起理解上的迷惑。

务之法律；不得授予贵族爵位。/未经国会同意，无论何州均不得对进口或出口课税，……不得在和平时期建立或建造战舰，不得与他州或外国缔结协约或盟约，除在实际受到侵略或在刻不容缓之危机情况下，不得进行战争。”第二条“第一项 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任期四年，副总统任期亦为四年。”“第二项 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并统辖为合众国服役而征调之各州民兵；”第三条“第一项 合众国之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规定设置之下级法院。”第四条“第二项 每州公民均得享受各州公民享有之一切特权与豁免权。”<sup>9</sup>

新宪法体现了以代议制为基础的联邦民主·共和制度，作为世界最初的成文宪法，除了总结至此为止的一般原则外，它明显的优越性在于根据具体情况，并不只是把各州的权力集中起来，而是通过政治制度的统一实现国内的安宁、促进经济繁荣、进一步保障个人权益。为了新宪法的生效必须获得十三个州中九个以上州的同意，联邦主义者汉密尔顿等人在纽约报刊上共同以 Publius 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论推动各州批推新宪法，成为今天为止的对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联邦政府所依据的原则的精辟说明。“一个牢固的联邦，对于各州的和平与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分裂和叛乱的障碍。在阅读希腊和意大利一些小共和国的历史时，对于一直使它们不安的骚动，以及使它们永远摇摆于暴政和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极端之间连续不断的革命，没有恐怖和厌恶的感觉是不可能的。”<sup>10</sup>联邦主义者厌恶这种引发党争的“纯粹民主政体”（由少数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而提倡第一、政府委托给由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精英；第二、能管辖较多公民人数、较大国土范围的代议制共和政体。

随后的合众国历史展开证明了联邦主义者的远见，具有国家主权性质的联邦符合合众国向中部、北部、南部、以至到达太平洋沿岸的

---

<sup>9</sup>《联邦党人文集》附录。此处略为冗长地引用，确是因为此宪法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法律的革命性。

<sup>10</sup>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九篇。总的说来，文集自身没有多少原则性的创造值得直接引用，今日看来，它叙述的多是自明的道理。

西部的扩张，并延续一个多世纪才为世界明确意识到它的君临整个新大陆的“门罗主义”（源于一八二三年的门罗宣言）。“我们的地位要求我们，我们的利益也促使我们要在美洲事务的制度上力争上游。……非洲、亚洲和美洲相继感到欧洲的统治。欧洲长期保持的优势，诱使它想自诩为全世界的主人，而且认为其余的人类都是为它的利益而创造的。……维护人类的荣誉，教育那个傲慢的弟兄谦虚一点，就是我们的事情了。联邦会使我们做到这一点。”（第十一篇 汉密尔顿）。在十八世纪后期的时代环境，既然美洲获得独立的十三个自由州有着共同的命运，而旧的联邦“立法原则是以各州或各州政府的共同的或集体的权能为单位，而不是以它们包含的各个个人为单位。”（第十五篇 汉密尔顿）。使新的联邦的立法原则尽可能地直接基于十三个州的所有个人之上，必然要求集中实际上分散在各州中的主权。更重要的，与卢梭设计小国共和理想时不同的，即将到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sup>11</sup>交通、通讯网的发达支持了在一个大国中保障民主自由的物质条件；比起防务、外交等明显的优势外，财务（税收、金融等）业务是政府行政中最关系到国民生活的制度保证。具有国家主权的联邦政府可以提供负担最轻的行政职权，遏止国家权力在各个州中的不必要的扩张。<sup>12</sup>

联邦主义者作为天赋人权与三权分立论的信徒，竭力捍卫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防止统治者压迫甚至力图保护少数部分受到多数部分欺压的宪法，“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然后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因此，人民的权利就有了双重保障。两种政府将互相控制，同时各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

---

<sup>11</sup>宪法第一条第八项国会权力中颇有先见之明：“设立邮局并开辟邮路；为促进科学与应用技艺之发展，给予作家及发明家保证其作品及发明在限度期间内之专利权”。汉密尔顿作为第一任财务大臣，深知带动英国强盛的工、商业的国家效益。

<sup>12</sup>在近代的以主权全能性为特征的国民国家时代里，似乎并没有关于合适规模的普遍法则。例如，两百多万人口的新加坡城从一千多万人口的马来西亚分离出来被证明是明智的，六百多万人口的香港却没有独立的可能。

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第五十一篇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当然，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由于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可能认识到任何政府都必然带有的代表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性格。一八九三年美国经济陷入萧条时期爆发了使芝加哥以西的铁道瘫痪的罢工，伊利诺斯州长 Altgelt 同情工人，但总统 Cleveland 却在资方的要求下派出两千名联邦军队，以罢工妨碍联邦的邮政运输为由镇压工人，联邦法院也下达命令禁止罢工。更不用提，一般情况下分权的各级权力总是互相勾结，即使在发生冲突时也总是利用一部分社会集团对抗另一部分社会集团、使民众遭受最大的牺牲。

回省中国的现代史，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大统治集团分裂国家带来民众受难的历史，抛去情感来观察，谁都会看出北京和台北两个政府为了统治权力维持几百万、几十万常备军，不仅是对全体中国民众的经济负担而且直接形成对各自地区民众的政治压迫。<sup>13</sup>美国宪法并没有禁止三选总统，无论是联邦主义者还是反对派都支持华盛顿的再选，但华盛顿不为所动。当巴不得邓小平引退自己好顶替那巨大权力职位的赵紫阳口是心非地请求邓继续做“总设计师”时，他当然比任何人都明白：邓所代表的那批把邓拥上皇权因而在皇恩下压迫国民的势力远远大于那些祈求邓小平效仿华盛顿的良好心愿。这里显示的只

---

<sup>13</sup>1994年12月在台湾实行了有史以来的省市行政首脑的直接选举，达到了日本目前的地方自治的民主水准（在金钱收买选票上比日本更甚），如果在中国也普遍地达到台湾那样的地方自治程度，即中央行政权力由直选的议会选举产生，省以下的地方行政权力、各级议会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台湾还有什么理由非要独立、获得主权不可呢？独立台湾主权唯一的好处只是为台湾地区的统治集团多提供一些以“总统”为首的官权利益、从而加重民众负担而已。顺便再论及将由九六年三月实行的“中华民族历史上台湾地区的第一任总统直选”，令人担心的是，已经担任过两届“总统”并宣示过不再争取连任的李登辉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有可能再次贪恋权位、引发台湾的复杂党争危及民众的安全。因为任何为谋取统治权位而不惜违背基本道德的“民众请求”都是赤裸裸的政治野心。早就宣称在八五年要引退的邓小平以“遭到一片反对之声”为借口死抱皇权不放，导致以后十年全中国、全世界都为他一条性命而恐惧不安。他越近临终，其家族、亲信越拼命捞取一切资本，其行径使中华民族的民主进程昙花一现，蒙上了耻辱。

是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的进步或开化水准不同，而不是华盛顿与邓小平的个人品质差异。

尽管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宪法，联邦主义者还特别强调：“古代政治制度与美国政府的真正区别，在于美国政府完全排除作为集体身份存在的人民，而并不在于古代政治制度中完全排除人民的某些代表。”（第六十三篇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今天的读者读到这里甚至会感到惊诧，作者口口声声的人民、美国国民，并不是指我们理解的可以平等地享受人权保障的每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土地上的居民。首先，包括联邦主义者在内的、始终牢牢掌握自独立战争以来控制权的



精英集团完全没有把原住民印地安族视为平等的人类，美国扩张的历史就是征服、掠夺甚至灭绝其他种族的血腥的记录。其次，虽然从十七、十八世纪在美洲确立奴隶制就存在着反对的声音和

势力，<sup>14</sup>但独立战争终究没有导致废除奴隶制的社会革命，“实际情况是，奴隶兼有这两种性质：我们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把他们当作人，在其他方面又把他们当作财产。”“把他们的地位降到自由居民的同等水平之下；……认为奴隶是占人的五分之二的人。”（第五十四篇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由奴隶制度引起的社会冲突终于由布朗于一八五九年十月十六日用暴力行动点明了：只有用血才能洗净这个国度的奴隶制罪恶（插图）。这是美国社会的先知使者，但美国没有足够的良知接受、听取来自上帝的预言，导致后来持续四年的美国历史上的唯一内战。当林肯总统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开始公布《奴隶解放宣言》时，内战的性格变为美国历史上的社会革命，为美国的民主传统加上最缺欠的进步性格。《奴隶解放宣言》不仅仅只是解放几百万黑人奴隶的人身，更进一步推动美国社会的制度改革为随后到来的

---

<sup>14</sup>如波士顿的 S. Sewall 在 1700 年论奴隶制的反自然性文论。当然，最高的杰作是《汤姆大叔的小屋》，与它相比，连美国宪法也显得苍白！

大规模产业革命，为美国最终成长为现代化强国领导世界事务提供了基础。<sup>15</sup>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生效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第一项 合众国境内或属合众国管辖地方之内，不准有奴隶制或强迫劳役存在，惟用以对合法治罪之罪犯作为惩罚不在此限。”经过惨重的代价增加了人类经验。半个多世纪以后，《宪法修正案》第十九条又加入“第一项 合众国或各州不得因性别而拒绝或限制合众国公民之投票权。”<sup>16</sup>我们再进一步注意《宪法修正案》中的主要内容，如第一条“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力。”第四条“人民之人身、住房、文件与财产，不受无理搜查与剥夺之权利不得侵犯，且除非依据宣誓或代誓宣告证明之一定理由，并开列所须搜查之地点与所须扣押之个人与物品者外，不得颁发拘捕扣押状。”等等，都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在制宪会议里未能列入的人权法案内容。<sup>17</sup>联邦主义者错误地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宪法中没有授权政府可以侵犯人权；其实不然，政府的职责之一，正是保障人权，如不加以成文化（以及相应的可类推化），政权决不会自主地善意发挥宪法精神为国民服务。实际上，宪法的制定者与执行者都出身于相同的统治集团，如汉密尔顿随后立即担当了第一任财务长官，必然会推行一套更多代表商业、金融资本阶级的政策。

与欧洲的历史展开相比，美国社会内部没有突显出尤其因为巨大的经济不平等而导致的社会对立，没有显示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力

---

<sup>15</sup>正如美国历史需要废除奴隶制的内战、废除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来保障发展其独立建国的精神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必然在自下而上的不断社会革命中才能保证中国革命的基本价值和成果（平等、独立等）不被统治集团出卖或葬送干净。

<sup>16</sup>妇女权利运动基本上与废奴运动同时开展，但在美国的达成却较北欧为迟。

<sup>17</sup>笔者自从1995年底逃来美国，参与各种进步政治组织的活动，被联邦调查局FBI收集了不少材料。所幸有这一类人权法案，美国行政当局不敢为所欲为，没有（像日本秘密警察那样）直接“拜访”到我的家门来（2008年12月补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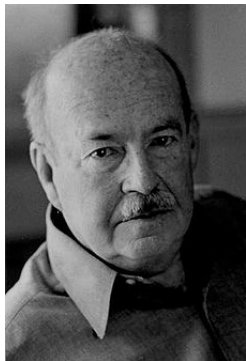
量，这主要是因为在不断开拓扩张中，全体国民的生活有所提高、劳资的矛盾被淡化成可以调和的性质，或转移到种族冲突等方面去了。在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富豪认为财富集中为天经地义的同时，也想到财富并不能由自己带走，或家族独自享受，还要尽到“适当分配财富”的教徒职责，还要从事文化、教育、和平、慈善等社会事业；同时，占主流地位的美国工人总同盟现实地把工会的目的专注于经济要求：“既然我们生活在工资制度下，只要这个制度还存续，对于工人来讲，不断增加到手的分配，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使命是保护现在的工资劳动者，即提高他们的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工厂的安全和卫生条件……”<sup>18</sup>削弱了社会主义在美国工人中的影响，不同于在欧洲兴起的轰轰烈烈的以政治目的为主导的经济斗争。

[1995年2月19日，静冈县三岛市]

---

<sup>18</sup>美国工人总同盟会长 S. Gompers 的发言（1886—1924 年期间），引自大下尚一等编《美国史料》（日文）。

## 2. 帕森斯论近代诸社会形态之系统



自韦伯以来执社会学界牛耳的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T. Parsons, 1902-1979年）力著的题目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不易译为中文。modern 这个词日本人译为“近代的”，中文一般译为“现代”，不过此书主要论及大战之前的欧美社会，按内容译为“近代”较合适；system 这个词，日本人几乎用片假名音译，中文译为“系统”还得靠科普性读物（如《走向未来》丛书）的推销，带有“社会系统”的含义，按此书的内容，可理解为“形态”、“关系”。所以笔者把此书译为：近代诸社会形态之系统，总算克服了语义上的难关。在全书序文和第一章序论，作者强调这个题目本身是何等地重要，以及社会一词要用复数来表示。这种强调在社会科学中是不正常的，由此可以理解以下的事实：第一，超国家的社会系统并不一定构成复数社会形态；第二，近代各社会形态的成立并不是无规律可循，而有一个明瞭可视的统一体系，其中的各单位既互相分离有互相依存（当然，这里所提的依存也包括冲突与纷争）。

此书是帕森斯为“现代社会学基础丛书”（17册，英克尔斯主编）所撰写的第二册读本。帕森斯本来已经为丛书出版了《以进化与比较的角度看社会形态》（*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涉及时代较广，但限于篇幅却无法对近代社会展开其得意的 AGIL 图式说明，只好又加上此书独立成册，也表明了帕森斯在当代的影响。实际上，正如英克尔斯（此丛书第一册《社会学是什么》即为其所撰，已被译为中文）在“编者按”中指出的那样：战后二十年来社会学（主要在美国）作为一门实证科学（以社会调查等方法论的革新为标志）迅速发展，已经不可能由一本书来包容了，而是一套丛书来描述社学的全貌，其中心线索就是社会系统



论，而研究的视角多样化表明了社会学的成熟（虽然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

为什么近代社会形态只出现在西方（指地中海以北的西罗马帝国之后的基督教世界）和除了殖民地或全盘西化的日本（帕森斯并不太了解日本）？是否还有别的途径达到现代化？这些是此书的命题。正如摩尔根（1818-1881年）解明了古代社会里人类进化的机制，帕森斯把经过数世纪的复杂过程而达成的近代各社会形态的系统也看成是人类进化中的一个重要飞跃。那么，近代各社会形态比别的各社会形态适应能力优越，且又只出现在西欧，是否带有文化偏见呢？不，帕森斯认为：（1）社会形态的适应能力并不是人类价值的至上目的，（2）将来的社会进化展开有可能出现在西欧以外的社会文化中（帕森斯可能对苏联留有余地，对中国却很无知），（3）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会促进社会的变革。

正如康德、孔德、马克思这些思想大师在展开他们理论的同时被迫制造新的概念（术语）或方法论一样，帕森斯在第2章“理论的指导”中以近五分之一的篇幅概略其在《以进化与比较的角度看社会形态》中详细展开的方法论，抽象地说明成功地达到近代市民社会的西欧，其社会行为（另一个帕森斯术语！）之下的四个体系（机能）：社会（统合），文化（平衡），性格（目标），行为有机体（适应）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浸透）比别的社会形态（如古代犹太社会，古希腊社会）更适宜进化。现在看来，帕森斯的方法论（以及术语）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一方面因为社会本身并不是非用帕森斯术语不可观察，另一方面也表明其方法论的欠缺。例如他很琐碎地用洗衣机的例子说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性（cybernetics，原意为掌舵，现多译为控制），使社会学人士们很苦恼。如果略知一些电子线路，计算机原理的知识，可有助于理解。其实，维纳（控制论），申农（信息论），贝塔朗菲（系统论）已经提供了更科学的方法论，我们到也没有必要责怪帕森斯，借用“扬弃”这个词，更该要求自己能有新的体系容纳前人的理论成果。

一般的法学理论倾向于把法的规范有效性归于国民合意认同，把法赋予道德的基础，但是很明显，道德并不直接构成法律，现实的法律勿宁说有不少是直接违反普通生活道德的。帕森斯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视角说明法律的正当性的同时也承认法律中必然含有的罪恶性（支配），“实际上，政府对军队、警察暴力的独占，已经成为衡量一个机能高度分化社会的统合程度的主要尺度。不仅如此，为了达成集团的总体目标，只有政府才被授予（实际是强夺）达成集团总体目标的行动资格，任何胆大地妄想从事这个职能的机构，实际上就发起了革命。”不过作为韦伯的忠实继承者，帕森斯本人也不愿进行“价值判断”，自从杜尔凯姆的《社会分业》以来，从事社会学（以及其他任何学科）行业的人都明白其自身在现代高度分化社会中所可能占有的地位是多么的渺小可怜，再不会出现圣西门那样的天才来规划社会未来了。

克服方法论的艰深，接触到具体的历史论证，就可以吸取许多新颖的知识和见解。不同于今天的美国社会学界（只知美国不知有世界），帕森斯去欧洲接受了严格的欧洲式“教养”，在第三章“近代社会形态之前的社会基础”，第四章“近代社会系统的最初结晶”中充分显示了令其同行们叹为观止的宏厚功底，特别受韦伯的启示，对宗教（天主教与新教）的结构与功能作了出色的阐述。“广义地讲，基督教的社会组织成为古代西欧社会与近代社会之间的主要桥梁。不过，为了促使社会进化顺利地展开，基督教还需要有效地连接世俗社会的战略据点，这样的据点，按韦伯所强调的那样，由欧洲的都市共



同体提供了。”<sup>19</sup>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都是在这样的图式中以获得新的诠释（完全不同于我们接受的“黑暗的中世纪”之类的教条），以至于帕森斯宁愿认定十七世纪与宗教关联的社会共同体内的规范化展开，而不是十八世纪的民主主义或产业革命，带来了近代各社会形态的开端。

不用提，这种进化的典型就是英国。十七世纪末英国在欧洲社会系统中成为最高度机能分化的社会，超过了以前的任何社会形态：

（1）新教公认教会制度（英国国教会）容忍多教派存在，打破了欧洲传统的宗教、政府与社会共同体“三位一体的形态；（2）英国社会中形成了关于宗教、科学、哲学等一般理性知识的共识，培养了牛顿、洛克那样的思想家（与此同时，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天主教传统的地方还在拼命封杀异端，如烧死布鲁诺）；（3）社会共同体（主要指具有代议制功能的各种组织，构成下院议会的基础）与政府组织间的机能分化促进了国民国家的确立；（4）英国的普通法（或译为习惯法）比别的欧洲大陆法系更明确地区分出诸如政府的义务、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地位、国王大臣的权限等等。所有这些都初步确立了近代社会之基础——市民权，为产业革命的展开准备了适当的社会基础。产业、商业界坐收政府与议会之争的渔夫之利，终于达成亚当·密斯追求的“自由放任”之最佳经济环境。

市民权的确立除了“群己权限”（严复语）的区分之外（主要指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还必须通过获得普选权（一人一票，秘密投票）来从制度上获得保证，这一阶段的展开最终由法国大革命来达成，宣告了近代社会形态在西欧的胜利（第5章“社会矛盾与革命的解决”）。对于英国（产业）革命的理论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但英国人喜欢说，法国大革命死了那些多人不如英国“光荣革命”高明。联想起中国与苏联的变革，前者更符合英国革命的过程（所以香港的转换如此引人注目），持不同政见势力（社会改进运动）以监禁、流

---

<sup>19</sup>插图为意大利画家 Ambrogio Lorenzetti (1290 - 1348) 作壁画, Peaceful City, Effects of Good Government on Town and Country.

放为归宿，中共的专制权利也被迫只紧抱行政强权，坐收渔夫之利的是经济界、宗教界与地方势力……。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法国大革命才确立了近代社会形态的政治原则（如人权宣言，平等自由），也保证不彻底的英国式革命不至于被葬送。那么，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归宿，也只有在达成了这些基本原则后才能说：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为了“改善党的领导”（“改善”的目的在于坚持，如果不能坚持的话，“改善”也是多余的装饰了），而是为了把约占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纳入现代世界的社会形态中，我们没有理由、没有必要嘲笑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这个民族如果没有核武器的话，恐怕早被瓜分了）。中华民族自身至今并没有获得一些最基本的现代社会市民权（如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

此书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述美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达成了广泛的制度化自由（第6章“新型领导国家与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指出在市民权确立的最终阶段的展开——福利社会的实现方面，美国实际上比别的国家更符合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特别是教育革命，彻底改观了过去社会中的不平等构造。帕森斯对于非西欧、非殖民地而达成现代化的日本抱很大的（文化）期待，预言日本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第7章“对立文化的出现”）。当然，论及教育（学历）与社会形态的关系，日本是最佳的分析样本。笔者曾进行过定量的分析，<sup>20</sup>这里只想提及：教育在促进社会平等的同时，又成为新的不平等的中转机构，教育机构（主要是大学）本身也构成并不民主的国家权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帕森斯的系统方法论忽视了外部条件的作用，因为日本的现代化离不开殖民战争的掠夺、离不开亚洲受难的历史。再看整个西方，连苏联的强权也离不开世界霸权，但内部独裁（特别是独裁政党内的选任危机）阻碍了苏联成为现代化的社会形态。期待中国向苏联的挑战会迫使苏联认识到与西方在文化上的共同性而转向西方，明显地表明了帕森斯理论在地域上的局限性。虽然，他可能是受黑格尔的观念论影响，力图审视全部社会进化史的最后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了。

---

<sup>20</sup>笔者大阪大学硕士论文“社会地位的测定与阶层构造的分析”（日文）。

墨顿从方法论上声明社会学最多只能从事“中范围理论”的研究，实际在学术界却越不出“小范围”的实证考据。最权威的《美国社会学评论》上，没有数据表格就不会得到发表，各种社会学学会也首先优遇那些带计算机运用的论文，在普通的学会上，整个会场的气氛都近乎平庸地津津有味地争论那些属于手稿阶段的技术枝节，“最权威”的社会学者其实不过是（按照一定的操作规范）占据了权威大学的社会学讲座位子，更容易靠近权势（政府、新闻媒介）罢了。而且，这些构成社会学（以及任何其他学科）正统权威的势力实际上已经从制度上阻碍了无权势，无职业的马克思、孔德那些的思想家来重新规划社会，重新创建有生命力的社会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如果社会学在它逐渐成长（增大对社会，对政府的发言权）的同时必然地堕落为政府权力的可怜的附庸的现实是不可救药的话，社会历史本身却呼唤着新的人类知性的产生。让我们共同去追求真理，期待着新社会哲学的到来吧！

[1994年6月发表于美国《民主中国》]

### 3. 无政府主义对普遍政治自由的追求

自由似乎是美国的专利，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于普遍自由却是相当苛刻的、压制的。在美国的“建国之父”中，最常被提及的是将军、商人、律师和政治家，出身低微的托马斯·潘恩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实际上，比起绝大多数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逃税）而签署独立宣言的富贵人物，只有潘恩通过他的《常识》等简明扼要的宣传才使得“并非不可能”的美国独立愿望成为不可避免、无可阻挡的现实要求。独立后的美国却阻挠潘恩返回美国，表明美国的现实政治制度对于“建国之父”也并不是自由的，更不用说对于黑人奴隶和没有选举权的妇女了。实际上，美国的自由是在美国独立以后伴随着各种斗争逐渐扩展并巩固的：除了广为人知的内战（南北战争）、民权运动外，至今受到压制的无政府主义也贡献巨大并做出了非凡的牺牲。

无政府主义对于美国自由的激励当然以 1887 年 11 月芝加哥“干草市场”（Haymarket）广场惨案为顶峰，并且永不衰退。那些被无辜绞死的无政府主义烈士宣告了美国司法制度对自由的践踏，同时也教育了后起的自由主义者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对美国司法制度表现出极大的蔑视<sup>21</sup>。这些自由主义者中最著名的是移民自俄罗斯的犹



太人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柏克曼和爱玛·古尔德曼（右插图）。



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活跃着许多无政府主义的移民团体，但直到 1892 年 5 月发生在匹兹堡的数千名卡内基钢铁公

<sup>21</sup>在绞刑架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宣告：“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与西方文明之父之一苏格拉底的命运相同。参见《安那祺主义文库》A-3《芝加哥的殉难者》中巴金译出“绞刑架前”等殉难者留言。

司工人罢工才把柏克曼和“赤恶爱玛”推向了全美乃至世界斗争舞台。为了筹款，爱玛不惜出卖肉体，而柏克曼的廉价手枪未能置卡内基公司总裁于死地，也使自己幸免于死刑（左插图）。

比起在爱玛影响下铤而走险枪杀麦肯莱总统的无政府主义者 Czoglosz，柏克曼认为自己的行动更符合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经济利益斗争中采取直接的行动“宣传”）。从原则上讲，无政府主义既然以废除所有强制支配形式（其顶点是国家权力）为志向，也就自然地当以和平为手段。而且，在美国这样的实行初步民主（选举）的国度中，总统只不过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他们的个人人身不值得成为斗争的对象。然而，这也不能绝对地排除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以牺牲个人去“替天行道”。例如，刺杀沙皇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个体，同时也是整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目标。这个理由其实很简明：比较起后来的俄国内战、“阶级斗争”、“肃反”等大规模暴力事件来，刺杀统治阶级最高执行者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或代价甚微，而道德感召力更大。事实上，没有刺杀沙皇的壮举就不会有俄国革命的开端。

柏克曼和爱玛的热血应该说比较接近以上刺杀沙皇的道理。那个接替卡内基担任公司总裁的“无名之徒”（按照爱玛的话说，这家伙居然成为英雄柏克曼下手的目标，真是三生有幸）有权直接决定数千名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小的经济命运，他把工人们全部解雇并赶出了工人住宅。这一切必须受到正义的制裁，同时也警告整个贪婪无厌的美国资产阶级。既然美国政治制度不可能执行这种正义，柏克曼“以身试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柏克曼特别慎重以免误伤其他任何人，任自己被警卫毒打也不还手。

他们认为自己是“自作自受”，政府不应该由此迫害没有直接参与行动的其他无政府主义者，表现出无政府主义者一贯的善良天性，同时也暴露出其政治弱点。实际的情况是：直到今天，美国政府除了对美国公民的压制外，对每一个进入美国的移民如同对纳粹分子、恐怖分子一样，一律警告说：无政府主义者不得入内！当然，任何选择

无政府主义理想的人，谁会责怪那些被送上绞刑架、送进监狱的同志“连累”了自己呢？<sup>22</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对立已久的两大潮流——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克鲁包特金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自杀，促成了列宁—托洛茨基共产主义派别的兴起与胜利。在美国受到压迫的无政府主义此时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反对美国参战。柏克曼和爱玛等在战争期间被投入监狱并于“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结束后被驱逐出他们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美国<sup>23</sup>，再次证明美国的所谓自由，并不如其宪法所宣称的：“保护所有身在美国的人”。<sup>24</sup>

柏克曼和爱玛在美国监狱中，已经接收到关于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的报告，但他们坚持为布尔什维克辩护，认为在帝国主义围攻条件下，列宁—托洛茨基的“暂时措施”即红色恐怖是正当的。他们充满希望地回到革命已经成功的祖国俄罗斯。在回国后的两年时间里，他们拒绝相信自己的感官：布尔什维克以外的所有革命党人被处决、流放、监禁，列宁把言论自由嘲笑为资产阶级的特权，等等。直到克朗斯塔特 Kronstadt 水兵事件才彻底击碎了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幻想。

被托洛茨基称为“俄国革命的光荣与骄傲”的克朗斯塔特水兵在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时保护了他们，在十月革命中执行托洛茨基的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果断炮轰冬宫，直

---

<sup>22</sup>当我今年被美国移民局官员拒绝成为（任何）一国公民的权利时（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我来美后的活动），我庆幸自己在美国的十年没有浪费。如果连联邦调查局对我都不屑一顾的话，也许我会怀疑我参与的那些追求中国民主、抨击日本右倾·军国主义政治、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战争的活动可能没有多大的价值。

<sup>23</sup>从美国的移民法角度看，爱玛的第一次婚姻是与美国公民结婚，早已成为美国公民。但联邦调查局为了驱逐爱玛，干脆将已经失踪的爱玛前夫的美国国籍也取消，而美国的最高法院仍然拒绝上诉。柏克曼则一直是“外国移民”身份。

<sup>24</sup>日本的宪法倒是赤裸裸的，没有这个遮丑布：它只保护“日本国民”。连日本共产党的章程也写明只接纳“日本国民”。



接摧毁了临时政府。他们也通告美国政府，并包围美国大使馆，促使美国政府释放在狱中的柏克曼。所以，当列宁、托洛茨基拒绝克朗斯塔特水兵的民主要求、并通牒他们缴械投降遭到拒绝时，柏克曼呼吁双方冷静并力图调解。列宁、托洛茨基哪能允许任何人用枪杆子向他们提条件呢？你柏克曼只不过是一个流亡人士，哪里有资格调解布尔什维克专政的铁拳？布尔什维克政权没有伤害他们，把他们礼送出俄国就算是客气的了。

1918年当爱玛仍在美国监狱中服刑的时候，惊愕地听到她视之为“俄罗斯革命之母”的老太太 Breshkovskaya 再访美国期间在名流聚汇的卡内基大厅抨击新兴的布尔什维克政权。1921年12月，爱玛和柏克曼黯然离开革命胜利后的俄罗斯，还得承受正在世界范围扩张的共产主义运动<sup>25</sup>的责难。据伯特兰·罗素回忆，当爱玛刚抵达伦敦时，各进步团体为她组织盛大的欢迎会，但会后死一般的沉静，没人再理会她了。谁愿意听到一个象征自由、正义的声音责难正处于内战之中的新生革命政权呢？柏克曼和爱玛现在明白了：他们在美国监狱中的时光才是最幸福的人生。他们的生命正是在芝加哥“干草市场”殉难的无政府主义烈士生命的延续而已。

只要这个世界尚有一个奴隶存在，这个世界就是奴隶制世界。同样，只要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任何人没有政治自由，这个社会就不配“自由社会”的称呼。

[参考资料]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7.

---

<sup>25</sup>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诞生才刚刚开始。

美国评论集

Alexander Berkman, “Kronstadt: The Final Act in Russian Anarchism,” from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Dell Publishing, 1964.

Alexander Berkman, “Prison Memoirs of an Anarchist,” from Marshall Shatz ed., “The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Bantam Books, 1971.

[200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56周年，美国圣荷西]



由党的重要阵地，其成员数次遭到逮捕、迫害。两年后，马公的大哥从革命活动引退、与中国裔女性结婚后从事体制内的律师行业。但他的弟弟 Enrique 加入革命行列、从此与他并肩战斗到生命的尽头（右图为两弟兄 1917 年流亡期间在洛杉矶监狱）。



1903 年 6 月 9 日，墨西哥市法庭（最高法院随后也认可）宣布任何刊物刊载马公兄弟的文章都属“非法”。坚强不屈的马公两兄弟于 1904 年 1 月腰无半文进入德克萨斯，于同年 11 月 5 日恢复《再生》报刊，以美国为据点宣传、鼓动、指导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墨西哥革命。

《再生》最高潮时有 3 万读者，除了偷运进墨西哥外成为墨西哥革命的先声外，也成为美国境内墨西哥裔影响最大的政治刊物，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他们的“连黑人都不如”的生活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美国，马公兄弟进一步接触到社会主义和安那祺主义，彻底树立起安那祺主义的信念，把批判的笔锋也毫不留情地指向墨西哥革命中除了萨巴塔起义军以外的一切台上台下的政治势力的最大后台——美国政府。例如《再生》1910 年 11 月 12 日号的“对私刑处决的回应”一文中指出：“拉美民众所受到的攻击来自于百万富翁们的野心的煽动。这块富饶的土地引起华尔街的贪婪，富豪们要利用爱国主义的疯狂来迫害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无辜的人民。谁不记得哥伦比亚的主权被分割？<sup>28</sup>谁能忘记这个国家的富豪们是如何反对委内瑞拉的独立的？白宫对拉美的吞并政治、对墨西哥的 Diaz 那样的放肆的独裁者的扶持政

---

<sup>28</sup> 指美国策动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以便建立受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

策，能隐瞒谁呢？谁不知道：无论何处出现一个不顺从美国意志的政府，它迟早要被美国的富豪们支持、策划和煽动的叛乱颠覆？……难道公众不知道推翻尼加拉瓜总统 Zelaya 的美国冒险家们是由华尔街的黄金支付的吗？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墨西哥人民难道会忘记他们抵抗美国富豪们抢夺墨西哥土地而流出的鲜血吗？<sup>29</sup>”（198-199 页）。我们 2004 年底参观墨西哥市中心广场侧面的国立宫殿纪念馆，那里有墨西哥最著名的画家 Diego Rivera 的最杰出的巨幅政治壁画。我看见年轻无邪的士兵们持枪包围着那些把华尔街描绘为魔鬼的宣传画，感到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政治遗产和安全。我们也观看了国立剧院表演的墨西哥现代革命歌剧，那些持枪的女战士舞蹈让我想象起在过去萨巴塔和现代 EZLN 起义军中的原住民妇女。上个世纪 70 年代在墨西哥大学研究拉美政治的 Hobbs 律师告诉我：从 30 年代西班牙内战以来，墨西哥就是拉美和西班牙的动荡政治的“新大陆”避难所；至少在理论上，社会主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是墨西哥的支配意识形态（如弗洛姆）。这要感谢马公他们留下的反抗资本支配的精神遗产。

难怪美国政府不惜罗列借口，把马公兄弟投入监狱。在 1915 年 9-10 月德克萨斯州具有安那祺思想的墨西哥裔农民工持枪抵抗的事件中，洛杉矶时报等“资产阶级报纸一直坚持这是种族冲突、抵抗者的主要目标是杀死白人、挑起战争，直到墨西哥在 1847 年失去的大片土地回到墨西哥。”（207 页）。马公被墨西哥当局派来的的奸细散布说成是事件的精神领袖（206 页）。这也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墨西哥革命的紧张前夜（1906-08 年），身在加州的马公，拒绝回到墨西哥“指导”革命，也拒绝来到直接接近、推动墨西哥革命起义的美国墨西哥裔的中心德克萨斯（76 页）。

---

<sup>29</sup> 指 1846-47 的美墨战争中，美国夺走墨西哥的半数国土。

许多世界上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法国的安那祺主义刊物，都由此指责马公“叶公好龙”。其实，他们不理解墨西哥革命的本质，也误解了马公作为一个安那祺使徒对于墨西哥革命只诉诸部分政治目的（如禁止总统再选）而没有触及经济变革（如土地公有化）的失望。在进军墨西哥的叛乱三巨头中，象征推翻 Diaz 独裁的照片上，坐在总统席位中央的 Villa 控制墨西哥北部靠近德克萨斯的边界部分，是一个受到美国冒险家们支持、操纵的军阀，出卖革命，被马公痛骂为“犹大的儿子”（215 页）。<sup>30</sup>大庄园主出身的实力派 Madero 控制墨西哥后，摆出自由主义改革家的姿态，派遣马公的哥哥和一个过去的同志，到美国邀请“战友”马公回去当他的副总统，遭到马公的断然拒绝：“直到农民分到土地、工人掌握生产工具，自由主义者不会放下武器的”（359 页）。但美国的所有社会主义派别、工会组织都背弃了马公。在美国劳工中深得人心、曾经帮助马公（第一次入狱）出狱的“琼斯大妈”到墨西哥与 Madero 见面，得到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的保证，非常满足。她认为墨西哥革命已经成功，回到美国劝马公回到墨西哥去掌权，没想到遭到马公“不能出卖无权无势弟兄们”的痛斥，大骂马公不通人事，彻底分道扬镳。至于劳联-产联的头目 Gompers，更忠实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见马公不肯回墨西哥，取消了援助的诺言，急忙赶去墨西哥与 Madero 交易了。连同时被美国统治阶级投入过监狱的社会主义领袖 Eugene Debs 也务实地判断马公的安那祺

---

<sup>30</sup> 在 Steinbeck 编写的剧本的电影《萨巴塔》中，三巨头在相机面前，萨巴塔把 Villa 推到中央。这使我回忆起 1989 年 6 月 4 日，我们在日本关西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抗议天安门屠杀的游行，在大阪府记者俱乐部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个直接受驻日使领馆授意钻进抗议队伍的留学生飞快窜到出舞台中央，拒绝我示意他移动位置，并连续讲了一半多时间，在日本和中文媒体中制造出“领袖”的形象，为后来向北京、东京当局出卖中国民主运动骗取了资本。这些都是民众自发奋起的悲剧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丑角插曲。

主义不适合墨西哥革命的现实（80页）。我不由得“同病相怜”，回忆起伟大的中国 89 民主运动在北京被镇压后，东京、北京、台北、华盛顿当局都向我提供各种拉拢诱饵。我那时只想到《红岩》中共产党员干部许云峰的故事，<sup>31</sup>回复说：“如果所有参加过抗议活动的留日同学都得到这样的好处，我也可以接受。”后来，当各权力当局知道我的安那祺主义信念，合谋迫害（包括殴打）我时，那些期待从我们身上得到现实功利的人们就回避我们。在日本社会党头头们同时坐在国家最高行政权力“首相”和最高立法权力“国会众议院议长”位子上的 1995-96 年，我们却不得不逃离已经留学、工作了十年之久的日本！

为了有别于过去的自由党，马公和支持者们 1905 年 9 月 28 日组成“墨西哥自由党筹备军政府”（简称 PLM）准备墨西哥革命。这时，马公已经变为彻底的安那祺主义者，但如马公 1908 年 6 月 13 日给他弟弟 Enrique 的信中所述：“为了获得人民的更大的真实利益，即使对于把我们视为领袖的人，我们必须把安那祺主义改装起来。这只是一个战术问题。如果我们已开始就自称安那祺主义者，没有人会追随我们。”（112 页）所以，PLM 要继续利用自由主义的盾牌（64 页）。这也可能是离开墨西哥之后造成的失策。1911 年以后，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已经在墨西哥取得初步胜利，PLM 中许多过去的战友、支持者都回到墨西哥去与 Madero 妥协或分赃革命果实了。马公毕竟不是政客，没有精明地早一点把 PLM 纲领转换成安那祺主义战线，使那些在 PLM 旗帜下起义的墨西哥民众很容易被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军阀、政客收编了。

---

<sup>31</sup> 书中的大致情节是：组织罢工的许被资本家请去赴宴，许面对相机，微笑着说：“老板，你如果把所有的工友都请来入宴，我就与你干杯”。

PLM唯一的军事成功是1911年1月从加州组织约5百人越过国界，夺取了墨西哥的巴哈·加利福尼亚州。但是，巴哈本身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没有战略价值。更不幸的是，这支从加州出发的PLM国际军夹杂着各种不同的动机：其中的一个好莱坞演员宣称把巴哈从墨西哥分离出去独立（下一步再并入美国），正好中了墨西哥政府的宣传计谋，说他们是“外国商贩”；临时招到的指挥官Pryce原为波尔战争的职业雇佣兵，他不仅偷走了资金，又想宣称巴哈为英国领地。五个月后，Madero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派遣军队经由美国领土，进入巴哈，轻易地击败了PLM国际军，彻底粉碎了马公/安那祺主义在政治上领导墨西哥革命的可能。

有人指责马公没有从洛杉矶进入巴哈，亲自领导起义。但是，除了正在被美国法庭起诉外，马公已经不认为自己或任何“领袖”能够、应该指挥革命。马公知道，没有得到美国进步势力的理解和支持，墨西哥社会革命的道路非常遥远，在军事上的行动，既不是他的能力所及，也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他在《再生》1912年6月15日号的“领袖”一文中指出：“领袖想支配、得到服从、高高在上。领袖绝不会为了穷人而实行一套基于人类经济、政治和社会平等的社会制度。……墨西哥弟兄们，学习我们1911年9月23日发表的宣言里的高贵原则，在它们的指导下发挥主动性工作吧！”（248-249页）。更重要的是，马公切身感到：在美国法庭上的斗争，更有必要和意义，因为墨西哥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控制着。另一方面，没有马公的直接参与，墨西哥革命毕竟取得了相应的结果。1917年生效的新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PLM的1906年纲领，包括新闻、集会、



工会、政党的自由、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平等、义务教育等，比今天的中国宪法还进步得多。<sup>32</sup>

通过在美国的斗争经历，马公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对墨西哥的政治命运的关注。马公对在墨西哥社会中具有支配影响的天主教会也恨之入骨。例如，《再生》1911年9月23日号的“宣言”中指出：“资本、权威、教会这黑暗的三位一体用计谋、暴力和犯罪把千万劳动民众的血汗、泪水和牺牲的产品吸入他们的掌心，让地球成为他们的天堂；这三位一体让地球成为那些农民、机械、建筑和运输工人的地狱”（138页）。为了反抗教会，马公在斯蒂纳的《自我及其所有》中找到启发：“大人物之所以显得伟大，是因为我们跪者。让我们站起来！”。尼采对上帝的攻击也从理论上给予他极大的鼓励。这对我正在编辑《安那祺主义文库》时是否收入斯蒂纳和尼采，有一定的参考。值得幸慰的是：正是马公等人的批判，促进了天主教的改革，使天主教在墨西哥和整个拉美扮演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年过八旬的恰巴斯主教 Ruiz 获得原住民信任，调解 EZLN 与墨西哥政府之间的谈判，被认为“偏向”原住民。他 2004 年 11 月访问加州时，我曾参与接待，向他简单了解情况，很希望有朝一日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1918 年 8 月 15 日，在墨西哥革命和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的情况下，马公与同志 Rivera 竟然被美国法庭以“煽动罪”判处 20 年和 15 年徒刑。1920 年 11 月，墨西哥国会议员、马公的老战友 Gama 成功游说墨西哥政府给与马公和 Rivera 养老金，遭到马公的断然拒绝。但这也说明墨西哥政府毕竟不同了。1921 年 6 月，墨西哥政府指令其华盛顿大使馆促使美国政府释放马公和 Rivera。同时，墨西哥的工会等组织在不同的场合罢工抗议，要求释放马公。人们有理由期待：墨西哥

---

<sup>32</sup> 我 2004 年底访问墨西哥时，曾拜访设在市中心的宪法纪念碑。

革命的精神领袖自从1904年以来，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流亡（其中一半在监狱中度过），不久可以自由地回到自己的祖国了。

不幸的是，马公在1922年11月21日被发现死于监狱。监狱鉴定原因是心脏发作，但他的牙齿和喉管上留下的被打击的痕迹使人拒绝接受监狱的说法。第二天，在Gama的再次游说下，墨西哥国会决议表彰“伟大的墨西哥革命者、烈士和使徒理加图·佛罗里斯·马公”。一个墨西哥裔囚徒奋起报仇，刺杀监狱长，被7个监狱士兵杀害。1923年1月5-15日，马公的遗体被运回墨西哥，沿途受到成千上万墨西哥民众的瞻仰。与1919年4月10日被谋杀的萨巴塔一样，马公之死，标志着墨西哥革命的精神永远不会被出卖了。3月1日，马公的弟弟被释放，也回到了墨西哥。10月2日，马公的战友Rivera也回到了墨西哥。

在托洛茨基遇难的纪念馆，第四国际的日本友人告诉我，他在墨西哥工作了几年，还是不理解那里的政治。其实，马公的传奇，已经回答了我的关于墨西哥政治的第一个疑问：“为什么只有墨西哥才接纳走投无路的托洛茨基？”。当我对比被出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民主运动，不由得由衷地羡慕和赞美墨西哥革命的良知、灵魂、使徒和殉难者马公、萨巴塔和他的安那祺主义战友，更加坚定了安那祺主义的社会革命信念。

[2010年6月17-25日]

## 5. 美国工联主义的光与影

我近年来投入美国股东大会的战场，注意到除了我这样的极小股东个人、环境组织和信仰团体外，一些工会<sup>33</sup>组织通过它们控制的退休基金不时也提交一些围绕医疗保险和收入差距的提案。今年，当我得知拥有 550 万工会成员的 Chang to Win (CtW)<sup>34</sup> 的投资基金也与我同样，克服了公司阻力将提案付诸高盛集团和惠普公司的股东大会表决时，马上通过其律师联系到 CtW 负责股东提案的专职研究员，希望合作。

我解释说：股东大会赋予大小股东同样的提案权，我这样的独立小股东提案灵活，除了追求共同的社会经济正义外，可以帮助美国工会提交原则性、战斗性很强的内容，以第三者的角度保护工会的广大成员的实际利益。我人在硅谷，还可以在宣读我自己的提案的同时，代表在首都华盛顿的他们出席股东大会或与公司交涉。纳闷的是，CtW 总是回避我，不肯回答实质问题。后来，我吃惊地从华尔街日报上读到：CtW 撤销了自己的提案，去附和量子基金等大资本股份要凑热闹选掉某些董事会成员，陷入“一股一票”的资本游戏，把 550 万成员之众的意志用于与少数握有更雄厚资本的大股东的幕后交易。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 CtW 下属的在硅谷比较活跃的 SEIU 工会当地分支自行在苹果公司的股东大会外组织抗议<sup>35</sup>，就直接联系他们以后

---

<sup>33</sup> 不包括政府雇员 union（译为联合会更妥当，如教师联合会），它们的性质、地位与受雇于企业的员工的联合会很不相同。

<sup>34</sup> <http://www.changetowin.org/>。它成立的目的是取代 AFL-CIO，下属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IBT) <http://www.teamsters.org>,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 相对强大) <http://www.seiu.org>, United Farm Workers of America (UFW) <http://www.ufw.org>,

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 (UFCW) <http://www.ufcw.org>。

<sup>35</sup> 赵京“Apple, 难啃的苹果”，2013年2月27日。

在谷歌、雅虎等股东大会时内外呼应。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回应我的建议，却只把我的电邮加入他们的宣传名单。从这些细节中，多少可以看出美国工会与外部社会脱节、连年衰落（目前在私营企业中只有8%的雇员加入工会）的运作实情。不由得使人想起德国社会学者Michels研究德国工会得出的著名iron law of oligarchy（寡头制铁则）：“谁在讲组织，谁就是在讲寡头制”。

好在我对美国劳工运动的认知超越了这些具体接触中的缺欠。在反战运动期间，我作为劳工党成员，曾经与San Jose Labor Council 圣何西劳工议会的专职人员深入硅谷的一些工会支部动员抗战、接待伊拉克独立工会代表团等。我去旧金山查询过主要是关于美国劳工运动的书店Bolerium Books（有6千多种书籍和历史文物），也从社会学专业的角度读到美国知名的社会学者Lipset、Bell等人对美国劳工的分析。当然，我切入的视角是安那祺-工联主义评论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推崇的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 或称Wobbly的劳工史观。正是从这里，我注意到美国劳工史上IWW海上运输工会MTW费城码头的第8支部（Local 8）的经典工联主义个案。幸运的是，我终于找到一本社会学者的以第8支部和纽约餐饮业工会为中心的工联主义专论<sup>3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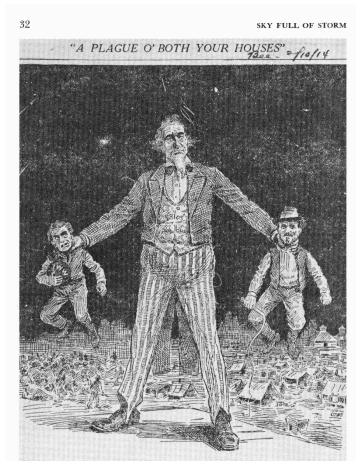
从1913年由3千名码头装卸工成立到1926年被IWW的对手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吸收为止，第8支部的普通工人成员通过实践为美国劳工展示了工联主义的精髓：劳工阶级的团结（不分种族、移民身份、技能程度。例如，黑人成员和领导职位都占一半，比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提前半个世纪付诸实践）、社会运动（当地黑人教会的动员）、义无反顾的直接行动（不看老板眼色、不怕政府镇压）等。在这可歌可泣的13年间，第8支部还经历了美国甚至世界劳工运动的宝贵教训：政府“调解”劳资关系的机构Shipping

---

<sup>36</sup> Howard Kimeldorf, *Battling for American Labor: Wobblies, Craft Workers,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ion Move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Board 总是站在资方或是与资方合作的 AFL 支部；世界大战期间军方、联邦调查局和法庭的迫害导致它的 4 名最出色的领导人在 1917-18 年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逮捕并被判 10 年以上徒刑，等。更为离奇的是：实际上作为 IWW 所有基层组织中最有战斗力的第 8 支部竟然两次被 IWW 领导层错误地停止工会成员资格！第一次发生在 1920 年 8 月 5 日，在纽约的苏俄大使馆得到收到来自费城的 IWW 的对手 AFL 的来历不明的情报，说费城码头停靠的一艘美国商船运载的是送往克里米亚俄国白卫军的军火。苏俄大使馆联系 IWW 负责人 Scott，威胁要暴露 IWW 的“出卖”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其实，在 IWW 内部对苏俄的态度也有分歧，但 Scott 没有调查真相，就命令第 8 支部拒绝装卸，没有得到并不关心国际意识形态纠纷的一般码头工人的理解和全面执行。IWW 领导层听不进第 8 支部的声辩就停止了他们的资格。在后来同年的 IWW 全国会议上，第 8 支部的老领导承认：因为我们的错误失去了码头工人（85 页）。

怪不得不明真相的外部人士把第 8 支部的最终“易帜”解释为普遍的美国劳工运动向保守、妥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对手 AFL 的投降。不过，Kimeldorf 的这本研究揭示道：至少在费城码头，这实际上是工联主义的凯旋，因为在得不到 IWW 领导层支持<sup>37</sup>、邻近的巴尔第摩和纽约港口工会早已被 AFL 控制、全美疯狂压制安那祺主义的恐怖形势下<sup>38</sup>，能够原封不动地保持从领导



A cartoon from the Sacramento Bee of February 10, 1914, with this caption: "California has had enough of the I.W.W.—a lawless organization whose aim is disturbance, riot, and sabotage. At the same time, she has had enough of shameful employment conditions, such as those at the Dust hop yards at Wheatland, which led to protest, to violence and to murder; and which have been denounced in a report to the Federal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by Chairman Frank P. Walsh."

<sup>37</sup>不用提，IWW 本身已经开始瓦解。

<sup>38</sup> 1920-28 年被诬陷逮捕并处刑的安那祺主义者 Sacco 和 Vanzetti 就是典型的美国社会白色恐怖思潮的反映。

层到普通成员的所有人马、毫不损伤的工联主义的斗争精神和传统、特别是对码头运转的实际控制（主要是雇用权，即新雇用的工人必须加入工会，既保护了工人又加强了工会力量），是对 AFL 的改造，把工联主义注入占工会人口 80% 的 AFL 的广大成员中。附图 Sacramento Bee 日报 1914 年 2 月 10 日的卡通<sup>39</sup>，可以看出当时的大众媒体对“无法无天的”IWW（左人）和“可耻的”资方（右人）的愤怒。

本文对同时期的分散的纽约餐饮业各工会的情况评述，不象费城第 8 支部那样工联主义旗帜鲜明。1913 年新年，2 千名受工联主义影响的国际旅店工会 IHWU 成员罢工，在纽约的复杂政治背景下，由领导罢工的 IWW 成员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110 页），但成功地在普通劳工中撒下了工联主义的种子。在后来的不同工会名义组织的罢工中，普通劳工成员实际上采取了可能他们自己并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工联主义的策略和原则。而且，与完全由男性组成的码头工人不同，反而是纽约餐饮业的雇主为了对付罢工，促进了妇女的就业！这本社会学杰作令人信服地说明：与资方和政府妥协合作、拒绝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打着（相对于欧洲的）“美国独特价值”的 AFL（特别是后来 AFL-CIO）的各工会支部正是因为广泛地采取了工联主义的一系列战术（包括后来的直接占据公司行动）和精神才取得了支配地位，“毫无疑问，衡量美国劳工的真正标准就是它的工联主义/性质的强度”（167 页）。

将近一个世纪以后，2011 年 11 月下旬，中国巴士司机在新加坡的罢工，证明了上述历史教训。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介绍：“在外来工所进入的新加坡就业环境中，公开的不满表达遭到压制，劳工抗议活动几乎闻所未闻。从 1959 年掌权以来，人民行动党对公开集会进行了严格控制，限制工会权利，并朝有利于雇主的方向重写劳动法。当初的工会遭到毁灭性打击，留下来的工会大多归属于全国职工总会，而全国职工总会常常由某个内阁部长来领导。/根据新加坡法

---

<sup>39</sup> David Selvin, Sky Full of Storm: A Brief History of California Labor. 1966. p.32.

律，工会只有在通过秘密投票获得大部分成员同意之后才能举行罢工。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外来工不能成为工会的正式成员。/根据法律，如果参与者的诉求超过具体的劳资纠纷，…那么罢工就有可能被视为非法。/提供‘核心服务’——包括医疗、消防和公共交通等——的劳动者必须在罢工之前 14 天告知。水、电等公用事业单位的员工完全没有罢工权利。”<sup>40</sup>在这样的背景下，胆敢罢工的中国司机的命运（被监禁、驱赶出境）可想而知。如果全世界的劳工们有一点工联主义的知识 and 传统，雇主和政府就会老实多了。

8 月 29 日，在人们庆祝半个世纪前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演说之际，快餐店的工人们在全美六十多个城市罢工，要求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 7.25 美元提高到 15 美元<sup>41</sup>，进一步把“美国之梦”从政治自由朝经济平等推进。由资本控制的御用经济学家们很喜欢用“就业机会稀少”来威胁提高最低工资的诉求，这实际上把问题带回到安那祺-工联主义的另一个方案：4 小时工作制！<sup>42</sup>这对多数不属于最低工资阶层、没有加入任何产业联合会、也不属于（传统）劳工阶级的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8 小时工作制”（这也主要是安那祺-工联主义的成果）普通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2013 年 9 月 1 日美国劳动节]

---

<sup>40</sup> “中国巴士司机狮城抗争” 2013 年 8 月 31 日。

<http://cn.wsj.com/gb/20130831/RLW073906.asp?source=whatnews>

<sup>41</sup> <http://news.yahoo.com/u-fast-food-workers-plan-nationwide-strikes-over-041625898.html>

<sup>42</sup> 赵京“四小时工作制与完全雇用”，2010 年 3 月 6 日。

## 6. 二战期间伤亡最大的爆炸悲剧

日本签字投降 69 周年之际，我们有幸参观美国西海湾最大的弹药库港口 Port Chicago Naval Magazine 国立纪念遗址<sup>43</sup>。这个位于旧金山海湾东北角 Suisun 湾、在高速公路 680 和 4 号交接地的深水港与旧金山海湾北部的 San Pablo 海湾 Mare 岛上的军港相连，陆地上又连接从纽约、芝加哥来的铁路，远离密集人口，是个理想的弹药港。在二战、越战等期间利用频繁，1991 年的海湾战争所用的 1/3 弹药就是从这里出航的。1994 年，在 Concord 军队海洋中转站 Military Ocean Terminal<sup>44</sup>中划出 5 英亩占地设立此国立纪念遗址。

纪念遗址今年只在 8 月的前两周 4、5、6 对外开放，需要提前一周预约。我们总共 11 名参观者中午到达 John Muir 国立历史遗址，先看 10 分钟沉重的历史灾难录像，然后由向导开专车带领去纪念遗址。我们在入口登记时，我注意到墙上张贴的从总司令奥巴马到中转站主任的十几个负责人头像中有四个黑人，感受到在陆军里人种的历史性变化。



这是我见到的最大铁路中转站（占地 7600 英亩）。虽然目前基本上没有被利用，但我可以想象战争期间的繁忙景象和可怕的事故灾难。向导是个历史系毕业的白人青年，很坦率地介绍 1944 年 7 月 17 日晚 10:18 发生的最大的（原子弹之外的）人为爆炸的背景：黑人青年被召集在

<sup>43</sup> <http://www.nps.gov/poch/index.htm>

<sup>44</sup> 原来叫海军武器站 Navy Weapon Station，目前处于陆军管理下。



这里从事艰苦而危险的装卸工作，周围的白人社区不欢迎他们，既没有正式水手的待遇又没有普通劳工的权利<sup>45</sup>，他们一周的工资相当于一  
般港口劳工的一天工资。更不可思议的是：海湾工会和海岸警备队已经警告过这里的安全措施问题，当局不但没有理会，那一晚还安排两艘运输船同时来装载弹药！

那一晚的相当于 5 千吨 NTN 当量<sup>46</sup>两次连续爆炸，造成二战期间美军在本土大陆的最大伤亡事故。当场炸死 320 名青年，其中有 202 名黑人，占有二战期间黑人士兵死亡数的 15%，碎片飞到 1 万 2 千英尺高，一英里以内的建筑物都化为废墟，周围 40 英里都感受到冲击波。接下来，生存下来的黑人青年没有得到弹药库港口的白人海军军官们享受的 30 天修养，于 8 月 9 日被送往 Mare 岛上的军港继续装卸弹药。258 人当即拒绝前往，但在军事法庭的威胁下，有 208 人从命，余下的 50 人被军事法庭判处 8-15 年徒刑<sup>47</sup>。颇具自由精神的向导谨慎地作结论说，这是反大法西斯战争中的小法西斯行为。



正如中转站入口处高于种族比例的黑人陆军官员的相片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军事革命”的进一步深入还包括军方、特别是作为世界警察的海军的组织结构的多元化和民主化，特别在面临大幅裁减的和平时期。军方虽然拒绝为此事故认错“平反”，但由此取消了把一

---

<sup>45</sup> 旧金山湾区的工会非常有战斗力，受共产党影响很大，也为军方所忌讳。

<sup>46</sup> 广岛原子弹相当于 1 万 5 千吨 NTN 当量。所以有人认为这个爆炸是一次原子弹试验。

<sup>47</sup> 引用来自国立公园管理处的介绍传单 Port Chicago Naval Magazine。

个种族的成员单独编入任何一个单位的政策，也算是民权运动的一种开张。向导介绍说，美国的民权运动一直在为受难者们的权利、声誉斗争，但事件经过半个世纪后，生存者所剩无几，美国内务部不可能为“战争期间的罪犯”建立国立纪念标志。最后，生存者们接受政治妥协，由总统签署“赦免”他们的行政命令，公众才能公开地在国立设施纪念这次悲剧。我不由得对比起二战期间亚洲“慰安妇”们的命运：作为政治妥协，不肯承认官方直接责任的日本政府出面成立“民间捐助的”亚洲妇女基金，向所剩无几的愿意接受资助同时放弃追究日本政府罪行的“慰安妇”（多在菲律宾）发放 2 万美元的安慰金。



除了河边的遗址，我们也由向导带领到一处专门辟为参观用的弹药库战壕和战壕之间的海军运输列车，很象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乘坐的“闷罐车”。参观完战壕，我们被允许面向水面拍摄（不能拍中转站）纪念。这里是纪念 69 年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好的美国本土大陆所在，面对蔚蓝的天空、开阔宁静的河湾、对岸优美的景色和拂煦的秋风，我们都不由得感谢每一个时刻的和平。

[2014 年 8 月 15 日]

## 7. 访美掠影

第一次与这个世界上最大强权的政府接触，是在一九八九年那段世界震撼的日子里，美国驻大阪的领事馆主动找上门来，摆出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姿态，一方面表现出“国际宪兵”的领导责任，一方面也确实比较出我们寄住的这个国度的政治制度的低劣。笔者记起曾经为之神往的林肯葛底斯堡演讲，以为华盛顿政府不愧是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人民的、人民统治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sup>48</sup>不过，当镇压八九中国之春的枪声平静下来之后，东京政府就开始与北京政府的交易，共同迫害（或收买）在日本的民主人权运动，而华盛顿政府却基于东京政府不会保护任何中国公民人权的事实（尽管它在巴黎的首脑会议上也签署了“保护中国留学生”的宣言），以“有移民倾向”的理由拒绝我们入境的签证申请，劝告我们去向东京政府要求公道或回北京去申请！在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被迫害更多地活动在海外的五、六年里，导致其政治意义快速衰退的原因就是北京、东京、华盛顿、台北等政府权力收买、迫害中国公民的幕后交易；这些交易，无论其多么隐藏或明目张胆，但结果都非常肮脏、赤裸裸地向无权势的中国民众显示出各国的统治阶层对人类犯下的罪恶。与此同时，统治阶层为了维持各自的政权利益，迫不得已放松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减轻对于社会发展的阻碍。“如果说十年的中国社会有什么进步、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增长，那么这一切都是社会改造党人以丧失自由和幸福的牺牲为痛苦代价的。没有他们的社会改造实践和勇敢精神，中国人民有如今的言论自由和新式生活吗？这一切难道是执政者自动赐予的吗？”<sup>49</sup>

如果说马克思先生的“无产者只有在解放全人类之后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豪言早已被掌握国家权力的任何“无产阶级政党”粉碎的话，那么，抱定彻底消灭国家制度的无政府主义信念者就是自愿下地

---

<sup>48</sup>请注意此处的人民并不含有政治性的阶级区分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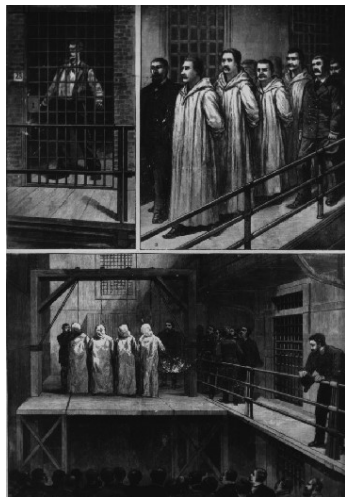
<sup>49</sup>“人权斗士”任峻叮嘱语。

狱的普罗米修斯，从我们自身的受奴役状况可以直接标明国家社会制度的改进程度。这一次，在一美元只值八十日元的背景下，我们参加由日本旅行公团 JTB 主办的旅游行程，开具收入、工作等人参证明担保（甚至还请亚洲研究协会发来学会邀请），终于顺利取得进入这个帝国国境的许可，于四月二十二日抵达纽约。

除了海关移民局外，纽约是典型的国际性开放都市，只不过自由女神和当初的只具检查身体状况功能的移民机构已经成了历史博物馆，支配这块地域的是洛克菲勒中心或世界贸易中心等摩天大楼，人在这里算得了什么？卡内基（1899 年）毫不讳言地说：“竞争法则对个人而言虽然残酷，对人类全体却是最佳选择，因为所有的部门都保障适者的生存。所以，商业、工业资产的垄断集中，不仅仅是利润的结果，对于人类的进步也是不可或缺的。”“友爱与合作关系的确立，必须首先要变革人性，它虽然可望却不可及。”“一视同仁的慈善是一种对于人类进化的明显妨害，与其让有钱人花几百万美元去资助懒汉、醉汉、小人物，还不如把金钱扔到海里更有益于人类。”那些现存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总是要强化现存制度，在他们看来，罢工、金本位制的废止、妇女参政权、黑人平等、政府对下层的救济等等，都是有违人类进化原则的。实际上，在 1893-96 年的经济危机期间，芝加哥的各铁道公司以罢工妨碍了联邦邮政和州际通商为名，取得了联邦法院的禁止罢工法令，派遣几千名联邦军队镇压、逮捕了罢工的工会 ARU 成员（1894 年夏季）。这时离“内战”（南北战争）的结束并不太久，美国人还没有忘记林肯的理想，以为他们从此不再会有内战，各阶层可以通过协议解决他们的利益争端呢！当时的伊利诺州知事就主张不必派遣军队就可以调解劳资冲突的，后来，他因为主持公道，释放了三名无罪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被解职了。

美国的成功和内在的社会矛盾都来源于独立建国的历史，在费拉底菲亚（合众国诞生之地）和华盛顿 D. C.，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受支配、统治这块国土的政治理念和传统理解在人民统治名义之下的美国社会制度，它最大的特征就是无论独立战争、南北战争还是领土扩张，上层统治阶级都牢牢地掌握着主导权而不允许来自民众的独自反

抗成为现实的政治力量。华盛顿不就是因为没有再当第三任总统就受到仅次于耶稣的朝拜吗？华盛顿的“伟大”，只在于比较起希特勒、斯大林、日本“天皇”、毛泽东、邓小平、金日成等而言；但比起内森·黑尔（因刺探英军情报被抓获，临刑前说：我只遗憾不能第二次为祖国献身）来，华盛顿不过多一些知识、技能而已，是后世的统治阶层夸张、利用了这种微不足道的差异。林肯也因其出身“木屋”常被抬到与出生“马槽”的耶稣相论，但预言并献身于废除奴隶制度的正是被州政府处死的约翰·布朗；林肯的灵堂每天由联邦政府财政支出接受来自世界各处的敬礼，布朗的尸体躺在坟墓早已腐烂了。除了《独立宣言》、《合众国宪法》、《人权宣言》的“自由宪章”，美国人难道不应该把如下的预言、传道刻记在他们的心灵吗？“我泰然自若、心情愉快地等待着公开杀害我的时刻到来，同时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是我为推进上帝和人类的事业效力的唯一途径；我与家人所作的牺牲和遭受的痛苦都不会付之东流。”（布朗1859年11月30日于



弗吉尼亚州杰弗逊县 Charlestown 监狱) “这才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绞刑架前的六名无政府主义者。插图) “我还要为我们生存和自由的权利进行辩护，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要为此斗争到底；然而，政府、财阀以及一切反动势力都死死地与我们作对，因为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假如我们在忍受了七年四个月零十七天惨无人道的折磨和冤屈之后，还是非被处死的话，那原因我已经告诉你：因为我们站在穷人一边，反对这个人剥削

人、人压迫人的制度。”<sup>50</sup>

---

<sup>50</sup>万塞蒂 1927 年 8 月 21 日于马萨诸塞州监狱死刑囚牢。译文引自黄继忠译《名人书信一百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90 年北京出版。

认识到美国政府与世界上任何别的政府一样，具有既（在名义、形式上）代表全体国民、又（在实质上）体现统治阶层意志的双重特征，可以很清晰地透视出近几年来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表象喧哗下的原由。当民主党进一步衰退、保守主义进一步抬头时（日本也正好同样迅速地右倾化），也就难以指望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带有普通价值（如人权）的义务而更多地感受到它的“国民·民族”主义利益保护。事实上，中美之间的人权争议几乎退化为关于少数人物的处置的交易的表演，表示国际社会通过政府间谈判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途径已经达到尽头。这并不是坏事，回省苏联、东欧的解体到今天的叶利钦专制的成立，以莎哈诺夫为象征（或许还得加上同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戈尔巴乔夫）<sup>51</sup>的持不同政见者扮演了与其愿望相违背的身不由己的功能。对于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而言，当它越多地丧失独立性格（有少数的靠天安门事件发迹的败类一开始就蓄谋于此，与政府权力交易，有不少人却是无知、无意识地以此强化个人的地位）时，它就越发失去生命力和存在价值，好在任何政府（强权如美利坚合众国）都没有能力拉拢收买中国民主·人权的主力军——普通的无权无势的中国广大民众，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诸如中日关系会常久地把持在北京、东京政府的两国政客官僚手上（共同迫害中国公民），最近中国民众的对日战争索赔呼声冲破政府权力压制就是明证。可以说，真正正常的、自然的、和平的、友好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确立才刚刚起步。

[1995年5月4-5日 静冈县三岛市]

---

<sup>51</sup>诺贝尔和平奖如果着意于个人反对或改善不合理制度的斗争是可以推奖的，例如大赦国际组织的人权活动；但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利用的工具，常会带来致命的危害。瓦文萨、戈尔巴乔夫、达赖、阿拉法特（以及下一位中国人得奖者？）都由于此奖引发、激化不自然、不必要的政治矛盾。

## 8. 海外华人神学政治随感

1670年，斯宾诺莎在已经摆脱西班牙统治、建立起资本主义性质国家的荷兰匿名出版了《神学政治论》。<sup>52</sup>斯宾诺莎在此书中第一次以科学的方法、从《圣经》本身出发研究《圣经》，考证《圣经》各卷的作者以及他们的写作条件与动机等等。<sup>53</sup>被称为“自然神论者”的斯宾诺莎并没有研讨上帝本身，他的主要目的是摧毁各种形式的教会这样一种世俗组织利用《圣经》对社会的统治。我没有斯宾诺莎那样的资历研究《圣经》，<sup>54</sup>但是，却不时对各种教会组织的世俗表现产生出斯宾诺莎那样的同感。

1995年12月26—31日，每年一度的第23届中北美华人基督徒冬令会(NCCCWC)在世界最大的机场芝加哥O'hare International附近的假日饭店举行，来自美国中、北部十三个州的一千多名基督徒(和少数尚未受洗者)聚会在这里，欢度1995年最后的时光。NCCCWC目前的事工，<sup>55</sup>在各教会、团契、查经班的同心服事及福音机构的协助下，首先致力于支持、巩固中、北美十三州六十多个华人团契与查经班，并联系、帮助尚未建立查经班的散居在各地的华人慕道群体。这次冬令

---

<sup>52</sup>此书于1670年以拉丁文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出版。我的中译读本根据1883年的Elwes英译版 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转译，中译者温锡增，1982年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再版发行。本论中所引页数，皆指本书中文版页数。

<sup>53</sup>我第一次读到斯宾诺莎感叹说《圣经》的编撰操纵在不懂《圣经》的人手中，大吃一惊。后来读到一些“异端”，知道《圣经》也是人的产物。例如，英文译本有《圣经中散失的篇章》\_The Missing Books of the Bible\_ Volumes I & II, Owings Mills, Maryland, USA: Ottenheimer Publishers, Inc., 1996.

<sup>54</sup>研究《圣经》的第一个条件是通晓希伯来文。我曾经随同美国“耶和华的证人”信徒们学习《圣经》，对于他们引用希伯来文的《圣经》解释，既不能接受也无能反驳。

<sup>55</sup>在大陆接受大学教育的我时常感到海外中文的语义表达不够准确。为了避免“翻译”带来的误解，这里按照原词引用，不作变动。

会是 NCCWC 主要事工之一，其他还有通讯、跟进、短宣、特会、特刊等活动。<sup>56</sup>

我随同威斯康星州 Madison 华人教会的八十多位弟兄姐妹驱车赶去赴会，听取了黄存望、沉德来、何俊明等牧师的步道与宣讲，并与龚明东、薛孔伟、李顺长等牧师交谈过。与我接触过的其它华人牧师一样，比较起日语或英文的宣教，我遗憾地感到华人牧师们对《圣经》教义本身理解(或讲解)不够深入。<sup>57</sup>



我第一次注意到保罗的重要性，是得益于柏森斯的研究。<sup>58</sup>基督教(《新约》)当然是以耶稣为中心的，但是，没有直接受教于耶稣的保罗不但远远超越了耶稣的门徒，甚至担负了耶稣未能充分从事的向外邦人(即全世界)宣教的使命。保罗的准确无疑、绝对武断的话语中常常透露出圣灵的光辉。何牧师因而下结论说，保罗的话也需以圣旨来理解。我则宁愿接近斯宾诺莎，除了因为我们读到的《圣经》是经过人为编纂、翻译的原因外(中文版的翻译就明显不尽人意)，更因为包括耶稣在内的先知、圣徒们生活在各个特殊的时代，他们的话语中既包含普遍意义，又是通过现实社会环境的具体事例来阐明的，所以，不能拘泥于各个话语的具体内容(如作满七年奴隶才可获得自由等)。我注意到海外华人基督教徒中有许多受过高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及专业人士，用中文表达出来的相对浅显的《圣经》认识似乎并没有阻碍他们接受信仰，这里面的原因可能要在宗教以外去寻找。

---

<sup>56</sup> 参见 NCCWC' 95 手册《新约、新人、新生》等材料。

<sup>57</sup> 公正地说，可能是由于我的母语是中文，对于海外华人的中文水准要求太高。而在听取日文或英文宣教时，花在语言方面的注意力分散了对教意的进一步思考。

<sup>58</sup> T. Parsons,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 我对此书写的书评发表在美国出版的《民主中国》1994年6月号，收入本书。插图 为 6-7 世纪拜占庭保罗像 Saint Paul, Byzantine ivory relief, Musée de Cluny.



海外华人教会宣教最引起我忧虑的内容是其表露出来的单纯的政治倾向，此一倾向在这次冬令会由一个自称“当代保罗”牧师的到来达到高潮。

以一个初次来美、初次参加大型华人教会活动的“局外人”的眼光，唐崇荣牧师布道的内容、方式与语气都充满了世俗功利的政治诉求，远远偏离了《圣经》与教会的原点。大会吹捧他是“当今最具影响力与思想深度的国际布道家之一。他在讲道中经常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论及世界与中国的历史发展、提出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发人深省。在过去 38 年里，他的布道足迹遍及全球各大洲，主领了无数次大型布道会与神学讲座，听众达百万计。”大会专门安排时间等待他的姗姗来迟，只听他一人宣讲。

唐牧师对基督教以外的世界文明（希腊文明、孔孟之道等）的庸俗抨击并没有引起我在意，但他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低劣的煽动性诱导，使我不由得联系到另一个利用基督教的世俗政治团体：由韩国人文鲜明领导的“世界基督教统一圣灵协会”。在《原理论述》<sup>59</sup>的整个后半部内容都在强调，近代朝鲜民族的苦难历史是因为上帝选择他们代替犹太民族，新的基督（文鲜明本人）就诞生在这个民族之中，朝鲜语将成为世界唯一语言，等等。

唐牧师除了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国际布道团外，还借助美国的大学办一个“归正学院”，培训下一个世纪支配中国大陆的高级精神人才，在讲道中也不时露出这种野心和霸道。当翻译告诉他另有一次聚会邀请他，但只有一千名而不是四千名听众时，他脱口而出：“那我就去不了！”

基督教的历史对于这种利用上帝的个人野心并不生疏，但令人吃惊的是，北美华人教会众多牧师与教徒对此粗俗的政治利用无动于衷（或是无能为力）。唐两次拖延大会时间，除我退席外，竟然没有别人提醒他要遵守公共道德。一些牧师明知唐的言行违背《圣经》的精

---

<sup>59</sup>文鲜明称其为《旧约》、《新约》之后的“成约”圣经。其中对《圣经》的引用杂乱无序，没有实质意义，唯其政治性断言非常肤浅明确。

神，却利用唐的“才能”招引信徒，为教会的健康发展带来致命的隐患。由此联想到，半个世纪前，基督教被逐渐逐出中国大陆，主要原因并不是当政的国家权力的迫害，而是教会组织自身违背或未能全面认识、执行《圣经》教义。

十七世纪中，有一个叫 Sabbatai Sevi 的犹太拉比，用一种叫 Kabbalah 的神秘主义的东西让在中东、北非和欧洲的大量犹太人相信他就是长期等待的弥赛亚（救世主）。但是，当土耳其苏丹让他选择“永生”（死刑）或苟活（改信伊斯兰教）时，他选择了后者。<sup>60</sup>所幸当代选择“牧师”为职业的人不必面临十七世纪时的选择。当然，海外华人神学世界中的“当代保罗”与美国主流神学政治的“当代保罗” Billy Graham 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Graham 的自传 Just As I Am<sup>61</sup>通篇的议题就是：从尼克松以来，历届美国总统都是我 Graham 的个人门徒。对于美国政治，可悲的是，他基本上没有撒谎。

宗教具有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两种特征。斯宾诺莎没有讨论前者，后来的费尔巴哈尝试把两者联系起来。我以为，仅从后者（现实政治）的观点出发，基督教的特征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福音，它已经在广大的中国本土上传播、生根、成长。海外教会，包括海外华人教会（许多牧师都持有美国等国家的护照）利用有利的条件支持（而不是力图主导）在中国的福音传播，正如许多组织和个人已经在进行的那样，也是拯救自身的活动。

这次大会也表现了另一个敏感的政治议题：基督教与中国民主化的联系。许多为中国的民主奋斗的人士从不同的途径体会、认识了基督教。有一些人信教而脱离政治活动，有一些人信教而坚持民主活动，倡导上帝对民主政治的领导。无疑地，一些“知名人士”的入教也提高了教会的影响，但我坚持认为：关于个人信仰的宗教与关于国家的政治活动有不同的性格，不能彼此混淆、利用。基督教在中国以

---

<sup>60</sup>John Freely, *The Lost Messiah: In Search of the Mystical Rabbi Sabbatai Sevi*, Woodstock & New York, NY: The Overlook Press, 2001.

<sup>61</sup>*Just As I Am: The Autobiography of Billy Graham*, by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及全世界的传播价值在于它既是个人得救的途径，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福音。个人通过改进社会制度的努力获得个人的解救，个人解救的基准就是是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人权，就是神权，当人权在地球上获得普遍尊重、人类政治制度的最根本罪恶从地球上消亡的时候，天国也就来临了。如果我们个人都从赎罪的信仰出发从事社会活动，在世俗的政治过程中体现个人的信仰，那么，我们个人在得到拯救的同时，中国的前途就变得光明起来。

[1996年1月]

## 9. 美国校园里的社会主义活动

与欧洲相比，美国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缺少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熊彼特等来自欧洲的学者对此进行过考察与分析，可以举出如下的原因：(1)美国的独特历史很难以阶级斗争来区分社会矛盾，(2)美国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权力制衡、言论自由等)，(3)美国统治阶层的开明性(华盛顿不贪权，杰佛逊等民权派人人为地分裂出两大政治集团交替掌握国家权力等)，(4)美国工会的排斥斗争、专注调和的特征，以及(5)美国统治阶层对于激进改革派的镇压(如超法规地处决无政府主义者)。不过，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广泛的社会平等指向，美国是最早(大规模)地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它的社会保健也很早开始普及，美国民众根深蒂固的对政府不信任<sup>62</sup>使得本杰明把无政府主义列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三大要素之一。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如此，作为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在美国社会缺乏吸引力，很难展开制度性的活动(如议会或总统选举)。

我一九九五年底到达威斯康辛大学 Madison 校区后不久，就参加校园中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 (ISO, 国际社会主义组织) 支部的讨论会。这一周的课题是反对克林顿政府派兵(两万美军)波斯尼亚，讨论如何向出征士兵的家庭宣传。ISO 的 Madison 支部每周都举办一次专题讨论，由成员就某一个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做研究报告，再让大家讨论。我虽然已经不再简单地赞同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理论中许多重要部分了，但没有犹豫就填表、交费加入了



ISO。我没有理由以意识形态的分歧影响参与、支持任何种类的进步、正义组织活动。我离开东京时，在 3A(计划中的 Asian Anarchist Association 缩写简称)聚会中，我们一致确认了“不非难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

<sup>62</sup>所有美国的政府权力完全没有威信，只是制度上的习惯服从。法律与信念分离，减弱了国民对法制的自觉服从。

ISO 办事处设在芝加哥，在美国主要靠机关报《Socialist Worker》(社会主义劳动者)双周刊联系全美各处的 33 个支部，并随时就美国或世界的社会时事出版宣传手册。各个支部除了每周一次自主讨论会外，还须在街头销售 Socialist Worker。我第一次随着他们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大雪中叫卖了一个小时才售出一份，实地感受到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冷淡态度。有一次叫卖宣传时，遇到一个相识的正竞选县政府职位的政治学系的毕业生，他吃惊地问：“你在干什么？我不需要社会主义！”

另外，会员们还得参加与别的政治团体共同举办的游行、宣传活动，据说 Madison 是全美最激进活跃的三大城市之一，使我时常自问是否已经变得保守起来了。例如大赦国际为主的废除死刑、西藏自由活动，我感到可以理解，但对同性恋(或者群居生活)权利诉求却总感到缺乏主见。我由于时间关系对这一类的活动都敬而远之，但很注意工人罢工这样的活动。

比起校园来，美国的社会主义活动还得依赖工会活动的性质和特征，ISO 要求会员尽可能地参加所属工会。近年来美国实际生活水平停滞甚至下降<sup>63</sup>首先冲击到最低层的劳动者(或无职业)家庭，例如 AT&T 在“合理化”中解雇四万员工以确保利润(股价上升，公司董事长的年收入高达五百二十万美元)，此举连联邦政府劳工部长都看不下去<sup>64</sup>。连社会福利很好的威斯康辛州最低工价也只是每小时 2.99 美元(W-2 法案)。这已经激起了劳动者以及别阶层的抗议，而全美第三大都市且偏重于传统产业的加哥首当其冲。不幸的是，近年来持续最长的美国两大罢工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以失败告终。

---

<sup>63</sup>按照经济学的统计，美国的国民总产值以及人均收入都在上升，但这种统计随着产业结构的复杂化(主要是服务业多重环节产生的虚假累计产值)越来越偏离人们的实际生活感受。例如一场车祸或火灾，反映在经济统计中，是增加了国民收入，因为它们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的业务活动。

<sup>64</sup>当时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正好是我所在的政治学系的女教授。她自己后来因为“非法雇用没有身份的保姆”被迫辞职。

Peoria 的八千七百多牵引车制造工人，毫无结果地结束十七个月的罢工回到厂房；Decatur 的七百六十名坚持了两年半的工人被迫接受 A. E. Staley Manufacturing 公司的“最佳且最后”方案（比他们九二年十二月拒绝过的方案还苛刻）复工。更令人痛心的是，当被解雇的工人要求分取罢工期间的捐款时，新成立的工会请来警察驱散了他们。劳动阶级的利益分裂是他们全体受政治压迫的重要原因之一。

Staley 罢工为今天的美国工人运动提供了许多教训，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晚，复工后一个月，近两百多原来工会的组织者和成员以及家属在 Madison 举行了纪念集会。我随 ISO 的成员驱车赶去会场，并销售印有支持 Staley 罢工的 Socialist Worker，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作为团体的美国工人阶级。七、八位在台上的组织者各自反省、检讨了他们的过失（当然，更该责难的是那些复工后“官复原职”的工会负责人）。我记得在一次 ISO 研究会上讨论过关于美国工会“官僚”这一特殊阶层的脱离了第一线产业劳动的社会特征，罢工的结果对他们并不如对于劳动者的影响深刻。<sup>65</sup>Staley 的最大客户百事可乐 (Pepsi. Co) 的工会没有响应、支持，使 Staley 资方不接受罢工的要求。许多工人和支持者也发言，有一位从芝加哥赶来的九十三岁老人很激动地说：我参加工人运动已经七十多年了，经历了许多次失败，但我仍然做好准备再被警察抓进监狱！

三月二日，我们 Madison 支部的近四十名全体成员驱车去芝加哥参加 ISO 的中西部大会（两百多名出席）。在全体会议上，首先介绍最近的法国总罢工的成果，特别指出平时的法共、工会的活动的重要性；其次是控告最近在芝加哥发生的对于黑人、移民的警察暴力（晚上有几位受害者证言）。例如，由于（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北美贸易协议实施，造成墨西哥北部大量劳动者失业，不少人因而“非法”进入美国打工。Socialist Worker 报道有一个墨西哥工人为了养

---

<sup>65</sup>例如 AFL-CIO 会长 John Sweeney、SEIU 会长 Andrew L. Stern 等都是大学毕业后直接成为工会的专职雇员的，终生享受薪水，从来没有当过一天工人；木匠工会的会长 Doug McCarron 过去是雇主。他们把工会也作为一种商业 Business 来运行。

活妻小冒险到加州打工，前不久没有工作终因饥寒交迫死去，还靠善良的美国民众凑钱把他的遗体运送回家。前不久美国国会正在审议新的移民法(Simpson Bill S-1394)要对移民加以苛刻的制约。我记得刚到 Madison 参加全美学自联的会议，大家讨论如何游说阻止此法案时，一位(自“六四”事件以来)颇有经验的同学提醒，分别出“合法”与“非法”移民。事态的推移果然与他的经验相符，因为包括 Microsoft 在内的大企业必须雇用大量的中国、印度劳动力(多持有博士学位)确保竞争利润，法案修正后大为缓和“合法”移民的限制，但相应地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取缔，克林顿政府甚至超法规地动用联邦军队帮助州警察或移民局在美、墨边界修筑障碍并追捕墨西哥人。

在讨论目前总统选举的分组会上，报告人通过克林顿执政三年来的政策说明民主党并不是比共和党较好的恶棍，不应该投克林顿的票。问题在于：为什么美国的政治中进步组织的活动(黑人、移民、同性恋、妇权)最终都把选票转入民主党了呢?除了民主党明智地吸取了这部分支持外，也是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阻碍了第三势力或更小政党的出现。例如国会议员的选举，如果实行全国以政党为单位的选举(至少在参议院)，小政党可以获得与其支持率相应的席位，即使只保有一个席位也可以在国策中传达出完全不同的政治信息影响国民。在目前的选举方式中，极端地设想，第三政党即使获得全国 33%的支持，但如果在每个州都处于第三位的话就一个席位也得不到，更不用说社会主义组织在美国很难取得“第三位”的支持率。<sup>66</sup>

我略为感到意外的是芝加哥会议中也是知识分子居多(会址本身就在 DePaul 大学)，因为 Madison 只是州政府和大学相关机构的所在地，所以成员多为学生或职员不足为奇。问题在于由于缺乏劳动者成员，ISO 为了强调工人的重要性反而对外显得封闭自守。坐在轮椅上的 Roger 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他认为

---

<sup>66</sup>美国历史上短暂地出现过“人民党”进入选举，最近的“第三总统候选人”却是大富豪或大军事官僚。附带提及的是：美国的这种扭曲的选举方式对民主的危害正发生在日本的政治改变中。

ISO 的许多主张和活动都很有意义，ISO 不必拘泥于理论而应吸引更多的“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参加。有时候我为了专业(政治学)研究没去参加 ISO 活动，引起他们的不解、不满。在尼加拉瓜丛林中作战六年的桑地诺分子 Julio 经常要我不必“浪费时间”去学习“资本主义的民主、人权理论”，他们也要求我放弃与另一社会主义激进派斯巴达主义者联盟 Spartacist League 的联系，使我感到 ISO 中“布尔什维克纪律”在美国的存在。ISO 与世界上另外十五个国家的同类组织保持联系，其中英国的社会主义劳动党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影响最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可以领导罢工并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地方议员。ISO 的规章中还要求会员不得利用互联网传送组织信息，所有这些不便，可能是由于我还没有深刻体会到美国国家权力的残酷性的缘故吧！

在美国的略具规模(发行定期刊物、举办定期公开活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中，上面提及的斯巴达主义者联盟人数很少但最为激进，它的机关报双周刊 Worker Vanguard《劳动者先锋队》的办事处设在纽约，共有九个联络处(有的地方只是电话号码)。Worker Vanguard 除对纽约、东海岸报导较多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强烈的反对美国国家权力，甚至支持“苏联红军在阿富汗抗击美国侵略”、支持中国的核试验以对抗美国、抗议美国移民局把中国船民收容遣还、抗议古巴政治亡命者挑起美国与古巴冲突，也非常反感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政府的谄媚言行”。<sup>67</sup>斯巴达主义者联盟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也属于“先锋队”，与别的社会主义组织关系很僵，有时候在支持同一罢工(如最近的纽约清洁工人罢工)的活动中与别的组织发生冲突，责难 ISO 是“CIA(中央情报局)的走卒”等等。它与加拿大托洛茨基主义者联盟(Trotskyist League of Canada)以及英、德的斯巴达主义者联盟，在日本也有一个联络邮箱。我的感受是：这些组织对中国的理解、关心都不如对俄罗斯深刻，成员们的献身活动大多是出于主观的信念而不是现实的需求。

---

<sup>67</sup>香港的《十月评论》中有英译中的文章，其中有些声援“持不同政见者”的部分也为其抨击。



美国评论集

作为一面镜子或风向标，美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前景将取决于美国社会政治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孕含着微弱的希望。

[首次发表于香港《先驱》1996年5月]

## 10. 正统老铺的社会主义劳动党

美国历史上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组织是 1876 年设立的劳工党 Workingmen's Party。1877 年劳工党改名为社会主义劳动党 Socialist Labor Party、简称 SLP 并沿用至今。<sup>68</sup>自从 1890 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 SLP 的理论基础；直到 1900 年，SLP 是美国唯一的全国性社会主义政党；1919 年美国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USA 成立时，许多 SLP 成员加入并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早期的 SLP 主要由来自欧洲的各移民群体(特别是德国人)组成，所以各个 SLP 地方支部使用各自的民族语言。SLP 被称为社会主义组织中最具和平色彩的“体制内”政党，为了扩大宣传，自 1892 年到 1976 年，投入每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在 1972 年的总统大选中，SLP 在得以提名的几个州获得 53831 选票。在 1878-79 年的 SLP 全盛期，有一人当选为伊利诺州参议员、三人州众议员、四人芝加哥市议员。1891 年 SLP 出版发行 The Daily People 《人民日报》时，有八千名读者。后来，读者下降到五千名以下时，《人民日报》改成 The Weekly People 《人民周刊》。现在，SLP 大概还有两百名成员，薄薄的八页纸月刊中有不少重复的内容。作为美国左翼政治运动的老铺，SLP 在几乎不变动其意识形态的条件下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人们不禁担心它还能在美国政治中存续多久。

依我的观察，在美国这样的强大资本主义国度，把总统选举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重要战略手段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选择：首先，它促使多数不愿介入选举的各类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同盟军与其分道扬镳；其次，它加剧了愿意参加选举的少数左翼阵营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之大，无法产生统一候选人)，对于美国的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同情社会主义的选民是一种困惑。

---

<sup>68</sup>此文主要参照 SLP 的机关刊物《人民》月刊、SLP 出版的小册子以及 SLP 网站 <http://www.slp.org/>，也查阅了其它相关资料。数目不一致的地方，以 SLP 文献为准。

1896年SLP积极参与了Socialist Trade & Labor Alliance社会主义行业与劳动同盟的设立，力图取代或对抗没有战斗性、回避阶级斗争的America Federation of Labor美国劳动联盟(AFL)。但是，美国劳动联盟于1905年加入了具有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色彩的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SLP曾经支持设立底特律IWW、其不久后改名为Workers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Union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WIIU)以对抗IWW。WIIU于1924年解散，SLP自此失去了在美国工会中的影响力。

SLP的指导思想是德利昂主义De Leonism。SLP把德利昂捧为美国的马克思，使广泛的社会主义者敬而远之，被称为德利昂“帮派”(cult)或德利昂主义者。犹太人德利昂(1852-1914)出生于荷属委内瑞拉，在欧洲和美国接受教育后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1886年德利昂因为参与劳动运动和选举活动失去了本来到手的普升教授的机会，由此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运动。德利昂1890年加入SLP，并从1892直到去世为止，一直担任《人民日报》(或周刊)的主编。

为了克服SLP仅限于德国移民的封闭性，德利昂首先把马克思的著作大量翻译为英文，成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宣传者。德利昂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美国社会进行考查和评述(为此受到过特别关心“为什么美国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熊彼特的关注)，特别发展出成为SLP纲领的Socialist Industrial Union Program社会主义产业工会方案，注重由劳动者通过工会来管理产业与整个社会。每一期的《人民》都重复登载这个德利昂主义纲要：“社会主义是所有人对所有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而不是为了追求利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全体劳动者通过他们的全国性经济组织选出民主政府，对产业与社会实行直接控制与管理”。德利昂的著作，其历史价值高于现实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展开的一家之言。

我1995-1997年在威斯康辛大学作访问研究时加入那时在美国校园里比较活跃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SO的Madison支部。在一次ISO的活动中接到一份SLP传单(SLP在威斯康辛州最大的Milwaukee市有

支部)，ISO 的成员告诉我不相信 SLP：“那是一个斯大林主义政党”。这是我遇到的典型的美国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偏见。SLP 成立时，斯大林还只是一个孩童呢！作为一个教条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政党，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论述，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在落后国度实现，SLP 当然不认为俄国革命有多大的社会主义意义。

我 1997 年从 Madison 搬到加州硅谷 San Jose。ISO 曾介绍过其伯克利大学支部，但我没有时间有能力赶去一百公里以外参加活动，也不认为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当我偶然从图书馆读到 SLP 的宣传品并得知其总部就在附近的 Mountain View 市时，立即去函订购《人民》月刊。

---

**the Peopl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LP**

---

不久，一位年逾七旬的英国绅士带着 SLP 宣传品来访问了我们。他叫 Frank 弗兰克，是 1974 年移民来美的印刷工人，目前在自营的印刷公司为 SLP 印刷出版物。弗兰克说他祖父、父母在英国都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其父母因为反对英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移居澳大利亚，现在他的妻子、儿子也是 SLP 成员。弗兰克简要明快地解释了 SLP 的立场：既然俄国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那些困扰我们的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古巴模式、越南问题、阿尔巴尼亚问题、朝鲜(北方)问题，以及其根源(列宁主义)，都没有必要特别关注。他嘲笑文化大革命期间澳大利亚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讨好：“任何人只要看到毛在城墙上挥动小红本检阅群众，就知道中国与社会主义没有关系”。

这就是 SLP 的社会主义正统性：只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帝国(十九世纪的英国和二十世纪的美国)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才具有世界意义。按照这种略带沙文主义的逻辑思维，那些生活在英美帝国之外的民众的可歌可泣的奋斗，包括我们今天为中国的民主、人权、社会正义所从事的斗争，都必须从属于 SLP 这样的能够享受资产阶级法权(包括言论自由和全球化殖民性利润、不会遭受直接国家暴力机器迫害

等)的帝国公民的信念。当1996年发生“台湾海峡危机”时,我准备为ISO刊物写一篇介绍并请一个ISO成员修改英文,他很痛快地答应到:“没问题,我可以为你折价:你只须付我每小时15美元”。

从最基本的政治现实来考虑,我们根本不可能期待发达资本主义国度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胜利再来“解救”全世界的民众;另一方面,在不发达地区的民众的斗争(如墨西哥的恰巴斯),如果没有世界性的支援,也很难对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在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普遍支配的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一个国度、地区的民众的不同形式的抗争,都有其不可代替的重要性,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本来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和义务。把自己派别的教义凌驾在人类进步事业之上,正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度的“体制外”政治势力的通病。

除了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的纲领相似但组织上互相独立的SLP,美国的SLP在美国二十多个城市有支部或联系人,但其成员主要集中在加州的旧金山/硅谷与洛杉矶地区。1998年3月,我随弗兰克一家开车去伯克利出席SLP旧金山/硅谷支部每年三、四次的会议。到会的二十多名成员多为高龄退休人员。

《人民》现任编辑Ken发表演说,抨击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并没有提高人民生活。应该指出:科技的发展对不同的阶层影响不同,没有科技技能的人(特别是高龄退休人员)确实受到物价(特别是房价)高涨的危害。我来美国后,与这里的学术界讨论英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与德日式“集团资本主义”的差异,认为主要因素在于德日两国社会主义思潮相对强大、资本统治集团(由于发动战争遭到惩罚)相对温和,而不是所谓“传统价值”的不同。相对于具有“人性”的德日公司的“终生雇用”制度,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彻底由利润(特别是股票收益)操纵,实际上往往失掉追求长期利润的合理性。有时候,有的公司仅

仅只是为了人为抬高股票价格，把仍然赢利的部门也解散、解雇员工。<sup>69</sup>

SLP 支部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募捐，与民主党、共和党的募捐餐会类似。我因为“经验丰富”，与会之前尽量少带现款。要不然，面对那些忠诚的 SLP 老党员，也得掏空钱包。这样的仪式，对于从内心认同 SLP 纲要与活动的党员来讲可能是自然的；但对于不完全认同 SLP 的关心者，多少感到难堪，许多人不会再来了。SLP 在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伯克利大学校园附近开会，竟然没有一个青年学生关心，这也是原因之一。ISO 在这方面作得比 SLP 成功。ISO 的会议活动也要求捐款，但并不对参加者形成心理压力：主持人往往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扔进几个硬币，说：“这是捐款。请传递”。

任何组织在吸引新成员、特别是青年时，都必须同时关心他们的实际生活，并在实际生活中联系社会主义的意义。真正对社会主义诉求感到吸引的主要是社会下层人士，但 SLP 以及其它的组织却只要求捐款和时间参与，好像成员都是具有高度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活上无忧无虑的“先进分子”。

实际上，SLP 的核心是由这样的具有“中产阶级”身份的“先进分子”组成的。这在 SLP 每年一度的全国会议上可以看出。1998 年 5 月 2 日，SLP 在硅谷的一个旅馆举行全国午餐会，约有三十多名各支部代表与当地成员出席。主持人是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主讲人是得克萨斯州大学的教授，演讲题目是关于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各帝国主义的世界范围的石油争夺战。

这次全国性募捐餐会，主要是为了扩大《人民》的篇幅与发行量“以适应冷战结束后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的可能”，共收到两万多美元的捐款（包括我的 12 美元），其中以洛杉矶支部的四千多美元最多。

---

<sup>69</sup>我曾在硅谷的一家电话公司上班，有一天晚上接到公司电话让明天 11 点上班。我还以为第二天可以享受一顿免费午餐，原来是去接受解雇通知，领取相当于两周工资的解雇费。

SLP 的全国书记 Robert Bills、《人民》月刊的编辑 Ken 等，也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甚至在这个社会的地位来服务于一项没有物质报酬的事业，显示出基督教早期的传道精神，尽管这种奉献没有“感动上帝”（劳动大众），也没有在理论上找到超越出自身团体的普遍价值。从道德伦理方面，社会主义的运动为他们提供了高尚个人生活的条件；从政治实践方面，他们对整个人类生活却不一定有多大的影响。如果说，包括 SLP 在内的各社会主义组织以及其它进步势力的存在价值在于保持星星火种的话，那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的燎原之势，则会远远超越任何社会主义团体的精神信念局限。

[1998 年 5 月 4-5 日初稿、1999 年 7 月 19 日定稿]

## 11. 战争状态下的恰巴斯

Bill Hackwell<sup>70</sup>

自从墨西哥政府与萨巴蒂斯达民族解放军（EZLN）签署和平协定以来，两年过去了。这个圣安第雷斯协定承认原住民地域可以选举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可以控制他们的自然资源。访问恰巴斯的和平牧师团的成员们马上就看出墨西哥政府并没有遵守协定，恰巴斯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这使我想到了30年前自己在越南战争中的采访。

为了进入恰巴斯，我们通过了15个军事哨口。进入恰巴斯后，我们随处可见用美国军用物资武装起来的墨西哥政府军的巡逻与基地。墨西哥与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国家中接受美国军援最多的国家，在美国的班宁港军校，目前多于三分之一的受训者来自墨西哥。

这种低强度的战争状态实际上是美国制造的。美国对墨西哥的军售从1996年的4.5万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2800万美元。自从塞迪洛当上总统以来，墨西哥的军事开支增加了一倍，这些负担加重了墨西哥劳动人民的苦难。

尽管军事压力增强，自治地域仍然顽强地在执政的制度革命党（PRI）支配之外生存下来。恰巴斯的110个市区中，有38个宣布自治，其执政的议会与制度革命党或墨西哥政府没有关系。

我们和平团访问了8个自治地域，在每个地域的周围都看到大量政府军的存在。自治地域的领导人告诉我们，他们总是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因为政府军与别州的军队在附近的活动不断增强。在这样的紧张状态之下，所有的开发规划与农业劳动都停止了。今年春天，许多地域因为害怕烧毁或袭击，没能种上基本的玉米、豆类等作物。

---

<sup>70</sup>作者 Bill Hackwell 是居住在旧金山的反战活动分子、摄影记者。1998年5月，他随同美国的和平牧师团运送32吨援助物资到墨西哥的恰巴斯省。原载圣何西和平中心 San Jose Peace Center 《和平时报》 Peace Times 1998年7月—8月号。



我们访问了 Oventic 的 EZLN 总部，Moises 司令官接待了我们。在总部的医疗中心，墙壁上装饰着墨西哥革命英雄 E. 萨巴蒂斯达、格瓦拉以及原住民妇女面具的肖像。在公共剧场的周围，布满了坑洞与木桩，Moises 解释说：那是为了防止军用直升飞机的降落。“政府军夜间到中心来巡逻，那些低空盘旋的直升飞机特别可恶。不过，只要有国际人士来访，他们就不来骚扰了。”

确实，国际上的支援已经变成自治地域生存下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一个叫 Acteal 的村庄，去年 12 月有 45 名无辜的平民、儿童被屠杀，我们看到这样的路标：“欢迎国内与国际的人士！我们不接受来自政府的人”。

正因为如此，墨西哥政府不愿意国际上的人士来访问并把这些真实情况传播到世界上。自从 1996 年以来，已经有 200 名国际人士被以“干涉国家内政”的理由驱逐出境，目前，只有 45 名国际观察员留在这里。

墨西哥移民局官员告诉 Reforma 报的记者说，他们正在查找在恰巴斯的 40 名『没有适当签证”的外国观察员。墨西哥政府规定探访者必须申请 FM3 签证，但国际观察员如果为了探访恰巴斯而申请 FM3 签证，一定得不到批准。他们只好以观光签证入境，很容易被墨西哥政府驱逐。我们在每一个军事哨所都遇到移民局官员和法务警察。

国际上同情恰巴斯原住民的访问者受到塞迪洛政府干扰的同时，真正干涉墨西哥政治的 IMF（国际货币基金）和美国的公司却受到欢迎。自从 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墨西哥政府的负债已达 1700 亿美元。这迫使墨西哥出卖受到宪法保护的国家产业。美国公司已经着手收买墨西哥的全部 57 个机场以及基础铁道线、通讯线路。国家石油公司 Pemex 仍然属于国营，但是它 78% 的石油产品都输送到美国以偿还债务利息。

恰巴斯是墨西哥最穷的省，也是未开发资源最富饶的地区，它包括墨西哥原油储藏量的 81%。这就是恰巴斯斗争尖锐的原由，萨巴蒂斯达解放运动阻碍了美国公司的顺利压榨。1995 年 1 月 13 日美国大

通银行的市场调查报告说：“在我们看来，恰巴斯并不构成对墨西哥政治稳定的致命威胁，但对于投资家们却构成担忧。墨西哥政府必须消除萨巴蒂斯达运动以证明它能有效地控制国土、确保安全。”

塞迪洛政府对于大通银行这样的投资家的担忧很敏感，它马上在1995年2月发动了二轮对原住民地域的进攻。

今天，有7万名武装部队及保安人员进驻恰巴斯，他们主要驻扎在恰巴斯省东部靠近 Lacandon 森林的地带，那里是 EZLN 主力所在地。他们想切断 EZLN 与各自治地域的关系。政府攻势的另一轮方式是增强受到制度革命党援助的半军队组织，这些类似于美国 3K 党的组织对原住民们展开恐怖活动。据 La Jornada 报消息，自从1996年以来这些组织已经杀害了800多名村民。他们专干烧抢原住民房屋及庄稼的行径，Acteal 村被杀害的45名原住民就是这种半军队组织的牺牲品。就在惨案发生的前一天，人们还看到这个携带步枪的组织与政府军特种军团在一起活动。按照 Enlace Civil，一个与 EZLN 有联系的平民组织，有2万2千多名原住民直接因为这些半军队组织的恐怖活动被迫迁居，移住到山区或难民营去。

当我们的和平访问团接近 Polho 自治村时，我们看到成队的带着面具的妇女守卫在村口，在大路上有美式装备的 Humvees 人在巡逻。妇女们并没有害怕的神色，她们担负着许多自治地域的前线守卫工作。与邻村 Xoyep 的妇女一样，她们背负着孩童不断地驱赶走企图进入的巡逻士兵。她们坚定的神色使人回想起500多年前萨巴蒂斯达起义。

最近，斗争的焦点集中到恰巴斯峡谷东部的一个偏僻的小镇 Taniperlas。这个小镇刚于今年4月10日宣布自治，这立即遭到墨西哥军队、法务与公安警察的侵犯。已经有12名国际观察员被逮捕并被驱逐，6名墨西哥人被投入牢狱，几百名士兵仍然驻扎在那里。大约140名男性 EZLN 支持者逃入附近的山林，妇女及儿童们则被禁锢在家中。

和平团 4 月 24 日决定向 Taniperlas 人民传送和平的信息。我们从 Ocosingo 驱车 120 公里，把 7 吨大米、豆类、谷物、食盐与白糖送到一条肮脏的小路上一个高地，再由 EZLN 支持者们靠人力及驴马搬走。

第二天早上，和平团通过 Taniperlas 镇，当 Walker 牧师向驻扎的公安警察讲明我们的目的时，立即出现了许多半军事的制度革命党成员包围了我们，有人扔石块砸坏了一辆车的窗口。有一项报道说我们（而不是驻军）不受当地人民的欢迎。

在恰巴斯，战争不再是新闻的焦点了，但斗争仍在继续，有些地方的情况正在恶化，更尖锐的冲突将会爆发。国际上广泛的支持运动，特别是阻止美国政府对墨西哥统治集团的支持，是结束恰巴斯战争状态的必不可缺的因素。

[赵京译，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1998 年第 4 期]

## 12. 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美国民主

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sup>71</sup> 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1997 年 3 月 4 日晚来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讲演，能容纳 600 人的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更多的人只好在舞厅看现场录像转播。这是笔者来美后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盛况（在领取座位票时就奇怪排这么长的队伍），正如笔者从一篇介绍这位当代语言学大师、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时读到的那样：这是当代耶稣在讲道。

乔姆斯基（插图）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批判主要反映在他的《防范民主》（*Deterring Democracy*, 1991 年初版、1996 年第 8 版）一书中。乔姆斯基强调：美国一方面成为国际政治中唯一不受挑战的超级强权、同时其经济实力却不断下降（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日本和德国），这个政治（军事）、经济的不平衡关系迫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更露骨地谋求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的世界“新秩序”（布什语）的特征。



苏联在五十年代后期（首先发射人造卫星）达到顶峰后开始衰退，并不具有与美国争霸世界的能力。六十年代的“古巴危机”以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就是求和的表现。进入七十年代以后，苏联社会内部的经济停滞、政治不满更加深刻，而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统治地位牢固确立。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冷战”局势。越南战争以后，这个局势开始解体，美国一方面在军事上不必顾虑苏联的反应，同时又必须迫使日本、德国从经济上支持美国的行动。正如国防部副部长 Lawrence Eagleburger 在国会听政会上的发言，这是一种新的外交实践：美国出动军队、别国付款。波斯湾战争就是这种外交政策的实践。乔姆斯基引用美国劳工部的报告说，美国教育系统的进

---

<sup>71</sup>对于 anarchism 这个词的翻译，乔姆斯基答复到：不必拘泥于形式，只要实践正确，误解总会消除的。

一步衰落使美国更加依赖本国的打手(“世界警察”)和跨国公司的外国技术人才。

乔姆斯基对于美国的亚洲政策没有详细的评述,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本身缺乏如其中东、南美洲政策那样一贯的政策,同时也因为在欧洲发生的“正-反-合”辩证逻辑还没有在亚洲发生。在欧美复兴的以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潮尚没有得到日本、中国的回响。在亚洲,代之而起的是“市民主义”、“消费者保护运动”、“新党”政治等时尚泡沫。

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当以克林顿外交事务顾问、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亨庭顿 S. Huntington 为代表。正如亨庭顿的同僚、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傅高义(E. Vogel)所称:坐在哈佛大学教授的交椅上,自然就会发生影响。而自负为“当代马基亚维里”的亨庭顿在其成名之作《士兵与国家》(1956年)就开始关心“秩序问题”。他此书的结论是:“军事价值正是美国最需要的价值”、“如果市民们鼓励士兵们坚持军事规范,国家就会在此规范中塑造自身、获得满足与安全”。现在,冷战结束了,这位“冷战政治学大师”本该退休了,但是亨庭顿却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使命:寻找新的对峙构造以防止美国与其同盟国的“道德衰退、文化自虐、政治分离”,这就是他的1996年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建》。

亨庭顿当然知道,所谓“文化分析”正是马基亚维里等经典政治分析所鄙视的。亨庭顿大概想从这一领域出发超越马基亚维里。遗憾的是,比较起相对容易定义的“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即美日、西欧),亨庭顿眼中的“文化西方”(以聚会在瑞士 Davos 的“世界经济论坛”的商人、银行家、教授、官吏与记者为模型)却不能构成政治分析上的可用术语:日本是“文化西方”吗?东亚的新兴工业区域属于哪方呢?

作为与“文化西方”对峙的中国,其传统文明程度不如日本、台湾、韩国,其正统政治体制来自马克思、列宁,目前正急剧地接受亚当·斯密的政策,怎么可能与西方发生“文明的冲突”呢?亨庭顿把伊斯兰教列为另一个“文化西方”的对峙者,但伊斯兰教人口最多的

印度尼西亚与西方发生过“文明的冲突”吗？已经加入北约的土耳其会与西方发生“文明的冲突”吗？已经被定义为“恐怖分子”、“独裁者”的中东原教旨主义者和伊拉克的侯赛因只能给美英等国的跨国公司的利润带来骚扰而已。

亨庭顿还不至于把古巴也列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墨西哥过去作为“美洲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领袖”没有挑战美国，现在它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作为“北美一员”反而成为美国的直接“威胁”，克林顿不得不下令增强边境警备、不得不拒绝签署废除地雷公约。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或者干脆称“有麦克唐纳店的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实际上等于：胆敢挑战“民主国家”（美国及其同盟）的都不是民主国家。

除了亨庭顿抽象“教导”外，作为美国传道理念的民主主义如何具体地操作呢？《推进九十年代的民主》<sup>72</sup>简要地介绍了美国政府与“民间社会”（协调、补充政府政策的财团、学术与政治机构）推动民主的实践。很显然，冷战时代美国所惯用的直接（军队）或间接（CIA）干涉方式虽然仍然不得不保持，但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原来在“对抗共产主义”名义下实行的各种政策不能在民主主义的名义下推行了。这迫使美国要支持、培养、鼓励“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运动”。例如，此书表 1 列出 1992-93 年度一些机构用于“推动外国民主运动”花费掉的来自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款项，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用于“印制和传播由中国学者写作的关于制宪与法制的论作”等。从中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多数曾经多多少少地代表过民众呼声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们不得不堕落为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附庸的实际过程。为了争夺美国政府的这一点施舍，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们竞相在美国国会这样的“神圣”场合出卖人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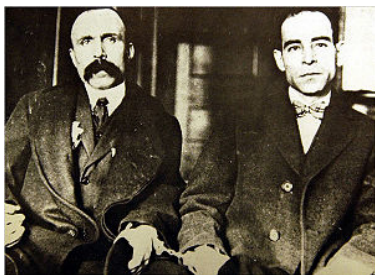
<sup>72</sup>副标题是“表演者与手段、课题与职责”，Larry Diamond 著、卡内基财团 1995 出版，免费赠送。

或许，相对于作为外交工具的美国民主主义，比较具有实质内容的美国国内民主主义的政治成果可以为我们改善美国的经济民主与外交民主提供一线希望。

[此文曾经发表在 1998 年 4 月 15 日美国《国际日报》，1999 年 2 月 15 日修订。]

### 13. 论恐怖主义

1927年8月21日，无政府主义者万塞蒂 Vanzetti 与他的同志沙科 Sacco 在被执行枪决的前两天，从麻州监狱死刑囚牢中为其儿子留下遗嘱：“……假如我们在忍受了7年4个月17天惨无人道的折磨与冤屈之后，还得非被处死不可的话，那原因我已经告诉你：因为我们站在穷人一边，反对这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他们在临刑前向所有支持者发出号召：以一切形式推翻这个制度！为我们报仇！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判决，当麻州州长自己不敢签字而请求以哈佛大学校长为首的委员会做决定时，美国的法学院教授们还是站在穷人的敌对面维持这个制度。在这样的社会公正已经不可能期待的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者保留或行使“替天行道”的最后手段（暗杀或恐怖行动），不但无可厚非，某种情形下还应拍手称快！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购订返回意大利的旅票后驱使一辆装载炸弹的马车冲向华尔街的贸易大楼，炸死炸伤上百余人。美国当时没有能力追查“凶手”，此“凶手”从此在意大利安居，无疾而终。在这个事件中，很显然元凶是处决万塞蒂与沙科的美国司法制度。

在某些极端的历史条件下，暗杀是唯一的行使社会正义的手段，特别是在不伴随无辜者伤亡的情况下。例如，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表达出朝鲜志士不甘当亡国奴的国魂。所谓恐怖行动，只是一种特殊的、敌我势力极为悬殊条件下弱者迫不得已采取的战争方式。所以，对于恐怖行动、恐怖主义的谴责，并没有超越反对战争的范畴。再看1996年圣诞节时秘鲁游击队突袭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事件，游击队明确地把行动控制在人道主义的政治目的下，当场释放妇女、小孩、普通工作人员、甚至包括没有直接支持藤森政权的加拿大外交官等。相反，藤森在解决事件的过程中，蒙骗包括红十字会、加拿大政府等国



际社会，残暴地屠杀毫无抵抗准备的每一个游击队员。在这一类事例中，不论是出于胆怯或者是不赞同恐怖行为，都可以宣称脱离恐怖主义，但我找不出谴责“恐怖份子”的任何理由。

恰好在一百年前的 1901 年 6 月，日本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家幸德秋水在《暗杀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公法如此缺乏判决国际纠纷的能力，经济制度如此缺乏调解劳资冲突的手段，社会法律与良心如此丧失判断与制裁个人或党派行动的力量，则对此社会绝望的人，或者隐遁、或者发狂、或者自杀、或者诉诸暗杀行动。暗杀确为罪恶，但把他们推向绝望的社会不是更罪恶吗？”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忘记恐怖份子已经首先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这个事实，我们为什么不谴责把他们推向死亡选择的这个罪恶制度呢？

如果你把恐怖主义视为粪便，彻底清除它们的唯一方法是停止人的生存。恐怖倒更像是一个人身上的伤病，你不能因为手上生疮而切断手指、不能因为耳朵发炎而拿掉耳朵。这个关于恐怖主义、恐怖事件性质的常识，并不因为事件的具体特殊性而不同。

2001 年 9 月的前几个月，具有中国与日本研究背景的日本政策研究所创办人查尔默斯·约翰逊 Charlmers Johnson 出版了题为《反戈一击》（Blowback）的普及性读物，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并预测到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反戈一击。连 Blowback 这个字典里没有收录的词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用于评估美国外交政策的副作用带来的冲击。实际上，当今世界上最具爆破性的三个国际性冲突点（中东、台湾海峡与朝鲜半岛）都是美国外交罪恶的后果。曾经为克林顿当局出谋献策的约翰逊比绝大多数的只是直接为主人效劳的“思想库”（think tank）高明，深为美国国家的利益忧虑。

既然美国扶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既然美国十年来持续轰炸伊拉克，既然美国收买萨达特·穆巴拉克军人集团镇压埃及穆斯林政治组织，既然美国、法国支持阿尔及利亚军人集团推翻民主选举中获胜的伊斯兰政治组织，既然美国扶持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落后、反动的君主制而前往驻军，等等，从阿拉伯世界中产生向

美国宣战的军事组织是必不可免的。美国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战争状态中的。

在这种战争状态下，美国的政治中心（白宫、国会）、军事中心（五角大楼、CIA）、经济中心象征（世界贸易大楼）成为攻击要点是显而易见的。的确，在这些建筑物中，有许多迫于生计从事清扫或者低级秘书事务的劳动民众，他们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广大广岛、长崎民众一样，是遭到直接攻击与被统治阶级利用而牺牲的双重受难者。那些在广岛、长崎经受原子弹爆炸的亚洲民众从来没有咒骂美国；即使是日本民众，在没有首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之前就谴责美国，也丧失了道义基础。

我们看到巴勒斯坦普通民众怀着解放了的喜悦庆祝“9·11”事件的巨大成功，连任何伪善者也不能抵赖阿拉伯民众的这种正当的感情。读过《古兰经》的人更明白，那些执行战斗的战士以此清除了自己生活中的罪过，得以升入天堂。对于那些没有理解、同情阿拉伯民众苦难的人，如果要谴责这个恐怖行为，就必须同时谴责美国在中东的反动外交政策，必须同时要求美军停止轰炸和侵略阿富汗，必须同时要求美国停止轰炸和制裁伊拉克（那些十岁以下的儿童凭什么要为侯赛因的政策受难呢？）。必须同时要求美国停止军援以色列，必须同时要求美军撤出中东、撤出亚洲、撤出一切非美国领土的地区……；否则，除了伪善者，或是被愚弄者，都不应该跟随华盛顿的节奏去痛骂。

我们再看看美国全军“最高统帅”的表现，在听说第一架飞机撞击世界贸易大楼后仍不知事态之严重继续向孩童宣教；在听说第二架飞机撞击后顿时逃得无影无踪（事后知逃到印地安那和那布拉斯加州的地下了）；在得知敌人都已经死完后又宣布战争，把整个美国和整个世界都投入一场毫无道义的恐怖屠杀中，对那些“9·11”事件的牺牲者，进行再一次的亵渎。

正如对待各种战争一样，对待恐怖主义也要具体分析。不过，从恐怖主义行为常常带来的更大恐怖罪恶的历史事实看来，恐怖行动一

般不应当被赞同、被鼓励。和平抵抗才是更有效的反对暴力的形式，更值得提倡。

[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第4期]

## 14. 劳动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我来美国后第一份正式的“永久”工作是在电话上销售电视天线与节目，报酬略高于法定最低工资。虽然劳动时间不好，业务却相当轻松，平均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为公司工作。按照经验，每当工作量不足时，公司总会采取各种措施，最终实行裁员（lay off，不同于因为职工个人理由而离去的辞职或开除性解雇）。我们都预感到将被裁员，只是因为那时相同待遇的工作比较容易找到，也没有心理压力。

一天晚上，我接到公司经理电话，让我第二天提前一个小时上班。我意识到可能会宣布裁员事项，并期待着一顿免费午餐。

第二天我到达公司时，发现同项目的职工都到齐了。公司宣布：因为电视公司取消了此项目合同，从今天起，所有职工全部被裁员。我们在签署了以后不得控告公司声明后，领到相当于两周工资的遣散费，并可以申请州政府的失业保险。

这对在日本公司里工作过的我，是一个记忆深刻的体验，美国的雇用制度竟然允许一个公司只是为了一个项目而雇用或当天解雇职工！

我也曾在一个“地球上最好公司之一”的纯软件开发公司 Adobe Systems（插图为其标志）工作过。<sup>73</sup>我感到自己无法适应人品恶劣的经理。也很惊奇为什么职工同事们为讨好上司竟然不择手段。我当面向公司总裁建议公司考虑改善管理制度，适当地评价、检查对职工握有太大权势（从雇用、提升到解雇）的各级经理。当时，美国的泡沫经济正达到顶峰，这个有



---

<sup>73</sup> 其人均产值超过五十万美元，比微软还高。我刚被正式雇用后，公司的股票猛涨，公司给我的“股票选择权”在一个月内的升值就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不过，当我一年多以后被裁员时，公司的股票降到低于我的“选择”价值，我分文未获。

两千职工的公司声称下一年将要招收一千名新职工。所以，我这样的资本主义体制异端也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得以生存下来。我同时预感到美国经济也有泡沫破灭的时候，为了能够在跨部门范围内组织职工应付可能的冲突，我积极组织全公司范围的乒乓球比赛、参加演讲俱乐部等，特别希望有可能在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内也组织起工会来。不过，事态的展开完全超出个人主观设想之外。

2001年9月11日，我较早赶到公司，知道了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事件。公司总裁当即决定当天放假（付工资），大家都惊恐、慌张地往回赶。我留下来与警备、清扫的工人（他们不属于公司职工）

“坚守阵地”，因为我知道没有人会来此公司找麻烦。就连美国略有头脑的学者如 Chalmers Johnson，都预测到同样性质的攻击行动（他在事件之前刚出版了一本叫做《反戈一击》的书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我当时很可惜公司为此损失上百万美元。现在想来，公司此举是为了保护公司最大财产——职工，因为公司大楼或设备并没有多大价值，且不能创造剩余价值。我可以预知国际政治的大体趋向，却不能控制公司的随之而来的变动。当我被经理告知我处于“再配置”过程时，心情很欣慰，期待着新的经理和工作无论如何都比目前的好。但是，我最终还是被解雇了。因为在美国的公司里，得罪了经理就不能在公司里留下来。

对于英美式资本主义而言，欧日式资本主义带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欧洲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经常执政，工会也十分强大，在普遍萧条之际，一般采用降低工作时间（降低收入）的方式“同舟共济”。日本的《劳动基准法》只简单规定“必须在解雇前三十天通知”，但按照东京高等裁判所的判例，还必须考虑“人员削减的必要性”、“选择解雇方式的必要性”、“确定解雇对象的妥当性”、“劳资协议程序上的妥当性”等基准。这就是日本资本主义“终身雇用”特征的法律基础。我也向公司建议此方式，一般职工也很赞同。公司管理阶层其实也不反对。但是，华尔街不高兴，不允许这样做。

日本的上市公司每年只须公布一次财务报告，且股东大会都选在同一天举行以防止股东们有理无理的控制或干涉。再加上多数公司都隶属于以银行为主力的所谓六大系列，公司之间交叉控股，公司管理阶层直接受股票控制而改变经营、削减职工的压力不大。相反，美国上市公司每个季节必须公布财务报告，一旦出现亏损，就必须最终以裁员的方式反馈给股票市场。特别要指出，几乎所有上市公司都以“股票选择权”（即股票数额）的形式奖励员工以及管理阶层，典型的公司总裁甚至不要工资，只要“股票选择权”以示对股东的忠心。这种经营方式，已经远远脱离传统资本主义的“朴素”信条，把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营越来越多地置于甚至连传统产业也控制不了的股票投机上。

很显然，越贫穷的人越没有本钱和胆量参与市场投机；而市场投机的最终全体平均回报或亏损，不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而是由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经济政策决定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属于成熟、腐朽型，把政治上的民主形式（主要指选举时的一人一票制）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形式（即消费时的一元一票制）完全脱节。“民主政治”提供了垄断经济必须的劳动力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同时，也制造出大批没有“买主”（雇用公司）的劳动者“库存”——其中许多人拥有高等学历与技能。总体而言，我们所听到的还没有被淘汰的美国公司都很有竞争能力，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与浪费。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战后的日本、德国的经济完全被抛向市场，不但不会有所谓的“经济奇迹”，恐怕会陷入墨西哥今天的处境，或者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德、日的统治阶层因为战败，也没有能力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比较“谦虚”地吸取教训，把全体劳动者的就业视为社会秩序安定的必要条件。其结果是：保障了雇用，又极大地促进了增长。这对美国式资本主义而言，确实是奇迹。

冷战结束以后，支持日本过去成功发展的国际条件不复存在，骄傲自大的日本资产阶级追逐的泡沫经济加速了日本经济的衰退。随着日本政治上进一步附属于美国，来自美国经济政策改变所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迫使日本一步步效法美国经济，同时在政治上更加军国主义化，以防止、镇压社会矛盾即将到来的带来的动荡。但民众的抵抗仍然顽强，焦点就是雇用与解雇的制度改变。

依靠一国霸权地位的美国因计算器通讯技术的突破（美国高科技公司 45 岁以下的技术员绝大多数来自外国），得以拖延经济的崩溃，但更加剧了社会分化。在高科技产业工作的阶层，人数并不为多，尚没有工会那样的组织方式，许多人被解雇后失去了居留身份，不得不开离美国。一般美国人工作在我第一次正式就职那样的略高于法定最低工资的公司，或者根本没有正式的工作，即使被组织在劳联-产联的工会旗下，根本没有权力与公司交涉包括受雇用权在内的劳动权。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任何工人无论什么原因，只要参加过三次罢工，就可以被开除解雇。

作为一个产业，如果它整体上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不是劳动行为。所以，按照“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股票投机行业即使禁止不了，也不能让它膨胀得足以支配、影响经济。目前世界经济的危机来自于它的政治制度：广大的迫切希望提供自己的劳动力的劳动者找不到“买主”。这告诉我们这个制度已经破产。

任何制度都必须确立在劳动权这个基本人权之上，只有这个基本人权获得了保障，才有可能为进一步的社会政治权益，如受教育权、基本医疗福利等提供基础。劳动权其实就是生存权，因为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希望、都必须劳动才能生存。不能提供、保障劳动权的制度就是不合理的、不道德的，也是反人类的制度；与奴隶制度一样，这样的制度应该被废止、被摧毁。

[首发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 年第 4 期]

## 15. 年轻的美国劳动党

我到美国来后，尽量利用条件实地参与、研究美国的各种进步团体和活动。与日本的左翼团体一样，美国的进步团体之间关系复杂，所以我一般在一段时间内只参加一个团体，在基本上研究清楚其主张、政策、历史与现状后就逐步脱离，转向另一个团体。

2002年春天我参加圣何西（San Jose）和平中心主办的“北加州和平运动团体联合会会议”中关于美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分科讨论，认识了劳动党成员的主持人Perry。他向我们介绍Labor Party劳动党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联合各种团体、推动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



1992年民主党的克林顿刚入主白宫时，为了答谢工会等支持者，曾由克林顿夫人主持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医

疗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但此尝试很快被保险公司在华盛顿的贿赂收买击败、不了了之。1996年在华盛顿成立的劳动党主要就是由不再对民主党抱有幻想的工会们推动成立的。在由1,400名代表出席的成立大会上，劳动党宣言：“在至关劳动人民生活的最重要议题——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关税总同盟（GATT）、健康、医疗、以及组织工会、集体交涉、罢工的权利上，民主党与共和党都出卖了劳动人民。”

我随后出席了劳动党圣何西支部每月一次的晚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当即填表签字、交纳“党费”，成为一名普通的劳动党党员。



晚会由我们都熟悉的菲尔与安妮夫妇的吉它演奏开场。菲尔在一个机场当职员，每逢进步团体集会，总缺不了他们。<sup>74</sup>从他们的演唱中，我真正体会出音乐的社会功能，感受到另一种（淳朴、友爱、蔑视金钱权势的）美国。我们顺着“拳击者”Boxer 民歌的调子，开心地合唱“我这个大混蛋”的歌词：“我是一个政客，乔治·布什是我的大名……”

我们接下来观赏两个劳动党制作的宣传录像，并进行讨论。第一个录像是介绍跨国公司以及支持它们的国际经济体系如何摧毁中南美洲的当地经济与民众生活的。我从德国传统较浓的威斯康辛州移到加州后，立即注意到这里的最大“种族”是讲西班牙语的拉丁/墨西哥裔人口。他们是美国与中南美洲的联系纽带，是各种政党争取的票源；他们也最理解中南美洲人民的苦难与奋斗。例如，在几乎所有的被纳入美国经济体系的国家中，普通民众唯一改善生活状况的途径就是想方设法“偷渡”一个年轻人到美国打工以救济亲属。但堕落的国际经济体制赢利的前提就是廉价劳动力不许移动，所谓“自由贸易”只是支配钱物的资本家阶级自由移动的权力。劳动党提出“公正贸易”的口号取代“自由贸易”，主要着眼于限制钱物的移动。

我介绍了中国劳工“偷渡”的事例，以及日本的外籍劳动者的受歧视状况，并提出“开放国界”的概念作为另一种选择：允许劳动者自由移动到任何能够提供较好待遇的国度、城市。这也是欧盟 EU 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NAFTA、亚太经济合作 APEC、世界贸易组织 WTO 等机构的不同之处。具有反共，“爱国”传统的劳联—产联 AFL-CIO 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口号，劳动党内工会们也不愿显得激进，吓跑可能的同盟军。许多在下层支部，成员中的民主的、革命性的要求几乎没有可能在官僚化了的中央机构中表示出来。幸好拥有两百万成员的劳动党尚处于成形阶段中。

另一个录像就是揭露目前医疗保险制度的罪过。除了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多采取强制性的“全民保险”体系，由政府监督统一管理，

---

<sup>74</sup>可从网上收听他们演奏的美国传统歌曲：[www.ambergrass.com](http://www.ambergrass.com)。

节省许多不必要的竞争浪费。我在日本期间，可以自行选择医院而且只需付 10% 的费用（一次两、三百日元）。但美国的医疗保险，完全由“市场利润”支配，非常贪婪、违反人道，而商业化最发达的加州最残忍。圣何西是硅谷中心，富人居住在附近的小城市，穷人多居住在市中心。在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富裕小城集中了八家医院，而整个市区只有一家医院。这家医院被一家公司收买后计划搬出市中心，劳动党圣何西支部与许多组织正在动员、请求市政府出面留住这家医院。

美国的保险金额、程度五花八门，除了浪费在无益的行政管理、市场竞争的开支，保险公司上层人物的报酬也与高科技公司的总裁们看齐。结果造成全美有 1/5 的人根本付不起任何保险，同时有 1/3 医院设施空闲不用，与市场“看不见的手”支配下的农牧产业等相似：有许多人没有温饱，同时有许多鲜奶、蔬菜、肉类却必须埋掉以保持价格不降！前两年，圣塔·克拉拉县（下辖圣何西及附近城市，即硅谷地区，年输出产值与纽约并列全美第一）收到烟草公司追付的一大笔意外税金，颇具进步精神的县议员们提议给予全县 18 岁以下少年儿童免费医疗保险，但最终未能实现。

劳动党把改革医疗保险制度作为首要目标，是很明智的战略决策。与别的西方国家相比，从最落后的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着手，并不比当年民主党人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激进；相反，因为现在的民主党堕落与共和党相差无几，才不可能推行这种温和的民主主义改革。劳动党如果能够成功地团结大多数美国人达到这个目标，可能会确立自己作为独立于目前为止的两党专制之外的第三党地位。

当然，如果意识到在硅谷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生产力地区的上百万人口中，只有三十人左右参加劳动党的晚会，就可以明白这将是多么困难的工作。能否把人数不多但战斗精神强盛的社会主义各派别、无政府主义团体动员来共同工作颇不容易。为了不吓跑任何可能的同盟者，劳动党的正式文献没有提及“社会主义”这个词，但它的政策、纲领明显带有社会主义成份。在最基本的反对资本家、保护环境、社区等课题上，劳动党能否与注重选举战略的绿党合作，也很难

办。如果劳动党要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投入竞选，还会加剧与那些附属于劳联—产联的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工会组织的矛盾。这些都使得原计划在 2002 年春季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推迟到秋季举行。

我同意这样的美国史观：即六十、七十年代的反战、民权运动完成了自废奴运动以来的第二次美国政治革命，选出了不少黑人、拉丁裔人进入国会和地方政府部门；现在，美国需要以经济正义为直接诉求的第三次革命。冷战的结束不仅击垮了作为挑战对手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集团，同时也在随即的“后冷战”展开中征服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日、欧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确立了以华尔街为象征的“一美元一票”的股份市场支配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整个人类的生存都被日益深重地套在越来越庞大的世界赌博机器上、把人类财富向越来越少的人积聚。从这个意义上看，劳动党在美国为争取经济正义的斗争，直接影响到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值得关注。

[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2 年第 3 期]

## 16. 国际经济学的政治条件

今天我们所知的国际经济学，只是围绕着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活动展开的理论，除此之外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这样的理论。它目前有两个明显的矛盾特征：一、在全球化、世界贸易组织 WTO（以及较小范围内的世界银行 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等机构、体制）支配下的国际经济政策与实践越来越深入地影响世界各国的民众的远远超过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二、作为理论的国际经济学越来越显露出狭隘的利益局限性，堕落成权利与财富拥有者的工具。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论则成为国际经济学的出发点。从抽象的理论意义上看，社会分工论与自由贸易都可能为全体人类带来更大利益，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不同的国家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时自觉或无意识地强加或利用了不同的政治条件。遗憾的是，国际经济学本身放弃了经济活动中的政治、道德研究而屈从于被国家操纵的“主流”政治价值；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学虽然越来越多地强调经济因素，但几乎没有政治学者研究经济学本身、没人过问国际经济秩序的非合理性。<sup>75</sup>

不可否认，国际经济学的技巧、方法方面可谓相当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数学模式、计算机分析甚至极大地丰富了数学·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但它也带有两个负面效应：一、精于计算的经济学者往往忽视经济活动的人的属性，甚至以除去价值判断因素为目标，实际上使他们屈从于最肤浅的价值判断；二、许多没有受过较严格数学训练的经济学者误用、滥用数字表格自欺欺人。当然，这后一项缺点也是许多别的人文学科的通病，是比较容易纠正的。

---

<sup>75</sup> 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台湾问题的研究。除了利益支配下的不同政治观点表述外，研究者往往用“台湾半数以上的 FDI（外部直接投资）代替对海峡两岸经济活动的研究来说明其政治含义。

国际经济学的最大理论缺陷在于当它从最简单、抽象的（因而也是不易为人们所反对的）“自由贸易促进全体利益”的李嘉图模型逐步推演到复杂的、现实的国际经济活动（如美国-西哥贸易、中美贸易谈判）时忽视了制约这些经济活动的国际政治条件。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与杂志<sup>76</sup>都只谈物与钱的周转而避开人的移动或者把人的移动至于钱物的移动之下。如果说普通经济学不得不面对雇佣与失业、资源与人口、教育与贫困以及税收、环境等人的因素而多少体现出“一人一票”的民主主义精神，<sup>77</sup>国际经济学则完全偏注于竞争、汇率、资本、市场等“一美元一票”的利润关系，不能控制钱·物的人没有资格谈国际经济学。怪不得几乎所有的国际经济学家在任何国家都异口同声地非难政治家、利益团体不懂科学——国际经济学。实际上，他们本身已经成为最高级、虚伪的利益集团在世界范围内为自身追逐最大利益。

国际经济学的毕业生们在任职西方政府的商业、外交部门时也谈到“人权”，例如，囚人的产品是不能进口欧美日市场的。在这一点上，与其指责其虚伪性（即不发达国家的囚人产品因价廉而挤垮发达国家的市场），到应该承认这是一个进步，即它们多少联系起国际经济学中的人的因素。更进一步，应该明确指出：与别的经济学分科一样，既然经济活动的产品·服务都是人制造·消费的，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就是“人”。当代国际经济学的缺陷、或者说是堕落，就是它脱离了“人”（即人类整体的利益）而附属于物·钱（即控制财富的越来越少数的“精英”阶层）。

与囚人的产品一样，奴隶的产品也不被认可为“自由贸易”的交换产品，因为它不符合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论原旨。实际上，自由贸易的

---

<sup>76</sup> 如 Paul R. Krugman &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Addison, Wesley, 1997. 这是目前最时髦、最权威的专著。

<sup>77</sup> 实际上，随着冷战结束后英美式的股市驱动型资本主义的“胜利”，日式式的注重福利型的“社会资本主义”被迫转向，资本主义中的经济民主性已经趋于死亡。

首要前提是自由劳动，即劳动者的自由移动。如果美国内有一半的州保有奴隶就只得靠内战来解决的话，如果美国人在不同的州间自由移动是美国经济正常运行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的的话，<sup>78</sup>如果欧洲联盟（EU）在货币统一的同时允许劳动者自由移动寻找较好的待遇的话，为什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亚太经济合作 APEC、世界贸易组织 WTO 内的劳动者就不能自由地移动呢？

道理很简单：如果劳动者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自由移动，跨国公司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削被限制了移动权利的廉价劳动力。对于被限制了移动权利的劳动者而言，他们还不得不欢迎跨国公司来剥削他们，因为他们的所在国政府早已被跨国公司所收买。这就是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以及为这个体系服务的国际经济学的本质。

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广泛的政治运动外，必须改变整个经济学、特别是国际经济学的价值取向，使它为“人”服务。从窄意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的改革诉求上，“开放国界”或“人的自由移动”应该是自由贸易的必要政治条件；否则，所谓的“自由贸易”只是变相的奴隶贸易，必须被摧毁。

[ 2002 年 6 月 17 日 ]

---

<sup>78</sup> 前几年高科技经济兴旺时，有不少人从别的州搬到加州来工作。贪心的加州政府收取它州汽车四百美元的“环境保护费”。不服的人控告到联邦法院，法院以“妨碍州际贸易”的罪名判决加州政府要赔偿损失。

## 17. 具有深远意义的美国反战运动

昨天（2月15日）是世界范围内反战游行日，在西方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都爆发了反对美国当局战争行为的游行，其规模接近千万人次，超过了越南战争期间的反战运动。

正好在一个月前，我刚参加了在圣荷西市中心的抗议搬走市中心唯一综合医院的游行。圣荷西虽然是硅谷——世界高科技的中心，但市中心的居民多为贫民，没有医疗保险，不少人在医院看病无法支付费用，所以医院股东决定把医院搬到附近的富裕小城市。那次主要由“拯救圣荷西医疗中心联盟”与劳动党组织的游行只有近百人参加，而我已经习惯了在美国参加势单力孤的游行等政治活动。

当我昨天带着小孩赶到市中心的集会公园时，一下子感到了鼓舞。这是圣荷西有史以来最大的反战集会，据电视台报道有三千五百人参加，实际数目可能不止。更令我兴奋的是，集会包括了美国社会的各种阶层：除了我熟悉的圣荷西和平中心、劳动党成员的面孔外，不同种族、年龄、性别、宗教、职业的人都聚集到同一个反战的旗帜下。置身其中，我明显地感受到安全与信任之情，也切实地感受到人民的力量改变了世界。实际上，布什不得不随后发表一个声明，称他也认为战争是“最后的迫不得已的手段”。如果再考虑到二月十四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的讨论、伊拉克民众受到鼓舞而大大加强防卫的决心使得美国政府更加顾虑战争的损失等等因素，战争的可能性大为减少了。

另一方面，高涨的西方反战政治运动，随同西雅图、热亚诺等政治、经济抗议活动，必将对中国的民主运动赋予新的、进步的方向，进一步摆脱美国政府的控制，使中国民众与世界民众的抗争结合起来。

[2003年2月16日]

## 18. 丹尼斯·约翰·库辛尼奇竞选总统宣言<sup>79</sup>

俄亥俄州克列弗兰德斯市

2003年10月13日

谢谢大家到此与我分享这个不仅对我，而且对克列弗兰德斯市也很重要时刻。我们都记得，曾经有一个从钢铁厂高炉中生起的燃烧火炬，照亮着我们亲爱的克列弗兰德的夜空。它是那么的明亮，映照到我们的车里。孩童的我把脸紧贴着车窗，出神地注视着火苗上升。它使我充满好奇心，它激起了我的希望，它使我忘掉了同住在车内的爸爸、妈妈以及我的四个兄弟姐妹。



火光的力量激发出梦想。虽然当我17岁时，我们已经在21个不同的地方（包括几次在车“房”）居住过，我常常沉浸在火焰光亮的幻想中，直到今天的这一刻。

我们被教诲发出自己的光亮和真理。当孩子们把希望的火炬装入他们的胸膛时，他们知道，黑暗将被火光、星光、阳光以及心灵之光所征服。

此刻，我决心肩负起今天和明天的光明。让我们帮助那些正在寻求希望、寻求家园的孩子们，教他们如何发现光明、读书学习、唱歌跳舞、热爱人生，如何从一无所有召唤出被称为奇迹的新现实。当我们的信念与内在的展望相结合时，奇迹就发生了，相信就变成了目睹。

---

<sup>79</sup>译自 <http://kucinich.us/announce-news.htm>。笔者没有任何国籍，但为此文作者义务组织 Friends of Kucinich, Japan，帮助宣传他的政策。



此时此刻，我们不仅在庆祝一个曾经生活在车中的内陆城市小孩成为美国总统的梦想，更是在确认我们的责任，让每一个孩子都发挥出创造性的潜能，变成有价值的人，去热爱、去奉献、去领导，去实现伟大的“美国之梦”。

上个月我提出了一个法案。作为总统，我将寻求立法，为所有 3 至 5 岁的学龄前儿童，提供每周 5 天的早期学习条件和必要的营养。这项事业的资金将来源于肥大的五角大楼开支的 15% 的削减。我们都知道，五角大楼开支浪费巨大，削减 15% 的开支不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相反，这笔可以为每个孩子节省出 5000 美元的开支，可以提升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使每一个家庭都受益。我也将以同样的努力，为所有美国青年提供免费的公立学院和大学。

我们现在更深刻地理解高耸在国会众议院大门上的雕刻：一个妇女伸出她的手臂，保护着坐在书丛上的无忧无虑的儿童。这件艺术品的标题是“和平保护天资”。是的，和平而不是核武器，保护着天资。只有永恒的爱才能保护孩童的天资，而孩童的天资正是通过爱护和教育而达到的。

我就是为了和平女神能够把美国和世界上所有孩童都庇护起来而竞选美国总统。我们要保护孩童们免于贫困和战争，把他们置于仁爱之光、和平之力量之下。

我就是为了挑战这个使如此之多的美国孩童和成人陷于恐惧、暴力和贫困，并强迫我们支付我们不想要的战争、牺牲我们孩童未来的现行制度而竞选美国总统。

我就是为了创设一个内阁部长级别的和平与非暴力部门而竞选美国总统。自从我 2001 年 7 月提出这个法案以来，已经有 50 名国会议员同意、支持这个法案。新设的和平部将实施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梦想和展望，让非暴力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我们能够实现它。通过教育我们的孩童和平、分享、慈爱、付出和相互尊重，我们能够实现它。折磨着我们的家庭与社会的很难得到解决的家庭纠纷、社会暴力，都能够通过教育改善。我们美国人能够以集体的努

力，专注并解决暴力矛盾。和平部知道我们有办法对付校园暴力、种族冲突和性别歧视。

正是那为我们国家带来自由的力量，引导我们把自己从暴力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通过使非暴力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结构性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教育和平、教育如何解决冲突，把我们的社会与家庭从暴力中解放出来，证明美国的进化是由内在因素造成。当和平深植于我们内心深处，和平也就显露在我们社会和国家的外延。那些我们珍贵的、为国家光荣服役的男女同胞们，现在正站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因为他们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相信战争不可避免必然导致暴力。如果我当选总统，我将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合作，让战争成为历史，让核武器不复存在。美国必须领导和平，必须重新回归国际社会。

为了回归国际社会，我们要立即签署生化武器公约、小型火器条约、地雷条约，立即加入国际犯罪法庭和签署京都气候变化条约。现在在美国回归国际社会的时刻了！

当我们回归国际社会之后，我们可以确认和平的原则，将它高高举起。此时此刻，当我们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兄弟姐妹们被镣铐在恶性暴力循环之中，我们多么希望和平之手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和平共处。美国不可能踩在战争加速器上同时又倡导和平。

我们的和平工作只有当我们弥合自身的社会创伤时才能得到加强。今天是时机，提醒我们医治原住美国人的悲痛的必要。当开发演变成掠夺，原住民的律例因为所有美国人的事业而被排除时，他们被迫流离失所。

我响应国会议员约翰·孔叶的倡议，研究如何赔偿那些先祖遭受奴役的非洲裔美国人。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奴隶制度与种族主义的后遗症仍然存在于我们中间。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因为如此之多的非洲裔兄弟姐妹们，仍然被禁锢在贫困、陋宅、失业、破烂学校、没有健康保险、没有希望的监狱中。我知道这些，我的兄弟姐妹们都知道这些，因为我们时常是居住在有色人种社区的唯一的白人家庭。

这不仅是医治非洲裔美国人的伤口，这也是治愈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必须医治伤口，我们必须医治伤口！我们必须开启和解与医治的旅程。只有当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工作，都享有健康保险，都享受免费的高等教育，我们才能说我们医治了创伤。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让我们把美国高高举起！

同时，我们也要制止正在发生的由非人道的移民政策带来的创伤。有多少身不由己来到美国寻求生存的拉丁裔兄弟姐妹们，被沦为另一类奴隶的地位！他们没有法律的保护，没有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的保护，他们的孩子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必须尽力为移民劳工们创造立法和特赦，我们要提升他们的地位。我们要医治创伤！我们要为有色人种的伤痕赔偿！

我们要医治美国由 9.11 带来的悲痛、灾难和恐惧。不幸的是，这个事件被布什当局利用，去侵略一个没有攻击我们的国家，去通过一个“爱国者”法案侵害我们的自由民权。只有当美国不放弃丝毫自由民权时，才能坚定地对抗恐怖主义；只有当我们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与国际社会合作时，才能坚定地对抗恐怖主义。让我问你们，在我们自己的城镇没有能力雇用警察、消防队、紧急医护人员的情况下，我们哪有能力去充当世界警察？

这就是为什么本周我将在国会投票否决支付占领伊拉克的 870 亿美元预算。我竞选美国总统就是为了终止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就是要终止把我们带到伊拉克去的谎言，就是要把我们整个国家带回国际社会，就是要阻止那些将把我们国家带向另一场战争的更多的谎言。我们必须制止这些谎言！我竞选美国总统就是要阻止千百万美元税金流向对伊拉克的继续占领。此时此刻我站出来，大声呼唤支持我们的军队：请支持我们的军队，把他们带回家来，把他们带回家来，把他们带回家来！

人们会问：“这听起来很不错，但你如何做到这一点？”几天以前，我已经在我的网站 [www.kucinich.us](http://www.kucinich.us) 上公开了在新年前把我们的军队带回家来的撤退战略。如何做到呢？美国必须向联合国提出新的决议，包括以下三项要点：

1. 联合国在伊拉克人民能够恢复主权之前，为伊拉克人民管理所有石油资产。决不能私有化！

2. 联合国将接管所有的生意合同。决不能把合同让 Haliburton 这样的跨国公司夺走！决不能允许靠战争发横财，决不能允许把合同送给那些布什当局的捐款公司！

3. 在伊拉克人民行使主权之前，由联合国领导建立伊拉克政府的工作。

这个时刻，我们更需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让联合国来处理，让美国撤出，让我们的军队回家来！

我竞选总统就是要破除剥夺我们公民权利的恐惧枷锁。我如当选总统，就要废除可恶的“爱国者法”，就要废除不伦不类的“国土安全部”。我们要重新获得美国人民的信任，我们要建立一个信任美国人民的政府。

这场战争威胁着我们的自由民权与经济生活。对伊拉克的继续占领将会继续恶化已经高达 4500 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赤字和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

自从 2000 年 7 月以来，美国人已经失去了 300 万个制造业工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和世界贸易组织 WTO 促使工作机会逃离美国。你我都知道，跨国公司们往工人工资最低的地方移动，往劳动者没有权利、没有法律保护的国家移动。美国能改变这一点，美国能设立新的贸易规则。我竞选美国总统就是要取消 NAFTA 和 WTO。

这是公平贸易。人们会问：“你将怎么办？”我们将回到双边贸易关系中去。大家都想打入美国市场。那好，让我们来设定一些普遍的规则，帮助提升所有劳工的地位。在我们的新双边贸易规则中，我们要加入劳工的权利、集会的权利、集体交涉的权利、罢工的权利、起码工资及福利的权利、安全工作的权利、退休福利的权利。这样才能保护美国劳工，才能提升全世界劳工的地位。现在是时候了！

我们需要回忆起曾经有段时期美国经济陷入危机，有一个叫福兰克林·罗斯福的美国总统面对破落的国家经济告诉我们，“除了恐惧自身，我们没有什么可恐惧的”，并推动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重建美国。作为新的美国总统，我将推行新的“工人进步行政”WPA政策，重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桥梁、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上下水道、我们的能源系统。我们能够重建美国，我们能够重新雇用百万劳工。就在我们克列弗兰德，有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Glen研究中心。我将依靠NASA的天资帮助我们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如果我当选美国总统，NASA将领导美国的公共与私立部门通过专利转让开发推出在科研、能源、材料、通讯、环境、保护、医学等领域的技术。这个公私合作将创造未来的产业，将创造新的高科技工作机会。我们有能力达到这一点。

同样地，如果我们推行一个新的医疗保险系统，我们也将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我们都知道，有多少地方，有多少员工被解雇是因为雇主没法支付员工健康保险的开支？员工的健康保险福利已经不能再减少了！我们的健康保障系统已经不是为美国人民服务的了。

上个月，我与国会议员约翰·孔叶和吉姆·麦克德模提出了一项把利润赶出健康保障系统的法案。这个法案将为美国人民介绍一项普遍的、全民的、单一付款的系统，为人民而不是为利润运营。你我都知道，保险公司们靠不提供健康保障、靠阻止人民获得他们需要的医疗服务而赚钱。他们比医生们更有权力决定患者能够接受何种治疗。

我所提议的普遍的单一付款医疗保障制度，包括所有必须的医疗程序、免费的或额外收费的药品，也包括眼科和牙科的治疗。我们都想看到美国孩子们可爱的笑脸，但是这个笑脸是非常昂贵的，因为许多家庭都付不起医疗保险，特别是付不起牙科保险。所以，作为下一届美国总统，我要特别把牙科保险也列入普遍健康保险的账单中。

它同时也包括长期护理。不少战后出生的一代仍然有幸与他们的父母共同生活。让我告诉你们：当我们知道家庭护理的费用后，你们中的一些家庭必须放弃一生工作的所有财富，才能享受家庭护理。我

的普遍健康保障中包括长期护理、精神护理、处方医药，因为美国人民需要它们！

在我的克列弗兰德选区，高龄者们分别不同的药品，最后才付处方药品。他们不得不减少食品与衣物的购买来支付处方药品。我的普遍健康保障将包括全额免费的处方药品，帮助我们的人民脱离健康贫困。

人们会问：“多么动听啊。你能办到吗？”能！我们已经支付了普遍健康保障的费用，只是没有得到保障而已。为什么？因为钱多数跑到股票选择权、公司主管的高薪、高额利润、国会游说、推销、广告和文件处理工作去了。我们要让健康保障的钱用于人民的健康，再不能因为健康保险昂贵而让人民死亡、公司倒闭，再不能加深美国的健康保障贫困，再不能增加保险金、共同付款和额外支付。我们已经支付得够多了，只是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保障而已。

现在是让大公司向美国人民交待的时候了。我们要求他们向股东、投资者、雇员和退休者们说明真相。现在是时候了！

我将使美国总统具有独立性，促使华尔街的头头们具备较高的职业操守。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叫西奥多·罗斯福的美国总统，担负起时代的信任，挑战他那个时代的垄断。我要说，现在也正是时候了，让我们打破垄断，恢复经济的竞争力。我们特别要照顾小型商业以及家庭农场。作为美国总统，我将搬开农业领域扼杀从种子到仓库的市场的垄断，让家庭农场的产品能够到达市场，并得到他们应该获得的价格。

当然，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有经验对付垄断的。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商会，25年前，我荣幸地阻止了克列弗兰德的都市电力系统、阻止了我们的公共电力系统被一家垄断公司收买。因为我当时和现在都知道，便宜的公共电力对于我们的社会和人民是何等的重要。

让我与你们分享25年前的往事。那是1978年12月15日，我拒绝出售我们都市的电力系统。弗兰克、加利，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想到了我们住在克莱尔街10712号的马萨点心店楼上时，爸爸与妈

妈坐在餐桌前一文一文地点数铜币支付水电费的情形。我至今还听得到一分一分钱币落到桌面上的声音：叮当，叮当，叮当。那个声音在我面临出售克列弗兰德都市电力系统时响个不停。

啊，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想让你们都知道，我从未忘记我来自何处；我想让你们都知道，克列弗兰德教会我的经历，我想将它与每一个美国人分享。那就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环境，任何人都可以来自贫贱去领导国家，人道的热爱与精神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我已经目睹了奇迹，我已经目睹了克列弗兰德人民创造的奇迹。在我任职期间，你们帮助我拯救了已经被出卖的都市电力系统，你们帮助我开放了已经被关闭的医院。当别的城市绝望了的时候，你们帮助我解救钢铁厂，让它的烈焰继续照耀在我们的工业地带。正是因为你们，正是因为你们，我学会了希望的力量、乐观的力量、光明的力量！

许多年以前，一个叫库辛尼克的来自克罗地亚的贫穷青年只身移民到爱丽丝岛，来到自由女神像下。因为他那蹩脚的英语发音，人家把他的姓也改成了“库辛尼奇”。是自由之光欢迎了我的祖父，是自由之光欢迎了成千上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把美国与整个世界联结起来。我们的竞选就是要把来自各处的崇高精神联系起来。不管你是彼得、劳生、或是琼斯，来吧，加入我们国家重建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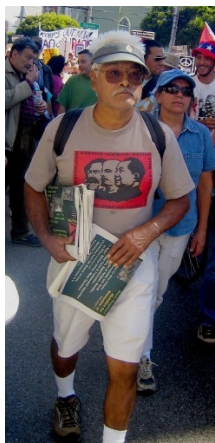
今天，那引导我祖父来到美国的光明，那仍然闪烁的公共力量的光明，那仍然点缀着克列弗兰德钢铁地带的夜空的光明，激励着我准备照亮整个美国。我叫丹尼斯·约翰·库辛尼奇，今天我宣布，我要竞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 19.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四日的反战游行

今年初以来，全美的各反战团体就开始策划在9月24日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反战游行。其间有些组织出于现实考虑，建议不要涉及巴勒斯坦问题，而专注于从伊拉克撤军问题。这个分歧到九月初仍然没有解决，甚至传出分别游行的计划。这引起了广大的反战人士、反战团体的担忧，包括笔者的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在内的团体和个人都联名呼吁统一行动。

正是基于壮大声势的考虑，在圣荷西等城市的反战人士决定都集合到旧金山去参加游行。24日早上，我赶到集合地点，与上百名同志和朋友乘车前往。

这是我第一次到旧金山参加抗议活动。我过去一直因为交通拥挤、停车困难不愿去旧金山。我们在会场附近停车后，就遇到许多人从不同的方向朝会场会集。我一下子就感到一种自由和解放的气氛，在这里可以遇到几乎所有的美国进步力量团体或个人的诉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会、妇女运动、宗教人士、高中学生



以及保守派人士等（插图中有毛泽东、列宁和马克思头像）。我特别注意到有不少亚洲系的学生。有一个女学生看到我签名后用中文向我致谢。除了各种招牌外，许多社会主义团体也在积极推销他们的报刊、书籍。十年前我刚到美国时在威斯康星大学校园加入过国际社会主义组织 ISO，在严寒中叫卖其报刊 Socialist Workers，<sup>80</sup>今天又看到这份报纸，好像见到分别了很久的老朋友。

我与刚结识不久的马克思主义者 D·E 律师

<sup>80</sup>见本书“美国校园里的社会主义活动”。



交谈得较多。他在越战期间受组织派遣去越南帮助越共抗击本国的军队，回国后曾被美国警察拷打，至今后背不能正常活动。作为旧金山进步律师协会的一员，他被总部设在印度的国际律师组织派遣到北朝鲜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刚回来。他介绍说，今天在旧金山活跃的许多进步团体的组织者过去都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信徒。伊拉克战争以来，有一个叫“Not In Our Name”（不要用我们的名义）的组织很有声势，在欧洲、日本的反战示威中也常常见到这个标语，但在今天的游行中却不见踪影。D·E告诉我，该组织者过去是毛泽东的信徒，现在自称是美国的“毛主席”，搞个人崇拜，失去了上千名成员。运动造就了这些名人、“英雄”，也容易将他们抛弃。

集会一个半小时后开始游行，游行进行了两个半小时才结束。我无法数出有多少参加者，后来读报道，说有两万至五万人，是伊拉克开战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抗议活动。同一天，在华盛顿有十几万人参加游行，也是开战以来最多的一次集会。美国的报纸、电视都作了广泛的报道。这是一次成功的游行。

如果联系到最近的新奥尔良等处的自然灾害，可以说小布什当局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但这并不自动地等于进步力量的增强，相反，AFL-CIO（劳联-产联）在连续衰落的颓势中却分裂出40%的工会成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显示美国劳动运动的危机。在全球化的震荡中，作为震源的美国社会矛盾正在日益加深，更需要更多的9月24日这样的政治动员抗议社会不公，以建设一个较好的未来。

[2005年9月24日]

## 20. 美国期中选举以后的局势展望

2004年10月我出席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年会时，到会的国会议员 Anna Eshoo 情绪激愤地形容美国处于黑暗年代。确实，一些在美国的中东出生男性甚至开始躲藏起来，倒是一些伊斯兰女性勇敢地站出来向美国公众诉求，反对诸如“爱国者法案”。在小布什再当选的那天，我遇到人间议程 Human Agenda 执行主任 Hobbs 律师，他说简直不可相信美国选民如此愚昧，还要在小布什的谎言和残暴下生存四年！我劝他不必太在意选举，他知道我是无国籍人士，在“社会主义者”当上日本总理大臣时不得不逃离日本。

当然，无论你多么厌恶美国的选举，其结果影响、决定着许多人的命运。要有什么样的死亡报道才能唤起美国选民的良知促使他们撤回开出的让小布什当局滥杀无辜的空白支票？就在投票前四天的十一月四日星期五，一个叫 Ritscher 的 52 岁反战人士在芝加哥的繁忙道路上点燃了汽油自焚。有的报道称他死得“徒劳”，而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爱国殉道烈士。

正是无数看似绝望的反战运动感动了上帝，让美国选民在这次投票中明确地以伊拉克战争作为选择标准，要求美国执政当局改变政策。小布什不得不立即撤换了伊拉克战争的直接策划和操纵者拉姆斯菲尔得的国防部长职务，并亲自跑到约旦想促使伊拉克的傀儡政府接下美军镇压反叛的包袱。不过这一次，没想到连伊拉克的傀儡“总理”也不领情，拒绝按时到约旦去听命。

如果按照国际上和美国普通民众的要求，美国政府应该承认罪行，请求联合国来接管、处理已经陷入内战的伊拉克。要达到这一步，必须在美国弹劾小布什并把以他为首的战争罪犯送上法庭。不过，在这次选举中拣到便宜的民主党上层并没有这种意图，他们将配合小布什继续执政，帮助小布什收拾伊拉克的残局。

在确定小布什已经不能支使美国参众两议院的情况下，整个世界松了一口气，相信美国不再可能发动战争征服伊朗、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国。而美国社会在经历六年的倒退之后，不得不提前（在小布什仍然当政的两年之间）面对移民、就业、医疗保险、贫富差距激增等国内问题。如果说这次选举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的话，那就是让美国的政治生活回到现实，面对美国民众切身相处的问题，迫使政治人物、新闻媒介等展开辩论，为两年后的大选确定走向。

在实际的投票中，为了反对小布什的执政，许多人迫不得已投票给民主党以击败共和党的候选人。现在，在民主党已经控制众参两议院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要求当选的政客们履行诺言，推动移民法改革，促进就业、采纳全民保险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继续推动美国政治朝着进步的方向转换。

[2006年12月1日]

## 21. 中美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困误

3月17日上午，我赶去奥克兰Oakland的Niebyl—Proctor马克思主义图书馆参加由社会主义者Ann Robertson女士讲解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座谈会。她主要是根据自己2003年写成的“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哲学根源”小册子展开，开首以在美国校园中流行的“乔姆斯基热”为例说明美国的年轻人受乔姆斯基影响之肤浅，进一步介绍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批判。约有二十人参加了座谈（几乎都是白人，这使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奥克兰是美国黑人政治中心之一），除了与图书馆相关的美国共产党同情分子，有半数接近无政府主义的人士。多数发言人的意见如下：(1)目前情况下，无政府主义倾向影响青年参加反战等运动，是可喜、难得的，不懂马克思的理论无所谓，如果再象第一国际或西班牙内战中那样争夺领导权，最终都会失败；(2)巴枯宁在理论上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突出代表，蒲鲁东的思想更深刻一些；(3)我介绍自己在最后逃离日本时，松散的3A

(Asian Anarchist Alliance 亚洲无政府主义联盟)曾经开会决定，终止一切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毛”论争，共同斗争，这引起与多数人的赞同。在州立大学教哲学的Robertson女士面对这样的结果有点狼狈，承认还要学习，又说她还有事就提前离会了。（我后来注意到她在停车处与美国共产党的一个活动分子谈了很久。）

我第一次决定参加由美国共产党主办的活动，有些犹豫。因为我自从到美国来，虽然参加过十多个社会主义·和平·进步组织，目前仍然是劳动党成员，但对美共一直敬而远之。这一方面是因为不赞同其理论，粗知一些其内部斗争丑闻；另一方面也不想联邦调查局FBI和移民局CIS收集我的一大迭材料中再加上一份麻烦证据。但我这次终于决定造访此地，乃是受到D.E 律师邀请，为一个“不速之客”（中国共产党中央编译局代表团）当翻译，一举两得，实地考察美共和中共的理论逻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下午的会议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望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度的影响”，有六位编译局和六位美共的人士先后发言。中共人士主要

是介绍中国的情况，以“政府仍然占有多数经济体”的数据来证明中国的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也附带统战宣传，说西方的右翼抹黑中国、左翼不理解中国。我因为被当作美共的翻译，不便发表意见，只能在结束时提出主要观点：政府、政党（特别是一党专制下的政党）控制的经济并不等于公有制，没有新闻自由、政党自由的政治制度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实际上是更接近“国家社会主义”的东西。

美共人士的代表是美共“学术委员会”的负责人 Erwin Marquit，他是明尼苏达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当我介绍自己原是物理系学生、是从日本逃来的政治难民时，他说他是逃离纳粹的政治难民<sup>81</sup>。一位女士推崇斯大林的“经济理论”使我感到可笑，她承认“斯大林也有错误”，我只好附和说“斯大林也有功劳”。另一位女士介绍了美共代表团前不久访中的观感。另一位教授宣读“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文。我对这些出于狭隘信条论述他们并不知道的中国没有任何评论。最后，我的朋友 D. E 律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陷入困境的社会主义”来自我辩解中国是不是还要搞社会主义。虽然他的切身观察已经告诉他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他的感情却必须支持他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信条。我们在旧金山的反战游行中相识，我知道，这位在越战时期投身越共抗击美帝国主义的老战士不可能没有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祖国”的支持来抗衡美帝国主义。他呼吁美国人民在他预感的即将到来的“美日同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冲突中以生命保卫中国、打倒美·日帝国主义。我对日本、美国左翼朋友的这些感情、心理、精神状态见识不少，学会了不以他们的各种荒唐逻辑来嘲笑他们，而是以他们的人生经历来尊重他们。毫无疑问，那些真正献身本国民众反抗自身国度政权的西方人士在真正认识中国之后，会站到中国民众一边的。

---

<sup>81</sup> 我后来从同为 Human Agenda 理事的 Hobbs 律师处知道，Marquit 到处邀请美国的官员、律师等去中国参加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类的学术会议。

最后，如果要以一个共同点来结论的话，那就是那位中共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的断言：“中国人民大多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抛弃这些价值的政府就会被推翻。”这实际上也是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危机：中共的“三个代表”（姑称之为“理论”）、一党专制的统治，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在奥克兰几十公里以南的硅谷每天可以看到最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实践），以及外交上的出卖（例如勾结日本政权迫害中国公民的罪行），把社会主义真正的价值（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等）践踏得一钱不值。失去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会维持下去吗？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会维持多久呢？

[2007年3月20日]

## 22. 为什么戈尔不再出马竞选美国总统

在 2000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时，身为副总统的戈尔志在必得，颇有众望所归的势头。我为了一睹“未来总统”的丰采，以《比较政策研究》特约记者的名义，申请到采访证得以进入圣荷西会议中心观察在这里举行的民主党加州大会。当我到达会场时，注意到会场外有许多诉求和抗议。我很尊敬的老太太 Loz Dean 在门外举着“再也不要虚伪了！”的牌子。<sup>82</sup>有一个青年男子肩扛一个很大的戈尔骷髅像，上写：“嘿，戈尔，你还要出卖我们吗？”。他非要闯进会场不可，与守门的保安发生了冲突。我与他交谈，才知道 1992 年大选时，戈尔许诺要让白宫成为“绿宫”，环境保护团体对他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戈尔（与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没有履行诺言。我后来坐在会场中央的记者席位上近距离观赏戈尔时，产生了“他真会成为美国总统吗？”的念头。

在 2004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时，许多美国人（特别是民主党人）都恳求戈尔再次出马。但我认识了另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明白了戈尔不具备成为总统的意志。那一天，我去参加硅谷的反战团体为库辛尼奇议员（俄亥俄州选区）举行的募捐晚会。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见一个国会议员用人性、人道讲政治。我特别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他身后晃动的美国星条旗也不再仅仅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了，我甚至萌发了加入美国国籍参与选举的念头。当我提前退场时，意外地受到等候在门口的库辛尼奇的问候。我向他保证，将把他介绍给中文和日文的读者。<sup>83</sup>后来，我组织了 Friends of Kucinich, Japan，其中有四名日本友人亲自赶到冰天雪地的爱荷华州为他助战。我们都知道库辛尼奇在民主党初选就没有出线的希望，但他在我们这些不计成果的“铁杆”支持者的鼓励下，坚持在每一个州去宣传、竞选，直到最

---

<sup>82</sup>后来我加入美国劳动党时知道她是劳动党的初始成员之一，他们就是因为抗议克林顿-戈尔在 1992 年当选后出卖了工会，从劳联—产联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劳动党。

<sup>83</sup>见本书“库辛尼奇竞选总统宣言”。

后在波士顿的全美民主党大会上与克里对决（别的七名候选人见没有希望早就退出初选了）。

戈尔的条件、资历胜过任何人。实际上，正是因为他条件太优越，才使他轻视“智商不高”的小布什。出身政治名门（其父是国会参议员）的戈尔本来明白，美国的选举就是互有输赢的游戏，但自视清高的戈尔被最高法院的一票之差断送了总统之路后看透了美国政治的无聊，发誓从事“非政治的道德性”工作。他获得诺贝尔奖证实了他的选择的聪明，同时又激起了人们对他是否再出马 2008 年竞选的猜测。据说，已经有二十多万人在网上签名，恳求他出马。

戈尔当然有自知之明，他知道“地球气候变暖”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利益问题，他的工作可能解除了那位扛着骷髅像抗议的环境保护者的怨恨，但他的获奖已经招致了更多的敌人。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华尔街日报》对他的攻击，其登载的文章、来信或者说他不配获奖、或者说他的获奖是对诺贝尔奖的侮辱，但背后的唯一动机，是恐惧。如果说伊斯兰极端军事力量的袭击实际上帮助了美国军工产业的订单的话，戈尔才是他们不共戴天的真正敌人。华尔街害怕，万一戈尔真的有意志参选并赢得大选，白宫真的有可能变绿，那些支配美国的石油、军工产业将面临新的、更严格的规制，甚至倒闭。

2000 年美国大选时，对戈尔友善的互联网产业正处于顶峰。今天，戈尔仍然是硅谷最受欢迎的公共人物，但互联网产业今非昔比，而新的生物工程、环境工程尚未成气候。戈尔现在的政敌，因为他的获奖，变得比 2000 年大选时更为坚决、强大。聪明过人但脸皮不够厚、意志不够坚强的戈尔，只能与白宫无缘了。

[2007 年 10 月 24 日，首次发表于美国《世界日报》]



### 23. 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政治条件

从钱里赚钱是一种“原罪”，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教义。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泉古希腊也谴责“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行为，伊斯兰教对于金融交易的禁止更苛刻，至到今天，这种“原罪”意识在国际社会上仍然影响深远。从事金融交易最频繁的犹太人被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描述成“高利贷”吸血鬼，这个描述成了历史上世界各地排犹的一种工具。

虽然古罗马、中世纪的威尼斯、近代的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等已经存在着“国际性”的金融交易市场，但只有在大英帝国炮舰支持下的伦敦交易市场才首次成为真正的全球性金融中心。<sup>84</sup>1720年第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时，伦敦市场的交易资本已经达到五亿英镑。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上独立、经济上仍然长期受制于英国的美国，是伦敦金融市场扩张的最大市场。今天，“工业（制造业）革命”发祥地英国只剩下金融“产业”在国际经济中依然还最有“竞争力”，这种安格鲁—萨克森式社会·经济自由竞争模式，在美国进一步成熟、扩张，直到冷战结束后击败日本·欧洲的社会福利模式，正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复制，主导目前的全球化进程。

不过，金融资本如何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市场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是由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的。在美国，早期所谓摩根财团担保美国金融市场的神话是基于美国殖民扩张（特别是铁路开发）的天然优惠条件。精明的摩根看到：经济上脆弱的政府不可能提供资金开发新市场，在经济剧变（不管是获利还是风险）条件下，靠固定利息不容易、也不便举债（debt），而股份式基金，<sup>85</sup>既投合投机

---

<sup>84</sup> 本文写作时主要参照了 Mark Smith, *The Equity Culture: the Story of the Global Marke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3 和 Hirt-Block, *Fundamentals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 Eighth Edition, McGraw-Hill, 2007 两书以及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up>85</sup> 英文里的 equity 这个词，用在金融行业，指“平等地”分担风险和利润的机会，而不是结果。

者的欲望，又不承担破产时的还债义务。从这一点看，资本市场的扩张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问题是如何制约。美国直到1929年纽约交易市场的大跌落，经过数年反省，才迫使联邦政府于1934年不顾金融行业的反对，制订《证券交易法》，并于次年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监督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

如果说英国在1720年、美国在1929年体验并明白了不受制约的金融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可怕影响，日本则直到九十年代“泡沫经济”之后才制订相对全面的法律规制股票交易。这也说明金融市场在日本还不“发达”。笔者1986年至1995年在日本学习、工作期间从未购买过一份股票，当我在公司里读到诸如“禁止内部交易”之类的通知时，感到这与自己毫无关系；绝大多数日本人也不购买股票。日本的上市公司，多数股份被所属企业集团的银行或公司持有或互相持股，很少交易，只提交年度财务报告（不象美国公司必须提交季度报告等），不必担心股东大会的挑战。由于可交易的股份很少，加上各公司用以担保的不动产资源（土地）在日本奇缺，日本的股市主要被银行直接地和政府间接地操纵，在1987年10月底，几乎没有外国资本的日本股票市场，股市价值换算成美元后，首次超过了美国的股票市场，由此也可见金融“产业”远离实际的商业价值，是特殊国际政治条件和畸形经济体系的产物和象征。回顾起来，如果日本、德国战败之后，在强大的“行政指导”下复苏的经济体系不压抑、“指导”金融业（让其只作为“服务”行业），哪能有它们的“经济奇迹”？

1987年以前，各国的金融市场相对封闭，但自从同年十月的全球性股票市场同时跌落之后，西方金融市场已经密切地联系到一起了。1992年9月，试图维持英镑价格的英格兰银行灰头土脸地被“防避”基金<sup>86</sup>投机家索罗斯击败，象征着连英国这样的超级主权国家也不能控制自己的金融政策，更何况象墨西哥这样的第二流国家，在1995年的

---

<sup>86</sup> hedge fund 这个用词本身就很诡秘。有些中文译为“对冲”或“套利”基金倒很形象。

比索贬值危机中，连讨价还价的手都找不到！墨西哥政府就这样被“市场”抛弃了。到2007年，我们已经面对这个事实：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在内的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已经逃脱不掉国际金融“产业”的摆布了。

所有的美国股票投资材料（以华尔街日报为源泉）都津津乐道地列出以道琼斯工业平均 DJIA 指数，S&P500 指数等经年变化的上升图鼓励人们将资金投入股市，而很少或回避不提股市上升是由于投入股市资金增长的结果这一基本事实。对于英美而言，自从八十年代撒切尔夫人一里根执政以来，把年金和退休基金完全开放给金融市场，让没有接触过股票的几乎所有有固定收入的家庭，都通过共同基金的方式持有股票。据统计，美国家庭在1980年时只有5.7%持有共同基金，到2001年，此比率达到52%。<sup>87</sup>在2001年，英美投入股市的年金和退休基金总额超过其GDP的半数，平均每个美国人投入股市的个人管理资金达到\$23780，而德国只是\$3800，法国只是\$1600。因为欧洲的年金都由政府掌管，德国从2002年开始才允许个人拿出免税收入的1%投入保险或共同基金。这就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德法的金融市场软弱不振。不过，没有受到金融市场摆布的欧洲经济，以欧元对美元的强劲上升比率来看，是更正常发展着的。

金融“产业”的这种不扩张就衰亡的特征，在2007年得到明白的印证。一方面，美国金融行业不得不盲目、愚蠢地延伸到自2001年来高科技产业衰退以来增长到尽头的房地产业，引发了次级贷款市场的危机。由次级贷款市场引发的危机导致了金融行业的危机，华尔街的所有超级金融机构，除了Goldman Sachs外，都在房屋贷款投机中损失数十以至上百亿美元，其股价跌了一半左右，等待着中东产油国、新加坡和中国的不透明“主权”国家控制基金或者专制王子的解救。另一方面，全球金融行业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南美等地扩张了市

---

<sup>87</sup> Fundamentals,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Research In Brief, Vol.12/No. 4, October 2003. <http://www.ici.org/pdf/fm-v12n4.pdf>.

场，勉强维持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微弱上升趋势。但是，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几乎已经达到尽头。例如，中国的股市价值，已经超过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本的股市价值，<sup>88</sup>其代表性的上海证券指数，在达到六千点以后，下跌了百分之二十，现在虽然有所回升，但不可能重复 2007 年那样的膨胀。那么，问题就是：已经全球化了的国际金融市场会如何发展呢？答案很简单明了：这取决于国际政治变化的条件。

如果美国政府仍然被小布什那样的人物（例如与中东专制政权联系密切的前任纽约市长 Giuliani、本人为金融大亨的现任纽约市长 Bloomberg 和靠自己的风险投资财富竞选总统的前任麻州州长 Romney）控制，华尔街会推动联邦政府把最后一笔由政府掌管的大型公共资金——社会安全基金——私营化，投入股票市场。这是迫使政府放弃对人民的最大“社会契约”，把联邦政府变为五角大楼的附属机构（目前联邦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都与军事相关）。所幸的是，所有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以及在爱荷华首战胜出的共和党候选人哈克比都反对政府的这种自杀行为。一般人也普遍预测民主党会赢得 2008 年总统大选。这也是华尔街日报连日来对总统大选焦躁不安的原因。对于中国而言，政府应该不至于为了“救市”而放松社保基金的管理，但其控制的规模 2000 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公司 CIC 的民主化决策过程却是国际金融关注的一大焦点。它的第一笔投资就是在正式成立之前的 2007 年 5 月 20 日用 30 亿美元买下第一个在美国股票市场公开交易的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黑石集团 Blackstone（也叫百事通集团）的非投票权股票。<sup>89</sup>这个代号为 BX 的公司在 2007 年 6 月 21 日定

---

<sup>88</sup> 英国《金融时报》Geoff Dyer 2007 年 8 月 29 日上海报道：“中国股市市值超过日本：如果算上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日本股市昨日收盘的市值为 47000 亿美元，而中国市场的合并市值为 47200 亿美元。”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3767>。

<sup>89</sup> China's State Investment Company to Acquire Non-Voting Minority Stake in Blackstone. [http://www.blackstone.com/news/press\\_releases/05-20-2007.pdf](http://www.blackstone.com/news/press_releases/05-20-2007.pdf).

价每股 31.00 美元，22 日以每股 36.45 美元上市开盘 (IPO)，当日冲到每股 38.00 美元，此后一路下跌，在 2008 年 1 月 9 日跌到每股 17.30 美元。当我们读到中国投资公司头头自我陶醉的第一笔投资公告时，第一个反应就是：黑石集团用什么手段收买了他们？中国政府有什么法制监督他们？中国公众有什么权力制裁/撤换他们？

在非政府的实际运营层面，也有很多作为。极个别有远见的公共人物，如前副总统戈尔，就利用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机会，投身普通人不可能介入的风险投资行业，试图带动富翁们进行“良心”投资。近年来越来越活跃的“防避”基金、私募基金等投资行业，对世界经济的支配越来越加强，却又几近黑箱操作，没有任何主权国家或国际机构可以制约它们，如能有戈尔这样的公共人物参与，会得到某种信任。但是，戈尔的主要目的，是在已经衰落的互联网产业之外，用金融资本再兴起新的“绿色产业”，以帮助美国和民主党。这种作为，一方面遭到政治上强大的能源等传统产业的抵制，一方面也限制了普通民众的参与。对于大多数持有一定股票的美国住民，如何利用 SEC 这样的较民主的保护绝大多数小股东利益的规制机构和法律监督、制约“一美元一票”的非民主运营的上市公司的运行，更显得迫切。笔者从去年开始，尝试在国际公司（如 Yahoo）的股东年度大会上以微小股东的身份通过提案发言等机会在政策方面影响公司的决定，产生了超越微小股票份额限制的效果。从理论上讲，如果很多小股东都这样行动起来，大公司不考虑这些要求就很难运营。何况，SEC 毕竟由国会议员控制，民众可以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来影响议员，甚至改变金融政策。

当然，从根本上看，在全球化浪潮中，只有全球性的民主化（例如，各个国度的民主化、对证券管理委员会的民主监督和选举，以及无钱者在各个国界之间的自由移动以寻求工作机会）才能彻底克服金融市场全球化（如有钱者可以无视各国法律在国际上自由移动）给世界带来的危机。连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主席也开始呼吁政府和公民社

会来参与全球公司的社会责任。<sup>90</sup>如果我们不急迫在政治上行动起来，整个人类的前途可能很快就会陷入操纵在一小撮跨国利益集团之下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奴役之中。

[2008年1月13日]

---

<sup>90</sup> Klaus Schwab, “Global Corporate Citizenship, Working With Governments and Civil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 24. 《华尔街日报》的政策取向

我九十年代在日本工作时，唯一订阅过的报纸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赤旗》本身没有多少新闻价值，只是使我通过它对那些我相当了解的日本事务的报道，比较全面地认识日本共产党的政策。那时，除了日共所有的日本政党都参与了政权的轮换交易，透过日共，不失为一个观察、欣赏的好窗口。例如，当我读到《赤旗》首先报道日本首相细川签字的一个日期为“9月31日”捐款收据时，我意识到这个没有政策、没有实力、只靠“清新”形象登台的“泡沫”政客的末日到来。

《华尔街日报》是我在美国订阅的唯一报纸。从去年八月以来，我每天花一、两个小时研究比较，收获不小。除了其商业影响外，我主要观察它的政策取向。这主要从它的A版后面两三页的意见栏表达出来。

首先，其非经济、非商业、非金融的单纯政治性的意见几乎没有价值，属于政治宣传广告。例如，被赶出联合国大使职位的 John Bolton 作为常客，经常就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焦点问题（北朝鲜、伊朗等）发表违背



事实的谬论，与《华尔街日报》相对客观的经济金融报道很不合拍。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学者”们（多为退职官僚）也以此为阵地暴露他们的“自由保守主义”主张。政治家本人在此发言，多属防卫性质。例如 John Edwards 在民主党内初选时遭到《华尔街日报》等大力抨击，不得不来此澄清。克林顿夫人也在此向华尔街示好，但奥巴马比较聪明，没有直接撰文，而是由两位州长为他代笔在此声明。最蹩脚的是布托夫人，竟然也跑到这里来向华尔街求援。我当时就预感到她在巴基斯坦的不详命运。

其次，有些相关政府官员来此作政策性宣示，值得一读。例如最近美国财务部长 Paulson 就次级房屋贷款问题，负责金融事务的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就知识产权等问题在此说明，都是为了安定金融业、投资人的担心。至于温家宝或胡锦涛那样级别的人物，就没有必要到这里来凑热闹了。

第三，具有特定倾向的某些教授、专家常常来这里露面，虽然不负责任（他们享有言论自由），倒可以听听他们的一面之词。他们主要借此场地为共和党的经济、金融政策献计，基本上以 Friedman 马首是

瞻，没有必要认真研究其成分有多少“科学性”。例如，名气很大的经济学论客 Paul Krugman 因其民主党自由派色彩，就不能在此发言，他的阵地是对面的《纽约时报》。

第四，有一些曾经在股票市场翻云覆雨的人物，如 George Soros，也常常来作一番“哲学式”预告，不妨听之一笑。同时，要注意有一些人是因为持有某行业的股票，来试图误导读者的。

这一年来，华尔街（美国金融市场）经历了两大剧变。《华尔街日报》如何报道它们呢？

第一是中国股票的暴发、暴落。《华尔街日报》对此几乎没有有什么深刻的认识，报道中通常只能披露一些中国股市的神秘关键人物 deal makers，完全没有分析、批判、揭露中国金融非透明、非民主的本质。这表现出华尔街为了争抢中国金融市场、为了讨好中国的上市公司到纽约证券市场来交易，不惜牺牲多年的教训而置大多数普通小股东（因为美国的几乎所有员工都通过退休基金投入股票市场）的利益不顾。例如，有一家北京公司 Xinhua Finance Media Limited，打着“新华”的名义来美国上市（代号 XFML），给别人的印象是靠新华社的垄断地位控制中国的财经新闻，其实没有任何实际业绩。

其次，美国金融“产业”的衰落过程，突显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干预本性。美国的克林顿政府财务部长 Rubin 和现任财务部长 Paulson 皆来自最大的投资银行 Goldman Sachs（高盛集团），本身就是“谁操纵美国财政”的证明。在这一次金融危机处理中，由 Paulson 亲自出面，与 Fed 联邦储备银行决定把第五大投资银行 Bear Stearns（贝尔斯登）贱卖给 JP Morgan（摩根）银行（我在贝尔斯登工作的同学形容其为“屠宰”行为），把本来管理、监督华尔街的 SEC（证券管理委员会）完全当成废物来对待。Paulson 然后又决定今后联邦储备银行可以直接贷款给投资银行。其实，所谓“投资银行”，并非从事银行业务，而是摆脱相关银行法规约束的投机基金而已。

去年 7 月，当贝尔斯登的两个“套利”（或称量子）基金破产时，SEC 就已经注意到了。原 SEC 的主任会计 Lynn Turner 指出：“SEC 应该告诉他们向外面寻求资金。如果贝尔斯登那时得到足够资金注入，就不会发生客户都来撤资的事情。”但 SEC 没有尽职，其头脑 Cox 在今年二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以及直到贝尔斯登破产的前两天 3 月 11 日，一直宣称 SEC 满足于五大投资银行的现金储备。问题不是现金不足，而是“信心不足”。<sup>91</sup>Cox 本人在 3 月 13 日贝尔斯登面临破

---

<sup>91</s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3, 2008.



产被“屠宰”的当天，竟然找不到他。原来他跑到一个大学俱乐部去参加一个官员的65岁生日晚会去了！其实，人们早知道Cox的知识和野心都不在美国的金融治理，为什么不早点换一个政客（国会议员）呢？SEC在6月底才起诉早已破产的贝尔斯登的那两个“套利”基金经理。

以笔者在与Yahoo等大公司打交道的经历，<sup>92</sup>知道SEC首先是为大公司服务的。Paulson用联邦储备银行的贷款通过摩根银行“屠宰”贝尔斯登，是因为这个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的倒闭会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那么，这本来要求加强SEC的职责，限制投资银行的赌博性危害全球的业务，但结果却演变成缩小SEC机能，扩大Fed的权力，更进一步把美国公民的税金直接可以填充到投资银行的全球性豪赌行当。这真是本末倒置，表明美国金融政策为统治集团政治利益服务的本质。

[2008年7月2日]

---

<sup>92</sup> 参阅 <http://cpri.tripod.com/cpr12.html> 等。

## 25. 瓦德·丘吉尔对西方和平主义政治的病理分析

硅谷之都圣荷西的市中心（以墨西哥裔居民占多数）相当激进，除了郡政厅、市政厅以外，教会也相当活跃。在小布什当局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的当天，Sandy（他介绍我加入美国劳动党，主持无家可归者的住宿）和 Scott 牧师等主持的紧靠市政厅大楼的教会马上挂出强烈反对战争的巨幅标语，使人感到连市政府也反对联邦政府了。我注意到这些历史悠久的教会过去都是白人教徒的聚会场所，现在被以墨西哥裔为主的信众取代，其政治取向也很明确。除了美国国内的事务（如医疗、住房、失业等问题），许多国际性的问题（如移民、战争与和平，伊朗、中东问题等）也常常由几家市中心的教会举办。

2006 年的夏天，在一家教会里举办过一场关于印第安原住民文化和安那祺主义运动的别开生面的晚会。我赶到那里，遇到几位前不久在 De Anza 学院组织抗议第一位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将军演说的安那祺主义活动人士。我本来也参加了他们的准备会议，但因为我知道自己被联邦调查局 FBI 收集了黑材料阻碍我拿到一份护照，就没有去抗议。三十多岁的白人 Andy（他有一份正常的公司工作）告诉我：他们去抗议（“扰乱会场”）时，警察对他很客气，问清他的身份就把他放了，但有三个来自东南亚的穷学生（被疑为有伊斯兰背景）被关了三天。我记得在郡政厅工作的官员朋友（他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告诉我说，他们要求警察抹消关押那些学生的记录，免得那些学生以后升学或就职时会遇到麻烦。

晚会除了印第安食品（募捐），还表演印第安部落的传统舞蹈，其中有一名很漂亮的中国长相的女子也跳得很娴熟。这使我想起在墨西哥城广场上看到的类似情形，让我们更能感受天、地、自然对人的养育之情。

演讲开始后，我感到一种在美国的社交场合少见的严肃气氛，因为三个演讲者都有独特的背景。第一位是坐在轮椅上的日本裔安那祺主义女战士（我现在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她用自己的生命在冷战期

间的公民运动、反战运动中赢得了大家的尊重。第二位是黑人安那祺主义者，讲述自己“城市地下（‘非法’）游击战”和坐监牢的体验。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以下结论：“我并不以自己的被迫害经历作为资本。但是，如果你没有准备好靠吃老鼠为生，就别与我谈革命！”这句话不是他的首创，而是在引用“经典”信念。

当然，晚会的高潮是同为原住民出身和安那祺主义战士的 Ward Churchill 丘吉尔的演讲。同时也是学者的他因为坚持自己的激进观点并付诸实践（如携带枪支），被科罗拉多大学解除了教职。身材魁梧的丘吉尔一拍身上的枪带，向听众致意：“我是一个安那祺主义者，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你们不怕自己的敌人（警察）带枪，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同志带枪？”一下子打消了大家的紧张气氛。他的演讲多少促使我改变了“绝对和平主义”的念头，大致能够理解在西方被描述为“恐怖分子”的激进自由主义战士的选择。今年初我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意大利武装激进小团体被逮捕的报道，其中一个美貌的女大学生在回答为什么要加入武装斗争时平静地说：“因为爱（穷人）”。正是因为爱和平、生命才使他们选择了常人和同志都难以接受的牺牲。美国历史上唯一因为政治信念枪杀总统的安那祺主义者 Leon Czolgosz 在被问及动机时只是淡淡地说：“我不能容忍有人这么特权。”“他是善良劳动人民的敌人。”是啊，所有的特权，包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特权，都是人类自由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权势（特别是国家权力）和富贵都不惜手段迫害安那祺主义者的原因。

丘吉尔为了证明暴力手段的正当性，在成为经典的《和平主义病理学》书中<sup>93</sup>引用了几个历史事例。一、犹太人在被纳粹屠杀时，没有人反抗。犹太人头目们争先恐后去讨好希特勒当局，以为“和平主义”可以带来较好的结局；二、甘地的和平运动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大

---

<sup>93</sup> Ward Churchill, *Pacifism as Pathology: Reflection on the Role of Armed Struggle in North America*. Winnipeg, Canada: Arbeiter Ring, 5<sup>th</sup> printing, 2005.

英帝国军力的衰落和财政的枯竭<sup>94</sup>；三、马丁·路德·金之所以被美国主流突然承认和吹捧，就是因为民权运动中“最好的”部分如 Malcolm X 和黑豹党已经拿起武器，暴力抗争，迫使美国政府选择“较小的魔鬼”（金）作为谈判对手，立法保护公民权。丘吉尔的结论是：“暴力是改变国家的必不可少的成分”（第 45 页）。

丘吉尔在痛斥西方“霸道的和平主义” hegemonic pacifism 阻碍第三世界的武装解放运动后，明确提倡要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攻击性的军事行动（例如消除重要的国家设施，瞄准政府或公司的关键人物等）（第 91 页），正如英国特种空军的座右铭所指明的那样：“谁敢（行动），谁就赢”（第 88 页），实际上把自己置于“恐怖分子”的名单上。丘吉尔的加拿大白人战友 Mike Ryan 甚至把美国、加拿大境内的原住民部落称为“第四世界”、“内殖民地”，把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美国西南部的州称为“北墨西哥”，建议：既然“60%的北美铀资源埋藏于原住民土地下”（第 152 页），如果把这些力量都动员起来，至少对于美国的军备生产是一个牵制。

丘吉尔对于国际局势、当代历史的判断不一定让人接受，他倡导的追求自由解放的战略也不一定让人信服，但我们不得不理解、尊重他的选择，而不必跟随“主流”社会去非难他。实际上，正是他对于那些力图把西方进步运动限制在“舒适领域”（comfort zone，即“合法”的行为）的主流白人自由派人士的批判，刺痛了那些人士。对于那些不愿意冒个人风险但有一定善良意愿的人士利用写信、请愿甚至集会抗议等方式表达对政府权力不满，本身值得尊敬。问题在于：有不少参与运动的人以此作为“职业”或个人机会，为了选举或媒体名声等目的，站在国家权力一方，攻击采取“非法”策略的同仁。这涉及到任何社会运动中必然面临的艰难选择，本来我们可以与他们在具体的行动中合作，但一定不能把主动权交给他们，因为他们最终会利用我们，与权力者分赃或者干脆出卖我们的事业。前几年，我曾关注过声称提高亚洲种族权益的“80-20”协会 <http://www.80->

---

<sup>94</sup>丘吉尔没有读到印度独立中关于军事斗争的记叙。据说英国首相艾得礼承认，在“赐与”印度独立时“完全没有考虑甘地的因素”。

20initiative.net/。这个由前任“第一位华人副州长”（德拉瓦州）发起的选举团体发出大量广告，其实最终目的是为民主党拉票。有一次，此前副州长要来硅谷募款，发出许多动听邮件，使我也动心准备前往。我直接给他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明作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也愿意支持（捐款给）他。没想到，他顺手回复到：“走开！我们有安那祺主义无关。”

我也不由得回想 1989 年，我们在日本的中国民主运动，就是因为一个学贼混入我们的运动，骗取了名声、捐款，最后向北京和东京的两个政权出卖了我们，教训惨痛。进一步看，“六四”以来的中国民主运动，主要也是由于少数由此民族悲剧获利的“名人”在美国、日本、台湾等国家权力面前争相出卖，迅速卖空了本来很有基础的民众运动，导致北京政权变本加厉地压迫民众。当一党专制完全失掉任何合法性的外衣，成为现代的奴隶制的今天，我们如果接受起码的洛克的“人民有权推翻暴政”的观点，就必然面临如何用各种手段结束一党专制的难题。虽然我自身没有任何暴力手段和意愿，但如果此时有中国的约翰·布朗挺身而出，我们有什么道德标准非难“暴力”呢？<sup>95</sup>

丘吉尔很赞赏绿色和平、Earth First!（地球优先！）和 Friends of the Earth（地球之友）等不惜自我牺牲的环保团体。因为目前没有国际法保护地球，所以他们“以身试法”以改变法律，其实倒不一定非要诉诸暴力。另一方面，如门诺教派那样的传统的和平主义再洗礼派，每当社会动荡时，总要被主流教会询问对国家的忠诚，现在他们在强调首先效忠天国的同时，也不免表白对国家的义务，如投票、一定范围内的军备、忠实地缴税<sup>96</sup>等。在西方世界，对于

---

<sup>95</sup>前不久，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国内企业家来访问我，谈到中共政权负责公安系统的政治局常委用军车撞死自己的发妻以娶新欢。此事无法证实，但看看中国的治安状况，可知中共政权的警务系统之腐败。

<sup>96</sup>见 Christian Leader, September 2008 第 17 页。其中带有狡辩地批驳有的信徒拒绝缴纳属于军事开支的部分（在联邦预算中高达 60-70%）税额，这同时表明教派内的动摇。

和平主义，已经没有多少明确的界限了。一般说来，安那祺主义尤其反对“权威式的”或“霸道的”极端和平主义<sup>97</sup>。我们一般地遵循非暴力的原则，但也要对具体的抵抗运动和形式具体分析。我在日本和美国二十多年，置身于不少进步事业的政治社会运动中，见识了不少西方的人物和组织，由于背景差异很大，很难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无论有多大差异，我学会了用一个标准来判别：他/她是否付出个人的牺牲以追求社会的公正。以此为标准，丘吉尔、Ryan 以及为丘吉尔此书写前言的 Ed Mead 都是我在西方社会的同志。

[2008 年 9 月 21 日]

---

<sup>97</sup>例如，参见 1996 年去世的英国安那祺主义者 Albert Meltzer 的传世之作 *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Edinburgh, Scotland: AK Press, 7<sup>th</sup> revised edition, 2000.

## 26. 废除核武器的国际政治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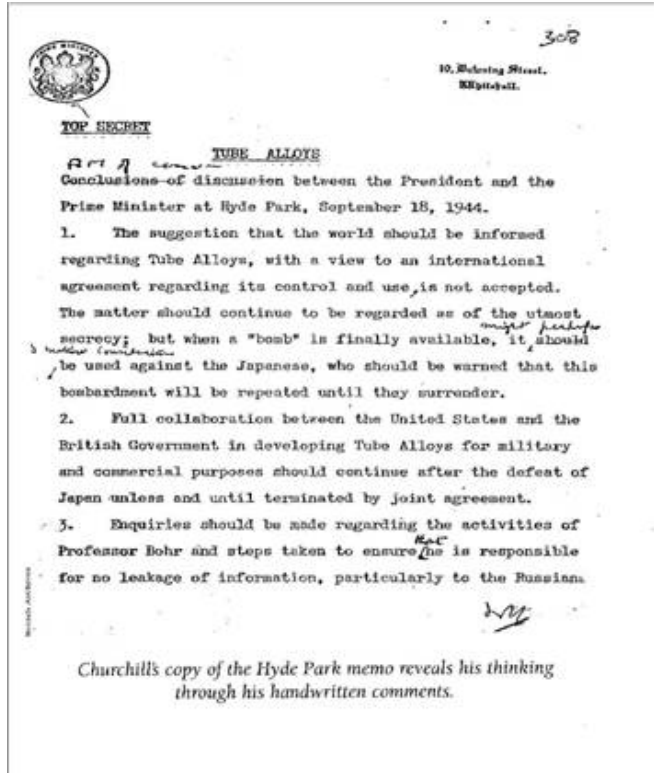
2007年1月4日，美国前国务（外交）部长舒尔兹、基辛格、前国防部长佩里、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山姆·那恩在华尔街日报联名发表“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公开信。我当时没有读到此信，后来在斯坦莱基金会发行的刊物中读到一个专家的响应文章，第一个反应是：“人将去也，其言也善。”

今年1月15日，华尔街日报再次刊行此公开信，并有不少名流联署。华尔街日报次日登载一个级别稍低的前美国政府官员的反驳信，代表美国政府的主流立场。我不由得也致函华尔街日报。没想到，华尔街日报在19—20日周末版登载了我的短信。我以自己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背景建议这些美国的冷战或后冷战“设计师”们首先要向全世界道歉，因为正是他们鼓励了世界上所有的权力都试图拥有核武器

([online.wsj.com/article\\_print/SB120070618605501959.html](http://online.wsj.com/article_print/SB120070618605501959.html))。

与这几位已经丧失对美国核政策影响能力的退休“武士”相比，几乎同时(2007年1月31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核威胁”文章的戈尔巴乔夫更有说服力。但这位曾运用权力多少减轻了人类核威胁的最后一任苏联帝国的头目，却被国际政治的现实冷落遗弃，因为另一个超级强权非但没有在苏联解体后裁军，反而加强了对世界的单独军事支配行动，造成了更加不安的世界局势。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后冷战时期加入“核大国俱乐部”，以色列毫不抵赖自己拥有核武器，连贫困的朝鲜北方也“悍然”（中国政府用语）进行核武器试验。当整个世界目睹正是因为缺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被入侵绞首的伊拉克首领的命运时，还有什么理由非难北朝鲜、伊朗等国的统治者们走向核武装的野心呢？每当我们想到整个人类的命运随时有可能被几个掌握核按钮的国家头目毁灭这个简单事实就不寒而栗，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聪明和能力毁灭自身，却没有基本的智慧废除核武器。

核武器产生于战争，战争产生于人类的罪恶政治制度。只要人类依然摆脱不了国家机构的暴力宣传，以为国家暴力在人类的社会秩序中必不可少，就摆脱不了战争、摆脱不了核武器这个战争最极端手段。而最早、最全面认识到核武器对全人类威胁的正是最受尊敬



的现代物理学创始人之一：小国丹麦的尼尔斯·波尔。在结束对美国同行的曼哈顿计划考察后，波尔1944年5月去英国，向邱吉尔首相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核军备时代的担忧，并建议核秘密应该为全人类所共有而加以管制。邱吉尔1944年9月19日手写批准的一份“绝密”文件则反应了所有国家权力头目的态度：核武器制度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波尔这样的科学家要被严加看管起来，谨防泄密（Cynthia Kelly edited, *The Manhattan Project*, p105. New York: Black Dog & Leventhal Publishers, 2007.）。

虽然爱因斯坦等犹太人科学家出于对纳粹德国的恐惧，建议推动美国政府研制原子弹，但核物理的知识和技术一旦普及，国家权力就很容易找到那些二、三流的科学家来从事核武器的开发。年轻的奥本



海默虽然参加过社会主义团体，但他没有诺贝尔奖那样的资历足以对美国的政策说“不”，正是这样的领导第一颗原子弹技术开发的理想人选，后来的从事核物理专业的苏联科学家（Kurchatov 等而不是知名的卡皮查），以及更后来的印度、巴基斯坦（加上以色列）等的核武器开发人员，已经完全不可能具有波尔那样的人类胸怀了。任何对国家权力如何利用核武器有丝毫怀疑的相关人员都受到监控和迫害。甚至连奥本海默也逃不出被怀疑的命运。波尔于 1950 年 6 月 9 日致函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呼吁各国之间和平利用、自由交流包括核物理在内的科学与技术，小国丹麦倒没有对年迈的波尔采取行动。罗素与爱因斯坦等于 1955 年 7 月 9 日签署警告核武器冷战的宣言后，罗素被迫离开大学，爱因斯坦被联邦调查局 FBI 收集了大量黑材料，以备把他赶出美国。

那些没有国际声望的人更容易被国家权力处置。1944 年底，纳粹德国的战败近在眼前，大家都知道德国根本没有开发核武器（这一点，也是德国核物理家海森堡等人的自负），一些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技人员开始动摇、讨论是否该放弃此工程。曼哈顿工程之外的科学家 James Franck（诺贝尔奖得主）、Leo Szilard（爱因斯坦在德国的同学，起草爱因斯坦至罗斯福的信）等组织 155 名科学家要求杜鲁门总统不要对日本投入原子弹，但代表美国政府意图的奥本海默等当局宣布这些科学家并不具有高于普通公民的特权去影响政府的决定，而政府已经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成功地制造出原子弹，岂有不显示自己威力的理由？当 Joseph Rotblat 向当局说明他不继续参与此工程的决心后，当局第一个反应就是把他当间谍来处置，后来迫使他以“探望在波兰的妻子”为借口请辞才放他去英国。在他 1944 年圣诞前夜离开工程的车站上，他发现自己的行李全部失踪了。他后来从事和平的核医学研究，并创立 Pugwash 组织推动国际和平事业，于 1995 年与该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美国人民被动员投入世界大战时，被政府告知是为了“结束战争的战争”。世界大战和冷战早已结束，但美国政府不但没有解散违背建国理念的常备军，反而越发扩军备战。据小布什当局提交的 2009

年财务计划

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fy2009/summarytables.html, 在总计 9876 亿美元的预算中, 国防部占 5154 亿, 国土安全部占 376 亿, 退伍军人事务部占 448 亿。不计能源部 250 亿预算中的核试验研究以及其他部门的军事性开支, 美国政府军事预算达 5978 亿美元, 占总预算的 61%。与此同时, 商务部与国际项目 383 亿美元, 占总预算的 4%; 教育部 592 亿美元, 占总预算的 6%。我们还可以比较: 从 2001 年到 2009 年的八年小布什当政期间, 国防部 (3025 亿)、安全部 (140 亿) 和退伍军人事务部 (224 亿) 的开支从 3389 亿到 5978 亿, 猛增 76.4%, 难怪这个小小的地球越来越不得安宁。如果美国民众得到足够的信息教育, 知道我们 (包括交税的笔者) 的联邦税大多数用于军事开支, 如果国会议员有起码的良心拒绝执政当局的军事预算 (让我们梦想一下把军事开支减少一半), 这个世界将会获得多大的和平! 核武器不能废除, 战争不能避免, 根本的原因是人类没能采取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制度, 而推动社会公正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每个民众 (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 首先起来反对、抵抗自身政府权力的腐败、压制、不公, 而不被自身政府欺骗、驱去反对别国的民众。

最新的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数据(单位: 亿美元)

主要部门	2001 实际	2008 实施	2009 要求	变化			
				2008 - 2009		2001 - 2009	
				美元	百分比	平均	累计
农业	192	218	208	-11	-4.8%	+1.0%	+8.0%
国防	3025	4795	5154	+360	+7.5%	+6.9%	+70.4%
教育	401	572	592	+20	+3.5%	+5.0%	+47.6%
能源	200	239	250	+11	+4.7%	+2.8%	+24.9%
健康与 人事	540	719	704	-15	-2.1%	+3.4%	+30.2%
国土安全	140	349	376	+27	+7.7%	+13.2%	+169%

主要部门	2001 实际	2008 实施	2009 要求	变化			
				2008 - 2009		2001 - 2009	
				美元	百分比	平均	累计
住房都市开发	284	374	385	+11	+2.9%	+3.9%	+35.7%
法务	184	227	203	-24	-10.7%	+1.2%	+10.4%
国务与国际	217	329	383	+54	+16.5%	+7.3%	+76.2%
退伍人员事务	224	394	448	+53	+13.5%	+9.1%	+100%
宇航	143	171	176	+05	+2.9%	+2.7%	+23.6%
总计	6438	9414	9876	+462	+4.9%	+5.5%	+53.4%

当我1980年考入清华的工程物理系时，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张静波）声明不能学习杀人的核物理而要求调换专业，当他不能如愿后，毅然退学，给我们很大的震动。我后来参观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时提起此事，日本友人们也很感动，坚定了日本非核的信念。我到美国后参加和平/正义运动，知道有一些公民在交税时特别注明拒绝交付军事开支的那一部分税金，并准备受政府惩罚。据说，联邦税务局因为害怕引起官司招惹媒体报道，加上这些人的收入并不高，至今没有采取强制行动。但这些行为都被FBI等记录在案，很有可能被政府在其他方面暗算。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一些阿拉伯出生的“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进入美国时，被国土安全部扣留，被迫签字自愿回到美国的阿拉伯社区充当特务才能入境。当笔者于2004年申请十几年没有的护照时，被移民局告知：FBI正在调查你的背景，在得到FBI的“澄清”之前，移民局无法批准。FBI的背景调查会拖多久呢？“为了国家安全，没有限制”。这样的抵制本国政府的方式当然比惯常的反对别国政府军事扩张的行为困难得多，但只有这样的伴随自我牺牲的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才能够制止本国制度的倒退，才是唯一创造国际和平条件的政治途径。实际上，当我们想到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词概念的发明者、把北美殖民地

的独立从愿望变为不可逆转的常识的第一位“建国之父”托马斯·潘恩最后被美国政府拒之境外的话，我们已经从道义上战胜了任何国家强权。如果各国的公民们都以不同的形式行动起来抵制本国政府的军事政策，这个世界才有和平的可能，才能废除核武器、常备军、战争与一切人类罪恶。

[2008年2月25日]

## 27. 美国向何处去？

我没有在这一次美国大选中花费多少精力。上一次 2004 年大选，我不顾自己的政治难民身份，无视 FBI（联邦调查局）等秘密警察的监控，组织 Friends of Kucinich, Japan（库辛尼奇之友日本分支）为民主党中唯一的坚定反战候选人库辛尼奇（俄亥俄州选出的国会议员）助选，明知没有得胜的可能却奋战到底，直到在波士顿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与克里“决一雌雄”。那一次选举，我目睹多少热血人士，为了击败小布什，不惜搬家到“摇摆州”为自己并不满意的克里助战。连安那祺主义者的世界最著名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也呼吁投票给克里，因为这是“文明与野蛮之战”。

正是我们在 2004 年大选中的奋战，为 2008 年大选奠定了基调，把美国人民拉回到现实的选择中来，注定了小布什同党（共和党）候选人的失败命运。所以，2008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实际上在民主党候选人（即克林顿夫人和奥巴马）之间展开，这就是我（以及我的同志、朋友们）没有介入大选的原因。奥巴马确实与克林顿夫人有不同的政策诉求，我们也更乐于见到他的胜出，但不值得投入我们极为有限的资源为其助威。我确也给他发出过一函，表扬他的政策进步性，同时试探他能否行使参议员的权利，阻止联邦调查局对我的反人道的非法调查，至今没有回复。

作为美国政治系统中的明星，利用小布什的野蛮政策失败的历史机遇，奥巴马显示了过人之处。例如，为了安抚白人，他毅然宣布脱离二十多年的黑人牧师教父（奥巴马生父过早离世，视其牧师为生父）和教会（不知私下是否事先得到谅解）；在最不同于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问题，毅然留用小布什的国防部长（唯一留用的内阁部长），安抚投票给马凯恩的 47% 选民。对此，我们只能说，政治的逻辑不是普通人性的逻辑，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其道德性。

当然，目睹白宫主人和平交替，虽然浪费巨大资源，不由得哀叹北京、古巴、津巴布韦等处的政治文明的不开化。当迪恩 Dean 以“伊

拉克战争是美帝国终结的开始”展开他的 2004 年反战竞选时，他本人并没法知道美帝国的凋零被小布什当局破坏得如此神速。至于送走瘟神之后，美国从今天以后向何处去，与奥巴马以及他身边的圈子（阶层）基本上没有关系。正如我们在 2004 年“美国最黑暗的时刻”（我在美国-伊斯兰年会上亲耳听到这里选出的民主党国会议员 Eshoo 也这样讲）奠定 2008 年的基调一样，只有我们所有居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才能决定美国的未来。

[2009 年 1 月 20 日]



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可以选择不打的战争”）为他赢得了国内大选和不少海外同情。不过，他的“在 2012 年年底前将所有的部队撤出伊拉克”立场已经大为倒退。奥巴马声明，“我们会无情抗击对我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主要为其阿富汗占领和增加兵力政策辩护，虽然他也明白“仅凭军事力量无法解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问题”。他不敢承认仅靠美国（及其盟友）无法解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问题。奥巴马本人支持其前任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国会当时只有一个黑人女议员投票反对），不愿意把阿富汗问题提交给国际社会（如联合国）解决。

当然，美国与穆斯林国家紧张关系的更持久根源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奥巴马首先安抚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牢固关系众所周知。这种关系坚不可摧。”然后列数“巴勒斯坦人民——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寻找家园的过程中历经苦难。60 多年以来，他们承受了流离失所的痛苦。许多人在西岸、加沙以及邻国土地的难民营里等待着他们从不曾过上的和平与稳定的生活。他们每天忍受着由占领带来的大大小小的羞辱。所以，毋庸置疑：巴勒斯坦人民的境况是不能容忍的。”奥巴马话锋一转，首先要求“巴勒斯坦人必须放弃暴力，”特别是“哈马斯必须停止过去的暴力，遵守过去的协议，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其次再劝告以色列：“美国不接受以色列继续建造定居点的合法性。”这样把受害者与罪犯同列是很不公平和虚伪的。哈马斯是巴勒斯坦人民民主选举的政府，美国至今不承认其地位，反而扶持被巴勒斯坦人民抛弃的阿巴斯傀儡政权。连英国议会也发布报告，敦促其政府与哈马斯进行对话<sup>100</sup>。我很赞同硅谷的中东问题活动家 Lin 的结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的结症在华盛顿，没有美国的巨额援助，以色列不可能这样残忍。美国不可能同时踩在战争机器上倡导和平（Kucinich 2004 年到硅谷来竞选讲演时这

---

<sup>100</sup> 据美国之音 2009 年 7 月 26 日报道，英国议会的外事委员会称，当前不与哈马斯对话的政策收效甚微。实际上，该委员会两年前就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在中东和平四方会谈中，只有俄罗斯在跟哈马斯对话。其他三方美国、联合国和欧盟都不承认哈马斯。英国议会的外事委员会说，如果没有哈马斯的更大合作，四方会谈以削弱哈马斯为目的和谈进程将难以达到目标。



样讲，会场上欢声雷动）。奥巴马必须拿出勇气，摆脱犹太人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控制<sup>101</sup>。

奥巴马在美国与伊朗关系上，承认“在冷战期间，美国对伊朗的民选政府被推翻起了作用，”并表明美国“已做好向前迈步的准备”，把球推给了伊朗。奥巴马讲演之后，伊朗发生了总统选举混乱，还不知道如何收场。对于伊朗的核开发，奥巴马“理解有些人针对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没有核武器而提出的抗议”，并重申“美国承诺争取建立一个任何国家都不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可惜，这样的涉及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核武器大国的遥远理想与中东问题的近期解决没有太大关系，他回避了目前的伊斯兰世界对以色列核武器的恐惧。世界警察美国的实力在衰退中<sup>102</sup>，要伊朗放弃充当地方（中东）警察的野心，谈何容易！

奥巴马接下来讲“民主”、“宗教自由”、“妇女的权利”、“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听起来何其相似！原来是从罗斯福 1941 年 6 月 6 日面临世界战争所发布的“四大自由”宣教而来。美国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担负起领导“自由世界”文明的使命，通过“冷战”战胜苏联帝国，多少也与罗斯福的价值宣教（所谓今天的“软实力”）有关。今天（终结冷战的天安门事件 20 周年之际），奥巴马宣告了对小布什当局的“十字军征讨”型中东政策的死刑，代表美国、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等体制开始与伊斯兰世界展开“文明间的对话”。

在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对话的另一头，端坐着他的充满尊严的对手：奥沙马·本·拉登（不管是死是活）。

[2009 年 7 月 26 日]

---

<sup>101</sup> 奥巴马任命的中东特使米切尔受到阿拉伯世界（如在美国唯一的维护阿拉伯利益的月刊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谨慎的欢迎。米切尔 7 月 26 日在大马士革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举行会谈，据美国之音报道，“会谈十分诚恳和积极”。米切尔说，近期的目标是恢复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谈判。在以色列去年 12 月攻击加沙之后，叙利亚中断了和以色列的谈判。

<sup>102</sup> 2004 年大选初期，民主党反战明星 Dean 对小布什抨击：“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empire.”（这是帝国终结的开端）。

## 29. 我平生的第一张政府投票

刚结束十几年的无国籍难民身份得到美国公民权，就收到国会第10选区9月1日投票的选票。说起来，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张政府投票。1980年我刚入大学，遇到海淀区的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因为年龄不足18岁，只好看看本校顾立基、听听北大胡平等的精彩表演了。幸好，那时有校学生会选举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sup>103</sup>

现任民主党议员 Tauscher 被奥巴马任命为内阁副部长，留出空额。我因为从事反战运动等活动在小布什执政期间被联邦调查局 FBI 刁难，只好请 Tauscher 议员帮助去 FBI 查询。Tauscher 的助理答复我说，他们为我过问了，但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我还是感谢他们，因为这毕竟也催促 FBI，提醒他们不必为了我的微弱观点如此滥用“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力。我来美以后，加入过不少政治团体（主要为了实地考察），最终成为劳动党的“终生党员”。因为克林顿上台后出卖劳工利益，劳动党1992年从支持民主党的工会中独立出来，特别推动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直到2009年奥巴马当选后才得以推动。如果有劳动党员出来竞选，我会不动脑筋就打圈了，可惜实力不足的劳动党在加州没有投入竞选，对国际政治也无力顾及。我与劳动党的 National Organizer（全国组织者）Mark Dudzic 交换过几次意见，赞同他的不介入选举的战略。如果民主党的反战议员 Barbara Lee 或 Kucinich 在我的选区，我也会情愿投票给他们的。我认真阅读了印有竞选者宣言的选民信息手册，没有找到理想的候选人。绿党的政策总的听起来不错，不过我不太喜欢其热衷竞选的名人作为。我很熟悉第一名候选人 Buchanan（民主党）的名字，因为她去年11月首次在加州议会选举中印制大量广告、战胜本地 San Ramon 市长（共和党）。我很反对制造大量广告的任何候选人，她刚进州议会，还没有完成对选民的许诺呢！另外，也有趁经济危机叫嚣诸如“封闭边境”之类的法西斯分子竞选人。

---

<sup>103</sup> 见笔者“回忆1980年的清华学生会选举”，东京《民主中国》月刊1990年6月号。

我该不该投票呢？作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我们从原则上不会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别人去代理，原则上拒绝“代议制民主”（即目前的国会选举）而诉诸直接行动式的民主。如果我决定投票，就意味着我放弃一部分权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服从自己不认同的议员“代表”。另一方面，不同于出生于此地、具有天生投票权的美国安那祺同志，被赶出中国、日本的我把包括普选在内的公民权利也看成一个很重要的经过无数历史牺牲才换来的权利，不应自动放弃。当然，政治局势千变万化，每一个安那祺主义者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取舍不同。在2004年的美国大选中，没有“资格”投票的我和许多劳动党成员积极投入竞选宣传，在民主党初选时支持民主党议员 Kucinich；在最终投票时，乔姆斯基等又呼吁投票给我们并不认可的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因为小布什的当选“意味着文明的倒退”。

我也反省自己是否会因为拥有选举权而改变了政治立场。例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许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Sidney Hook的思想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权威代表 Lucacs 或托洛茨基相提并论<sup>104</sup>。但他晚年热衷支持尼克松、从里根手中接受美国政府颁发的“自由勋章”！我庆幸自己早已“求仁得仁”，被赶出腐败的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也没有成为由资本控制的美国学术界的“无产阶级”（爱玛·古尔德曼语），成为斯宾诺莎、马克思那样的独立流亡思想家，没有可以出卖的本钱得到任何政府的“赐予”。我的“解散所有常备军（包括五角大楼、解放军、自卫队）”、“遣散一切间谍机构（包括监视移民的国土安全部）”、“免费教育”、“全民雇用”、“开放/废除边界”、“全民医疗保险”等安那祺主义不会有任何变动。在我没有任何公民权利的时候，或者支持反战的 Kucinich（2004年）、或者自告奋勇宣布竞选总统（2008年）<sup>105</sup>。今天，正如保罗有罗马公民身份才能把边缘省份

---

<sup>104</sup> Christopher Phelps, “Young Sidney Hook: Marxist and Pragmatis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105</sup>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president.pdf>.

一个小部落民族的一个异端教义转换成世界宗教一样，我的“当代罗马”公民身份并不是个人的特权，而是时代的责任。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终于找到既坚持原则又不放弃权利的理想选择，在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张政府选票上写下了最合适的名字：Jing Zhao（见插图）<sup>106</sup>。

**OFFICIAL BALLOT**  
Tuesday, September 1, 2009

A Special Primary Election		B	C Contra Costa County	
11 ■	<b>INSTRUCTIONS TO VOTERS:</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To vote, <b>BLACKEN</b> the oval to the <b>LEFT</b> of the name of the candidate.</li><li>To cast a write-in vote, locate the write-in area below the names of the other candidates for that office. Blacken the oval to the <b>LEFT</b> of the blank space and write the candidate's name in that space.</li><li>Voting for <b>more</b> choices than are allowed is an <b>OVERVOTE</b>. (Your vote for the contest <b>will not</b> be counted.)</li><li>Voting for <b>fewer</b> choices than are allowed is an <b>UNDERVOTE</b>. (You have missed a voting opportunity.)</li><li>If you make a mistake, do not try to correct it. Request a replacement ballot from your election official. (If you do make a correction, <b>DO NOT SIGN OR INITIAL</b> your ballot.)</li></ul>	<b>PARTISAN</b>		
		<b>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b>		
21 ■		<b>10th District</b> Vote for One		
		○ <b>ADRIEL HAMPTON</b> Democratic Investigator		
40 ■		○ <b>GARY W. CLIFT</b> Republican Retired Peace Officer		
		○ <b>JEREMY CLOWARD</b> Green College Instructor		
		○ <b>MARK DESAULNIER</b> Democratic Senator		
		○ <b>JEROME "JERRY" DENHAM</b> American Independent Insurance Agent		
		● <i>Jing Zhao</i>		
		<b>END OF BALLOT</b>		
A Seq:0003		B	C Typ:01 Seq:0003 Spl:01	

© Election Systems & Software, Inc. 1981, 2002  
**BT 3**

[2009年8月11日，美国 圣拉蒙]

<sup>106</sup>读者也许会问道：“如果大家都这样投自己的票，美国的民主是否会瓦解呢？”我当然没有这样的乐观，如果大家都对美国的民主这样负责，我们一定会创造自从废奴宣言、妇女普选和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的第五共和！

### **30. Re-define and Measure Unemployment in Japan, the U.S. and China<sup>107</sup>**

#### Abstract

This is no need to emphasize how important the study of unemployment is, especially in economics, yet until today there is not a universal definition to measure unemployment to be us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Japan, the world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the U.S., the world largest economy, use arbitrary definitions to measure only a fraction of their unemployment. China even does not try to measure its unemployment. This short essay proposes an objective definition of unemployment based on common sense, to more accurately measure Japan and the U.S.'s current unemployment, and to estimate the unemployment in China. It is the author's hope that this primary study of unemployment can stimulate further serious dialogue and research on this very important economics topic.

Keywords: unemployment, employment, Japan, the U.S., China

---

<sup>107</sup> This is a paper to submit for West Coast Japan Economic Seminar at UC Santa Cruz on August 1, 2004.

## 1. Re-define Unemployment

Japanese Economy has been a frequent and popular issue everywhere, and many Japanese words in economy, such as “keiretsu,” “karoshi,” have become English to describe Japan’s economy. It seems, however, that there exists almost no serious study about Japan’s unemployment from an objective perspective, neither inside nor outside of Japan.<sup>108</sup> As in the U.S. or everywhere, economists have to follow the governmental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because, first of all,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the process from raw data generation to result publication of the unemploymen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study Japan’s unemployment objectively from the common sense in Japan. Instead, it created a concept of “complete unemployment”<sup>109</sup> to replace what people commonly understand as “unemployment”. According to Japan’s Statistics Bureau,<sup>110</sup> if a person in Japan worked “sukoshidemo” (any time in any method) during the last week of a month, he/she was counted “employed” in that mon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adically redefines employment in Japan: if, in a month, you received 600 yen for one-hour “arubaito” (temporary work) in a store in the last week,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ounts you “employed” last mon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unemployment study only has interest in the so-called “completely unemployed” people, which is defined as: “during the survey week, among these who did not work at all but they

---

<sup>108</sup> Edward Luttwak’s *Turbo Capitalism: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9) has an interesting chapter “The Era of Unemployment” with a section on Japan. He wondered: “Yet unemployment did not exceed 4 per cent until 1998, amidst ominous talk of an outright depression, or even imminent economic collapse.” p.119.

<sup>109</sup> The word “kanzen shitsugyo” is not even a correct Japanese word. The Japanese public simply takes its value as “shitsugyo” (unemployment) rate.

<sup>110</sup> <http://www.stat.go.jp/data/roudou/qa-1.htm#Q09>.

could work, wanted work and actually sought work, and who could work immediately but was waiting for job-seeking result”<sup>111</sup>.

By the above definitio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onducted survey and published Japan’s “complete unemployment” every month. For example, in 2003 April, it was 5.4%.<sup>112</sup> People may wonder how Japan’s official unemployment rate is so close to that of the America. It is becaus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manipulated the definition and calculation to make Japan’s unemployment rate close to that of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 if these countries have close unemployment rate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laims that their definition and calculation follows ILO’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o objectively measure the reality of employment/unemployment, as othe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doing so.”<sup>113</sup> The fact is that although ILO suggests use a period of one week or one day to determine the employment status and also suggests use at least one hour as the work duration of an employment status, it does not define one hour work in the a week of a month as “employed” for that month.<sup>114</sup>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proposal to define and measure Japan’s unemployment. Although there are criticism o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al definition and calculation of unemployment, most criticism wan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follow the U.S. government, without realizing that the U.S. unemployment calculation is also based on subjective definition. According to the U.S. definition: “People are classified as unemployed if

---

<sup>111</sup> <http://www.mhlw.go.jp/toukei/kaisetu/index-1.html>.

<sup>112</sup> <http://www.stat.go.jp/data/roudou/sokuhou/tsuki/index.htm>.

<sup>113</sup> <http://www.stat.go.jp/data/roudou/qa-1.htm#Q09>.

<sup>114</sup> “Resolution concerning statistics of the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employment,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adopted by the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Statisticians, October 1982.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stat/res/ecacpop.htm>.

they meet all of the following criteria: They had no employment during the reference week; they were available for work at that time; and they made specific efforts to find employment sometime during the 4-week period ending with the reference week.”<sup>115</sup> “The unemployment rate includes only people within the labor force who are out of work” (Lawrence Summers, former U.S. Secretary of Treasury) only for a short period covered by unemployment insurance (usually 6 months). The above official definition explains why many unemployed people (the so-called “not in labor force”, NILF) were not counted as unemployed. The American characteristic of unemployment definition is to select and include only “involuntary”<sup>116</sup> unemployed people (such as those receiving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for the unemployment calculation.<sup>117</sup> It seems the American economics becomes a science of morality in regard of unemployment, based on economists’ subjective judgment on other people’s economic life.

In fact, opposite to the U.S. arbitrary use of unemployment, the above mentioned ILO resolution especially clarifies: 10. (1) (c) "seeking work" includes not only from governmental agencies but also including “seeking assistance of friends or relatives,” which never comes to any governmental statistics.<sup>118</sup> (2)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conventional means of seeking work are of limited relevance, where the labour market is largely unorganised or of limited scope, where labour absorption is, at the time,

---

<sup>115</sup>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empsit.tn.htm>.

<sup>116</sup> Note that here, “voluntary” or “involuntary” is not determined by the person to be counted, but to be decided by the official economists.

<sup>117</sup> For example, Richard G. Lipsey, at al., *Macroeconom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90 (Ninth Ed.)

<sup>118</sup> In fact, if you are unemployed, y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clearly know that you are seeking job without your asking them help. Whether an unemployed person is seeking work is not a matter of ILO or any governmental/NGO agency to define unemployment.



inadequate or where the labour force is largely self-employed, the standard definition of unemployment given in subparagraph (1) above may be applied by relaxing the criterion of seeking work.”

From the above three definitions of unemployment, it becomes obvious that unemployment is a very complicated issue. There are many points to be improved in existing measurements. In the case of Japan, since it's supposed measurement is the monthly unemployment, an employment status in a month could be defined as “worked more than 100 hours in the last month,” which can provide the minimum income for an employed people's basic need to live in one month. If an “employment” cannot even provide the basic need for a human being, it is not employment at all; It is unemployment. Furthermore, since different people earns different income in a same period, the minimum working length counted as employment differs depending on people's employment status. If we push this issue further, we can adopt the simplest method: let people themselves decide whether they are employed at the time of interview (or any time), by selecting one item from three statuses: employed, unemployed, or N/A.

This is not to suggest abolish existing definitions. We admit that different definition has its own merit, at the meantime it is also clear that there will not be a universal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unemployment as long as we think this issue subjectively. Here arises the alternative methodology: to define and measure unemployment from the opposite employment status. Compared with the too complicated unemployment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the employment concept, data and measurement are relatively simple and accurate. Here is the new definition:

$$U = 100\% - E$$

where U is unemployment rate; and E is employment rate.

This definition provides the primary understanding of unemployment, and we can break down further the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parts

among the unemployed, if we want and we can do so. Now, to study of unemployment, we only need to measure how many labor forces are employed. No ambiguity. No moral judgment involved. No need of further explanation to confuse or mislead the public. It simply indicates that at a designated time, at what a level, the society provides employment to its labor force population. Is an unemployed happier or more miserable than an employed? We don't know; we don't need to know; and we should not know. It is not a matter of the objective-oriented science of economics.<sup>119</sup> It belongs to sociologists, psychologists, theologians, or the imagination of politicians.

## 2. Measure Japan's Unemployment

All statistical data are obtained and published under certain guidance and definition. There is not existing data specifically to accurately measure employment. However, we can utilize them for our purpose to calculate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as accurately as possible. Among the huge volume of published data about Japanese economy, we find detailed data in 2000 sufficient to measure its unemployment.

According to Japan's Statistics Bureau, the population of 15-64 years old is 85,997 thousand.<sup>120</sup> Among them, 8,833 thousand are students.<sup>121</sup> Japan's labor forces are  $85,977 - 8,833 = 77,164$  thousand. At the meantime, the total employed population are 62,894 thousand, with 4,910 thousand

---

<sup>119</sup> Economics is far from a science. However, since even the most accurate science (Physics) is not an accurate science (from Heisenberg's uncertainty law) and even the study of politics is called "Political Science," we don't need to bother this usage.

<sup>120</sup> <http://www.stat.go.jp/data/kokusei/2000/sokuhou/01.htm>.

<sup>121</sup> <http://www.stat.go.jp/data/kokusei/2000/sokuhou/10.htm>. This i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15 years over, but we can reasonably say their age is under 65 years old.

over 65 years old.<sup>122</sup> So the 15-64 years old employed population are 62,894-4,910=57,984 thousand.<sup>123</sup>

Among these employed, 4.9% worked 1-14 hours a week.<sup>124</sup> These people are mainly temporary workers without sufficient income to support themselves from their work. If we assume people working more than 15 hours a week as employment, we have the employed population  $57,984 \times (1 - 4.9\%) = 55,143$  thousand, thus Japan's employment rate is  $55,143 / 77,164 = 71.5\%$ .

We conclude that Japan's unemployment in 2000 for 15-64 years old people, who do not work longer than 15 hour a week, is 28.5%. This is about 6 time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al "complete unemployment" rate of 4.7%.<sup>125</sup>

### 3. Measure the U.S. and San Jose's Unemployment

According to U.S. Census Bureau, in 2000, there are 217.2 million population of 16 years old and over; among them 129.7 million were civilian employed, 1.2 million are in the armed forces,<sup>126</sup> and 33.9 million are enrolled in school.<sup>127</sup> So the employment rate is  $129.7 / (217.2 - 33.9 - 1.2) = 71.2\%$ ,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28.8%.

---

<sup>122</sup> <http://www.stat.go.jp/data/kokusei/2000/sokuhou/04.htm>.

<sup>123</sup> There are about 240 thousand Self-defense forces, who were counted employed.

<sup>124</sup> <http://www.stat.go.jp/data/kokusei/2000/sokuhou/07.htm>.

<sup>125</sup> <http://www.stat.go.jp/data/roudou/longtime/03roudou.htm>, item No.7 Excel format.

<sup>126</sup> <http://www.census.gov/prod/2003pubs/c2kbr-18.pdf>.

<sup>127</sup> <http://www.census.gov/prod/2003pubs/c2kbr-26.pdf>. 16.4 million in high school, 14.4 million in undergraduate school and 3.1 million in graduate or professional school.

The U.S. census used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employmen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Labor'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which has been criticized from many aspects.<sup>128</sup> The census questionnaire asked: "Last week, did this person do any work for either pay or profit?" and counted employment if this person worked more than 1 hour in four weeks. This is close to Japan's definition. The measurement includes population over 65 years old, which lowers employment rate. At the meantime, if we want to measure people working longer than 15 hours a week (the census survey does not have the breakdown of working hour), the U.S. employment will be less. As the first step to measure America's unemployment in the high peak of the decade-long economic prosperity in 2000, we now know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about 30%.

Let's see a special case to testify the result by measuring San Jose's unemployment rate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same census data. We have the rare data to accurately calculate the unemployment rate of San Jose. As the capital of Silicon Valley, the city of San Jose represents the highest hi-tech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and it absorbed many employed labor forces

---

<sup>128</sup> Th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ndertakes a monthly survey of about 60,000 households, to generate the unemployment rate and voluminous ancillary data.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know to what degree these 60,000 households represent the total American population. To not make this issue more complicated, we assume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accurate enough to use. For example,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May 2003, Unemployment (Household Survey Data,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empsit.nr0.htm>, note that the site changes with current data) specifies: "In May, 1.4 million persons were marginally attached to the labor force, about the same as a year earlier. These individuals wanted and were available to work and had looked for a job sometime in the prior 12 months. They were not counted as unemployed, however, because they did not actively search for work in the 4 weeks preceding the survey. There were 482,000 discouraged workers in May, essentially unchanged from May 2002. Discouraged workers, a subset of the marginally attached, were not currently looking for work specifically because they believed no jobs were available for them."

into the city. According to the US Census Bureau Table DP-3, San Jose,<sup>129</sup> the employed population is 436,890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2.9%. On the other hand, the same source also shows “not in labor force” population is 225,511 (33.1%).

According to Table DP-1,<sup>130</sup> San Jose’s 15-64 years-old population is 61,487 (15-19 years) + 64,418 (20-24 years) + 160,945 (25-34 years) + 155,751 (35-44 years) + 111,383 (45-54 years) + 38,770 (55-59 years) + 29,163 (60-64 years) = 621,917. Among this population, 53,813 people are in high school, 73,669 in college or graduate school,<sup>131</sup> so the labor force is 621,917-53,813-73,669=494,435. From the employed population

---

<sup>129</sup> The following four links can be found from [http://www.ci.san-jose.ca.us/planning/sjplan/data/Census\\_2000/DPindex.html](http://www.ci.san-jose.ca.us/planning/sjplan/data/Census_2000/DPindex.html). Table DP-3 at [http://www.ci.san-jose.ca.us/planning/sjplan/data/Census\\_2000/Citywide\\_dp\\_pdf/demographic\\_char\\_2000-3.pdf](http://www.ci.san-jose.ca.us/planning/sjplan/data/Census_2000/Citywide_dp_pdf/demographic_char_2000-3.pdf) is “Profile of Selecte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2000” containing figures on income, poverty, employment status, occupation, industry, and commuting.

<sup>130</sup> Table DP-1 at [http://www.ci.san-jose.ca.us/planning/sjplan/data/Census\\_2000/Citywide\\_dp\\_pdf/demographic\\_char\\_2000-1.pdf](http://www.ci.san-jose.ca.us/planning/sjplan/data/Census_2000/Citywide_dp_pdf/demographic_char_2000-1.pdf) is “Profile of Gener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2000” containing counts of population by sex and age, race, Hispanic or Latino and race, type of household and relationships within households, and housing occupancy and vacancy figures.

<sup>131</sup> Table DP-2 at [http://www.ci.san-jose.ca.us/planning/sjplan/data/Census\\_2000/Citywide\\_dp\\_pdf/demographic\\_char\\_2000-2.pdf](http://www.ci.san-jose.ca.us/planning/sjplan/data/Census_2000/Citywide_dp_pdf/demographic_char_2000-2.pdf) is “Profile of Selecte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2000” including figures on school enrollme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marital status, veteran status, disability status, and residence 5 years ago.

436,890,<sup>132</sup> we have unemployment rate  $U=100\%-E=100\%-436890/494435=12\%$ .<sup>133</sup>

This measurement deserves further considerations. First, is the city of San Jose large enough to calculate the unemployment? Since the census data is based on residential condition, an area with large mobile population moving in and out is less meaningful to calculate the unemployment. San Jose's 894,943 population is large enough, but we have not the daily moving population data. It is more significant to calculate the whole Silicon Valley or Santa Clara county's unemployment, if possible. The second important argument comes from the accuracy of the data. The Census 2000 was the largest peacetime effort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a short form to ask every person of 281.4 million people and every housing unit of 115.9 million houses in the U.S. However, this 100-percent characteristics only asks name, household relationship, sex, age, Hispanic or Latin origin, race, tenure and vacancy questions. We cannot obtain employment status from it. The Census also has sample characteristics (long form, general 1 in 6 sampling) to ask additional questions such as labor force status, work status in 1999, which is the base to calculate the national total data.<sup>134</sup> Depending on how many people residing in a house, the long form takes half to several hours to answer. By experience, we know less-educated

---

<sup>132</sup> Table DP-3 [http://www.ci.sanjose.ca.us/planning/sjplan/data/Census\\_2000/Citywide\\_dp\\_pdf/demographic\\_char\\_2000-3.pdf](http://www.ci.sanjose.ca.us/planning/sjplan/data/Census_2000/Citywide_dp_pdf/demographic_char_2000-3.pdf).

<sup>133</sup> Since most people working in the economic field do not have basic statistical training, we usually read many "accurate" survey-based data. For example, an "accurate" rate 33.1% has the accuracy of  $1/331=0.302\%$ , which is nonsense from any survey. In the economic field, two-digit numbers are "accurate" enough, so we use 12% instead of 11.6%.

<sup>134</sup> <http://www.census.gov/prod/2001pubs/mso-01icdp.pdf>.

unemployed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refuse to finish the long form.<sup>135</sup> Certainly, censuses never include homeless people or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which are unemployed. We do not have their statistical data.<sup>136</sup> It is safe to consider that census data underestimates unemployment.

The other argument is the inclusion of 60-64 years-old population to labor force. The employed number 436,890 includes 60-64 years-old population (29,163) and 65 years-old and over. For people over 65 years old with out employment, it is natural to consider them “retired” rather than unemployed. Financially, most American retirement plans start from 60 years old, so unemployed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 should be considered retired.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most important retirement plans, such as in Medicare and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benefits begin for people over 65 years old,<sup>137</sup> so 60-64 years old is not a safe age to retire completely, and many people at this age need partial employment. In this regard, census data should specify the age for employed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

With the above discussion of caution, we reach our conclusion: the most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area at its economic peak has the lowest unemployment rate of 12% (in the U.S. and the world). This is four times

---

<sup>135</sup> I participated to the Census 2000 in the front as a data collector (interviewer) in April 2000. I met a philosopher. He gave profound reason to refuse filling the long form. I did not tell him that by law, the Census Bureau has the right to take action against him, because the Bureau itself is afraid of taking such actions.

<sup>136</sup> Richard Hobbs, “Bridging Board” Summer 2004: “About 10 millio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currently undocumented, according to the Urban Institute. Approximately one hundred thousand live in Santa Clara County, according to estimates from 2000 Santa Clara County study *Bridging Borders in Silicon Valley*.”

<sup>137</sup> People disabled can start receiving benefit early. See <http://www.cms.hhs.gov/medicare/>.

higher than the official unemployment rate. We can also assess that the U.S. unemployment rate of 30% is quite close to the reality.

#### 4. The Unemployment in China

There is no unemployment study in China. As a comparison, in 2001, China's "registered urban unemployment" is 3.6%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is 77%.<sup>138</sup> We cannot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China's unemployment is  $100\% - 77\% \times (100\% - 3.6\%) = 25.7\%$ , because among the "participated" 730 million labor force, 67.2% are in countryside, which are heavily under employed. China's urban hukou (residency registration system) does not include the explosive migration from countryside. To assess the employment in the countryside, we can only approach it from another route: the poverty population. There are 15 million population in absolute poverty with an annual income below 500 yuan, 90 million population in poverty with an annual income below 1,000 yuan, and 311 million population with an income between 1,000 and 2,000.<sup>139</sup> They amount to about half of the countryside population. From this fact that half population in countryside cannot support themselves with less than 2000 yuan (about \$240), we can analogize that half "participated" labor force in the countryside are unemployed labor force.

The 3.6% of "registered urban unemployment" does not include the so-called "daiye" (waiting for employment) youth and "xiagang"

---

<sup>138</sup> Chinese State Council (Government), *Chinese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Situations*. 2002 April. <http://www.china.org.cn/ch-book/429/2.htm>.

<sup>139</sup> Cited Wang Xuchao, President of the China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in Ming Pao, Hong Kong, 23 March 2003. Recited from Zhang Kai, "China struggling with acute issues today," *October Review* (<http://www.octreview.org>) June 2003.



(temporary off work) workers.<sup>140</sup> They are obviously unemployed. The ILO specifically defines: “Persons temporarily absent from their jobs with no formal job attachment and they were currently available for work and seeking work should be regarded as unemploy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 definition of unemployment.”<sup>141</sup> However, since we don’t have data on this population, we have to take the face valu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is regard. We calculate China’s employment as  $(32.8\% \times (1 - 3.6\%) + 67.2\% \times 50\%) \times 77\% = 50\%$ .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the same value of 50%.

## 5. Conclusion

The employment/unemployment rate is a vital indicator of a society to measure to what degree the society provides basic living condition to its labor force through employment. This short study proposes a new definition of unemployment, but the measurement is only primary due to data constrains. Nonetheless it shows: 1)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t the similar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Japan and the U.S.) have similar level of employment rate 70% and which is much better than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s 50%). 2) Japan in the long term of economic stagnation still has slightly lower unemployment rate than the U.S. in the economic peak.<sup>142</sup>

---

<sup>140</sup> It is reported there are 60 million xiagang workers, and this becomes the root of China’s various urban disturbances.

<sup>141</sup> “Resolution concerning statistics of the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employment,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5)” adopted by the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Statisticians, October 1982.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stat/res/ecacpop.htm>.

<sup>142</sup> Rather than the level of economy, I think the difference is mainly from employment system/laws. For example, even though under erosion for more than a

---

decade since the bubble economy, the Japanese still regard life-long employment a normal system. The Japanese courts still (loosely though) follow the so-call “four basic elements” to protect laid-off workers.

## Supplement

January 12, 2010

After I published this article, which was based on my short pieces of *Unemployment Redefined*<sup>143</sup> and *Unemployment Redefined: the Case of San Jose in 2000*,<sup>144</sup> I received some feedback. Barry Brooks told me: “I sent it to about 25 people in the U.S. Congress.” It is indeed the task of the U.S. Congress which has the power and obligation to request that the U.S. Labor Department take more scientific measures to provide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data about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There are other similar researche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Based on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January 1994, Dembo & Morehouse calculated the U.S. “Jobless rate” as 13.8% in 1993, 7% higher than the BLS unemployment rate.<sup>145</sup> Furthermore, they found “Jobless rate” was always about 7% higher than the BLS unemployment rate 1969-1993.<sup>146</sup> Their “Jobless rate” is much more accurate to measure American unemployment.

Unfortunately, the U.S. Congress, the U.S. Labor Department and the main stream economists did not listen to our studies. If the American public was provided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data on employment, the disaster of the 2007-09 economic melt-down could be reduced greatly. No wonder that eve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egins to use three measures to report

---

<sup>143</sup> *Comparative Policy Review*, June 2003.

<http://cpri.tripod.com/cpr2003/unemployment.pdf>.

<sup>144</sup> *Comparative Policy Review*, June 2003.

<http://cpri.tripod.com/cpr2004/unemployment.pdf>.

<sup>145</sup> David Dembo & Ward Morehouse,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Jobless and the Pauperization of Work in America”, p.15. New York: The Apex Press, 1994.

<sup>146</sup> *Idib.* p.16, Figure 1.

unemployment. According to a report *Economy Still Bleeding Jobs* by Justin Lahart,<sup>147</sup> the BLS unemployment rate was 10% in December 2009, the same as in November. However, he also mentions “a broader measurement of unemployment” including who have quit job hunting and who are doing part-time job, was 17.3% in December 2009, almost the same as in November (17.2%). These 7%-higher data were measured similar to the “Jobless rate.” Yet these numbers are not enough. The report also provides a graph showing “employed” rate (for people 16 years and older) dropped from 64% in 1999-2000 to 58% in 2009. Thus our conclusion is that the U.S. current unemployment is 17.3% to 42%, or 30%(±12%).

---

<sup>147</sup> WSJ January 9-10, 2010, p.1.

## 重新定义并测量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失业率

[译文摘要]

### 1. 重新定义失业率

经济分析不在本文的关注范围内，本文只是指出必须用一个新的指数来把握就业状况。与美国或别的主流经济学一样，日本的经济学者与政府配合，编造出人为的失业率来误导公众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日本用“完全失业率”这个概念来代替普通人的“失业”常识：按照日本统计局的定义，只要你在上一个月的最后一周得到任何一点工作报酬（例如，临时帮忙一小时得到750日元报酬），你上个月就“被雇用”了。

以这样的定义，日本2003年4月的“完全失业率”是5.4%。让我们向日本政府和御用经济学家们道贺：你们编造的数据与美国的同行们制造的数据很接近。

日本政府声称这个定义是按照国际劳动组织ILO的标准制定的。且不提ILO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反正不是为劳动者利益服务的），ILO提到在一天或一周内工作一小时来衡量一个人的雇用状况，但并没有说一个月的最后一周工作过一小时就算“被雇用”了。

比起日本政府，美国劳工部制造的失业率（被称为BLS失业率）也是一个“伪科学”的典型。它把那些没法进入政府统计数据的失业者（新到的移民、主妇、因绝望放弃或从来没有正式申报工作申请的人，等等）称为“不在劳动市场”NILF而排除在外，更不用提那些“非法移民”和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在社区学院登记的学生们以及处于半失业状态的“自营业家族”。

当然，如果我们认识到失业率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废除日本和美国政府以及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主流经济学的发明。如果有人定义“在一个月内挣到足以养活自己或家族的最低报

酬”为就业状态，明显更合乎常理。这里，我的逻辑很简单：每一个人最清楚他是否失业，测量任何时候的失业率也很简单：

$$\text{失业率}U=100\%-\text{就业率}E$$

感谢各国政府的大量就业的雇员，我们知道有多少人就业，就业率E容易测量到。

## 2. 测量日本的失业率

我现在只能找到2000年的数据。按照日本统计局，日本15-64岁人口为85,997（千人），其中8,833千人是学生。所以劳动力是85,977-8,833=77,164千人。这时，工作人口是62,894千，其中包括超过65岁的4,910千人。所以，15-64岁的工作人口是62,894-4,910=57,984千人。

这其中，有4.9%的人一周内工作1-14小时。可以认为这些临时工不能养活自己或家族，不被称为就业。所以，如果我们勉强断定每周工作15小时以上可以养活自己或家族，日本的就业人口是57,984x(1-4.9%)=55,143千人。这样，

$$\text{就业率}E=55,143/77,164=71.5\%$$

$$\text{失业率}U=100\%-\text{就业率}E=28.5\%$$

这是日本政府公布的“完全失业率”4.7%的六倍。

## 3. 测量美国与圣何西市的失业率

按照美国普查局2000年（美国经济高峰期）数据，美国16岁以上人口为217.2（百万，以下同单位），其中非军事部门雇用129.7，军事人员1.2，学生33.9。所以就业率是129.7/(217.2-33.9-1.2)=71.2%，失业率是28.8%。美国普查局的关于雇用的问卷与日本类似：“上周你做过任何得到收入或利润的工作吗？”如果你回答“是”，你就会被算作“就业”了。

让我们来看硅谷的中心圣何西市的2000年的失业率。按照美国普查局的数据，有436,890人就业，而BLS失业率是2.9%，因为这已经排除了“不在劳动市场”的225,511人(占33.1%)。

圣何西15-64岁人口是61,487(15-19岁)+64,418(20-24岁)+160,945(25-34岁)+155,751(35-44岁)+111,383(45-54岁)+38,770(55-59岁)+29,163(60-64岁)=621,917。其中53,813是高中生，73,669是大学生，所以劳动力应该是621,917-53,813-73,669=494,435人。这样，

$$\text{失业率} U = 100\% - E = 100\% - 436890 / 494435 = 12\%$$

这里也有进一步的因素：有许多在圣何西工作的人住在附近的小城市，无家可归或大量的“非法”移民不在统计之内，没有工作、英文不好的人不太合作回答问卷，等等。考虑了各种因素，可以说：在美国经济的高峰期，最发达的硅谷中心的失业率不低于12%，这虽然远低于全美的平均29%，但是是政府数据的4倍多。

#### 4. 中国的失业状况

中国政府的数据表明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是3.6%，同时劳动力“就劳率”是77%，是否可以说失业率为 $100\% - 77\% \times (100\% - 3.6\%) = 25.7\%$ 呢？不。

因为“就劳”的730百万人口中，有67.2%是农村户口。我无法知道“就劳”的农村人口如何养活自己或家族，只好假定平均在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就业”。这样，中国的就业率是 $(32.8\% \times (1 - 3.6\%) + 67.2\% \times 50\%) \times 77\% = 50\%$ ，失业率是50%。

#### 5. 结论

用符合常识的新的失业率定义，我们大概知道美日这样的发达工业国家的失业率近30%，而中国这样的经济成长大国的失业率为50%左

右。如果能够以这样的结果告知公众并以此制定相应的政策，整个世界经济和社会将得到多大的改善呢？

6. 补充（2010年1月12日）

Barry Brooks 读到我的这篇文章后，曾送给 25 个美国国会议员。如果国会知道美国失业率近 30%，他们一定会采取新的立法改变美国的经济政策，至少可以避免这一次经济大萧条。其实，早在 1994 年，Dembo 和 Morehouse 就提倡“无工作比率”Jobless rate（加入临时工和因绝望放弃或从来没有正式申报工作申请的人为“失业者”）代替 BLS 失业率。他们的对 1969-1993 的研究表明，美国的“无工作比率”比 BLS 失业率高 7%。

经历了这次大萧条，华尔街日报也不得不采用“更广义的失业率”（接近“无工作比率”）来报道美国的失业率。如 2010 年 1 月 9-10 日在“还在失去工作机会的美国经济”的报道中，就承认美国 2009 年 12 月的失业率是 17.3%，与 11 月（17.2%）差不多，比依然坚持“10%失业率”的美国政府还进步。同时，该文又图示出美国的实际被雇用率从 1999-2000 年的 64%左右降到 2009 年的 58%，说明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在 17.3%到 40%之间，或者说 30%（±12%）。要改善美国经济，首先必须从这个事实出发。



### 31. 四小时工作制与完全雇用

我在提交给2004年8月1日在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召开的“美国西海岸日本经济学会”的论文“重新定义并测量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失业率”中，用符合常识的新的失业率定义( $UE=100\%-E$ )，测定美国（正处于互联网经济高潮）、日本这样的发达工业国家2000年的失业率近30%，而中国这样的经济成长大国的失业率在2001年为50%左右。<sup>148</sup>遗憾的事，美国的经济学借口我不是“经过训练的经济学者”

(trained economist) 拒绝我的方案（好在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韦伯等也不是trained economist）。但是，在经历了2007-09“大萧条以来的经济危机”后，华尔街日报也不得不采用“更广义的失业率”来报道美国的失业率。如在2010年1月9-10日“还在失去工作机会的美国经济”的报道中，就承认美国2009年12月的失业率是17.3%，比政府和“主流经济学”依然坚持的10%失业率还客观。同时，该文又图示出美国的被雇率（这是很容易客观算出的）从1999-2000年的64%降到2009年的58%，实际上承认美国的失业率从36%升到42%。

今天，世界上的“经济学家”几乎都被国家权力或私有资本收买或雇佣，他们把雇用问题偷换为“市场”是否灵光的问题，隐蔽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制度的罪过。例如，2010年3月8日的Time周刊报道：在政府投入数万亿美元救急“市场”（“不能倒产”的大公司）的同时，华尔街2009年发放的奖金高达203亿美元，比2008年的174亿美元增加17%！华尔街之所以能够这样乘人之危，并不是市场是否公正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败。我在“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政治条件”<sup>149</sup>一文中引用到：“对于英美而言，自从八十年代撒切尔夫人一里根执政以来，把年金和退休基金完全开放给金融市场，让没有接触过股

---

<sup>148</sup> 本书 4.Re-define and Measure Unemployment in Japan, the U.S. and China.

<sup>149</sup> 本书 5.

票的几乎所有有固定收入的家庭，都通过共同基金的方式持有股票。据统计，美国家庭在1980年时只有5.7%持有共同基金，到2001年，此比率达到52%。在2001年，英美投入股市的年金和退休基金总额超过其GDP的半数，平均每个美国人投入股市的个人管理资金达到\$23780，而德国只是\$3800，法国只是\$1600”。而美国资本主义向金融帝国主义的转换更为明了：华尔街的头号金融帝国高盛集团连亚当·斯密（道德情操教授）的“政权、经商分离”的古典说教也顾不得了，干脆走上台前，派出原CEO鲁宾和鲍尔森到克林顿和布什政权（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当财务大臣！鲍尔森还十几次跑到中国，与总理朱镕基（和他的放弃大气物理专业投身金融行业的儿子Kevin Zhu）推动中国的“金融自由化”。2010年显现的希腊金融危机，也是高盛集团所为。国际经济问题，就是国际政治问题。

雇用问题被御用学者们偷换成“市场是否合理”的数字游戏，对于民众来说却是就劳的权利问题。我在“劳动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sup>150</sup>中指出过：“任何制度都必须确立在劳动权这个基本人权之上，只有这个基本人权获得了保障，才有可能为进一步的社会政治权益，如受教育权、基本医疗福利等提供基础。劳动权其实就是生存权，因为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希望、都必须劳动才能生存。不能提供、保障劳动权的制度就是不合理的、不道德的，也是反人类的制度”。更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完全雇用的社会：任何人有能力的人都必须工作、都必须有工作。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早在1793年，英国伟大的安那祺主义哲学家葛德文就在《政治正义与伦理》指出：“可以算得出，在英国只有不到二十分之一的居民实际从事于农业劳动。……由此可以知道，社会一切成员每天用半小时就足以供全体所需的物品。谁会对这样的劳动望而却步呢？”

---

<sup>150</sup> 本书 2.

<sup>151</sup>1886年，从监狱中出来恢复了自由的克鲁包特金就开始系统地研究经济问题，达到的结论如下：“各文明国家现今的经济生活都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sup>152</sup>他在安那祺主义刊物《反抗者》上连续发表论文，并于1892年印成一册，取名为《面包的略取》。<sup>153</sup>“假若全人类都来劳动，那么，每天只要劳动四五小时便够了。富兰克林在十八世纪之末便决定这劳动时间为五小时”（594页）。“凡是我们的房屋、粮食、街道、运输机关、学校、博物馆等等，你都可以自由使用，但是你从20岁到45岁或50岁这二三十年间，每天应该拿出四五小时来做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你自己去选择你所愿意加入的生产集团，或者另组织新的集团，但以从事必需的生产为限。其余的时间你可以用来和你所喜欢的人共同从事于娱乐、艺术、科学，总之，依着你自己的趣味的倾向去做就是了”（660页）。



当然，在克鲁包特金的时代，安那祺主义/社会主义者们与劳工阶级通过罢工、游行、抗议和坐牢等牺牲，正在争取每天八小时工作的权利（插图为1856年澳大利亚建筑工人协会的旗帜），四五小时工作制的社会，

还只是理想。

---

<sup>151</sup> 629-630 页。此书作为安那祺主义文库 B-1, ISBN:978-0-557-32714-0, 由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编辑出版发行，可在 <http://www.lulu.com/content/8369826> 网上购买。

<sup>152</sup> “社会变革与经济的改造”，1919年12月5日。此文收入安那祺主义文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书，由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编辑出版发行，可在 <http://www.lulu.com/content/7830605> 网上购买，也可以从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acr-2.pdf> 免费下载。

<sup>153</sup> 此书作为安那祺主义文库 R-2, 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书名，由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编辑出版发行，见上注。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跃，连“嫦娥奔月”这样的古老神话也变成四十多年前的老生常谈。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产业很像在半导体/计算机产业里著名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硬件计算速度每年提高一倍、生产成本每年减少一半）所描述的那样发展。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每天工作八小时，只是由每周工作六天减少为五天而已。这就是说，一个多世纪来，人类的社会组织，就劳动时间来衡量，只改进了六分之一。

实际上，特别在冷战结束以来，在欧美出现了不少要求缩短工时的运动。Take Back Your Time (TBYT, 夺回你的时间, [www.timeday.org](http://www.timeday.org)) 就是一个在美国、加拿大较为有影响的运动。他们把每年10月24日定为TBYT日，在全美组织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有一次在硅谷，由我任书记的Human Agenda (人类议程) 负责组织当地的活动，我们邀请TBYT日的发起组织The Simplicity Forum (俭朴生活论坛) 的负责人Cecile Andrews女士 (斯坦福大学的讲师，著有*Circle of Simplicity*《简朴循环》一书) 来交流，也推动地方政府官员通过一些无约束力的提案，希望在硅谷的公司能够减轻员工的劳动时间。当然，我知道，这有点“缘木求鱼”：我自己刚被Adobe Systems裁员，而我最后的工作就是写下工作程序，让留下的两个同事干我们原来三个人的工作。在日本、欧洲的企业试行的不裁员的work sharing (工作分享) 克服萧条方式，根本不可能被美国的大公司 (以及华尔街) 接受。2004年夏天我去芝加哥参加TBYT全国大会，与TBYT组织者John de Graaf交谈，感到他为人诚恳，很想能对他有所帮助。我在会上也和*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安那祺-工联主义评论 (ASR, [www.syndicalist.org](http://www.syndicalist.org)) 编辑Jon Bekken讨论过问题，带回他的《四小时工作制》小册子学习。Bekken是那种被爱玛·古尔德曼称为“美国无产阶级”的穷教授，在每一期的ASR上都呼吁我们捐款，一直警告说下一期没有钱出版了 (我注意到捐款人名单中常有乔姆斯基的名字)。所有的杂志都没有钱，更不用说安那祺主义中的工联主义流派在美国的理论刊物。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带有强烈的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 色彩的ASR内容本身不免显得单调、片面、过时。我把上述失业研究的文章寄给他考虑, 希望他把四小时工作制与完全雇用联系起来, 却从未得到他的回复。

这实际上也是TBYT、IWW 等运动或组织的局限所在。TBYT寻求美国工会的支持, AFL-CIO 的会长John Sweeney当然很高兴地表示:

“这正是我们一个半世纪以前就要求的东西, 可惜现在情况还这么糟糕!” 问题在于: 过去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人权, 主要矛盾是被雇用的劳工的工作条件; 现在要求四小时工作制的人权, 主要矛盾是现行制度不能提供、保障就业机会(特别是妇女)。现在, 加入私营企业工会的成员, 只占雇员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且, 他们对缩短工时的意义不一定理解、支持, 甚至会直接联想到自身收入的减少而反对呢! 当然, 我们提倡缩短工时、全面雇用, 是以确保绝大多数已经就劳的工人的现行收入为前提的, 但更关注失业者的地位。在美国, 失业问题又与移民问题密切相关。实际上, 在IWW(目前只有一千名左右成员)、AFL-CIO失去影响的同时, 上百万的墨西哥裔移民却在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工节涌上街头抗议游行。遗憾的是: 四小时工作制, 还没有出现在所有游行组织者的议程里(插图是2006年硅谷中心圣何西近10万人的五一大游行)。

正如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争取来的八小时工作制对社会进步带来的巨大影响一样, 四小时工作制和完全雇用, 这个一百多年前的人类理想, 也将带来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 人人都有工作、人人每天工作四小时(一年工作一千小时、一生工作30年)、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人类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知识学习、理性开化、艺术创作等, 免除巨大的浪费(包括找工作的艰辛)、解除威胁人类生存的核武器、常备军、环境污染、地球温暖化、恐怖主义等



等问题。当然，这将要面临巨大的阻力，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实现。但是，通过启蒙教育，人们必将认识到这是人类社会唯一的出路、前途，那么，这个理想就容易实现了。

四小时工作制！

完全雇用！

[2010年3月6日]

### 32. 乔姆斯基教授的限制性

乔姆斯基今年8月去中国访问。据说,《人民日报》称乔姆斯基访华“热度超过国家元首”,在乔姆斯基北京大学讲演并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时,北大校长声称,这是乔姆斯基教授难忘的一个夜晚,是乔姆斯基教授的“光荣”等,把乔姆斯基打整得如此廉价。倒是南方都市报比较诚实,以“日益高傲的中国显然还没有做好迎接这样一位伟大人物并与之深入对话的准备”、“你是否担心自己的一些比较激进的理论观点,会被世界上其它一些政府所利用?”等态度采访。据说乔姆斯基回答:“没有一个政权会喜欢民主因为民主牵制权力。因此任何一个政权都在防止民主。”“我的一些观点被某些国家有意利用是很有可能。很遗憾我对此无能为力。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也查了乔姆斯基的主要网上阵地

[www.zcommunications.org/zspace/noamchomsky](http://www.zcommunications.org/zspace/noamchomsky),幸好没有见到他访问中国的文章,至少在他自己控制的英文媒体上没有造成晚节不保的遗憾。

当我在1989年民主运动与北京和东京政权的斗争中成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最终不得不于1995年从日本流亡美国,在威斯康辛大学见到受学生热爱的安那祺主义者乔姆斯基(笔者在“作为外交政策的美国民主主义” <http://cpri.tripod.com/cpr1999/chomsky.html> 中记叙道:“向耶稣讲道一样”),感到自己来到了一个安全的所在。后来,我买下他的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书,进一步读到他的许多政治评论时,虽然知道国际政治不是他的专长(我没有读过他的语言学著作),但还是为他的道德精神感动。在他70岁生日时,我也与全世界的自由主义者一同为他祝贺。他那时思维尚敏捷,亲自回答网上的论坛提问,我记得在回答anarchism中文翻译等问题时,他说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行为。

我刚到美国的头几年,利用各种学术论坛,积极交锋。在外交关系论坛H-Diplo上关于乔姆斯基的角色的激论中,一个美国海军学院的教授指责乔姆斯基是“卖国贼”:我们这么多美军士兵在全世界用

生命“保卫自由”，你却坐在最高学府的最尊贵位子上谩骂我们，比任何敌人带来的伤害还大！一个乔姆斯基的好友、普林斯顿大学（另一个最高学府）教授坚决拥护乔姆斯基是最讲原则、几近殉道的知识分子。我以自己冷战后期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的背景，指出正是乔姆斯基这样的反对本国政府政策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存在，才使东方的知识分子接受、认同西方的文明价值和社会制度。从这种意义上讲，乔姆斯基才是最大的爱国者。

不过，从我的知识角度看，在进步、左翼、自由事业圈子里的乔姆斯基的时事政治评论无处不在，不免千篇一律、难免浅显偏颇。2005年我第一次访问波士顿，在MIT看到作为“品牌”的乔姆斯基的大幅画像，意识到美国“最高学府”的存在合理性（哈佛大学也雇用“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者”），我完全没有拜访他的念头，更愿意去“朝拜”1927年被麻省处决的两个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贫苦移民。我已经抛弃回到清华“创建中国社会学”的梦想或招摇撞骗成“中国政策研究祖师爷”（南开大学的邀请函），而坚定认为必须解散、摧毁清华、北大这些已经堕落为当代奴隶制（所谓“中国模式”）的精神帮凶机器。如果我不得已长期在美国流亡的话，正是我们这样的政治难民（以第一“建国之父”潘恩为代表）创造、发扬了美国的精神基础和价值体系，这正是我在美国选择清贫的生活面对权力（联邦政府）和金钱（大公司）的力量所在。

其实，乔姆斯基等西方的自由派人士，虽然卖力反对本国政府的外交等政策，却不可能改变、动摇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对于人类文明没有多大贡献。对于他们，“历史已经终结”（福山）。当然，如果乔姆斯基能够在十几年前神志敏捷时访问中国，虽然不能在监狱见到他真正的自由主义战士同志，也可以见到无处不在的“上访”冤民，至少不会象别的权贵（如江泽民、小布什，高尔）、大亨（如高盛集团）、骗子（如李敖）那样也跑到清华、北大这些摧残自由的交易处去凑热闹。当然，我也认识一些不了解中国而盲目支持北京当局的西方进步人士，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幻想，是支持他们反对本国政权的信念，不能崩溃。我早已学会不从理性上批判、



嘲笑他们，而更从感情上同情、尊敬他们。对八十多岁的乔姆斯基也该如此对待。看到乔姆斯基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并列在濒于停刊的曲高和寡的安那祺主义理论刊物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的捐助名单时，我的失望之情不翼而飞。

我在大学时期，从苏格拉底、斯宾诺沙、卢梭、马克思、克鲁包特金等西方知识分子影响了人生观，无意识地在寻求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典范，自然对安那祺主义者乔姆斯基产生最大的共鸣。不过，回想起来，自从我 1986 年离开中国，结识了不少日本、欧美友人，最值得尊敬的却是普通的退休管道工 Loz Dean 老太太。她年轻时加入过美国共产党，但后来主要参与工会活动，退休后加入劳动党（我与她同在圣何西支部开始了解她），被各界人士推选为主席为维持、重建圣何西市中心的综合医院而无私无酬无怨地奔波。从她那里，我学到美国民主制度、西方文明价值的真髓。与文凭不高的 Loz 这样的民众相比，“大师”乔姆斯基的知识（语言学）、半知识（政治评论）、反知识（被专制制度利用），完全可有可无了。我需要 Sklar 这样的务实律师帮助共同推进全球的人权进步，但再也不需要任何在有权势、名声的西方“思想家”分担我的思想使命和精神职责了。

别了，乔姆斯基教授。

[2010 年 9 月 8 日]

### 33. 支持巴勒斯坦的联合国成员国地位

在 9 月 23 日下周五的联合国总会期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终于摆脱傀儡的耻辱，不顾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将代表全体巴勒斯坦民众寻求安理会和总会承认巴勒斯坦的联合国成员国地位。在联合国的 193 个会员国中，已经有 2/3 赞同巴勒斯坦以独立的国家身份获得完全的会员资格。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从目前的“观察员地位”升格为“非成员地位”，那样只需要 193 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大会的简单多数支持就可以获得。即使只是成为“非成员地位”（但毕竟被承认为一个国家），巴勒斯坦也可以以独立国家的身份把以色列的国家恐怖主义告上法庭，在 ICJ 国际法庭等机构要求以色列解除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并开放西岸和加沙的领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在展开激烈的宣传战，其中的关键在于美国政府的態度。

我记得几年前参加圣何西和平与正义中心的 **Sharat Lin** 博士（他不懂中文）的讲演。他介绍自己年轻时到巴勒斯坦参与抵抗运动的经历，最后总结道：中东问题的结症在华盛顿，我们每一个在美国生活的公众都有责任迫使政府切断对以色列的援助、实现中东和平。这也是我几次参加犹太人社团活动、观察他们影响美国政治的方式的原因。我注意到自己经常是犹太人聚会的唯一非犹太人。<sup>154</sup>

2009 年 2 月，在奥巴马准备任命得到阿拉伯世界普遍支持的外交官 **Charles Freeman** 担任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时，在美的犹太人发起猛烈的反对运动。不明来源的人用 **Freeman** 与胡锦涛、沙特阿拉伯国王的合照，发动在美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们也来签名。我不是“领袖”，但有当代中日关系最黑暗历史的教训，有人问我是否签名，我很失望地希望他们应该与被压迫的巴勒斯坦民众站在一起。我不了解 **Freeman** 本人，但

---

<sup>154</sup> 例如，**Jing Zhao** “Watching Refuseniks”, March 8, 2009.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refuseniks.pdf>

他作为尼克松的翻译访华见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后来又担任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与这些国家的头头们拍过照，不足为奇。美国政府要任命国家情报官员，与我们中国民权运动有什么关系？这个任命结果不了了之，可以看出奥巴马的无原则的机会主义。

奥巴马 2009 年 6 月 4 日在开罗大学的讲演倒颇有新意，在提到巴勒斯坦时说道：“巴勒斯坦人民——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寻找家园的过程中历经苦难。60 多年以来，他们承受了流离失所的痛苦。许多人在西岸、加沙以及邻国土地的难民营里等待着他们从不曾过上的和平与稳定的生活。他们每天忍受着由占领带来的大大小小的羞辱。所以，毋庸置疑：巴勒斯坦人民的境况是不能容忍的。”<sup>155</sup>正是他的不同于前任的外交政策使他在上任的第一年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人们有理由对他寄予很高的期待实现美国中东政策的转换。

但是，两年多过去了，伊斯兰世界发生的革命推翻了阿里、穆巴拉克、卡札菲等独裁者，巴勒斯坦民众有理由期待变革，但他们还是处于不能容忍的境况，原因就在华盛顿。人们宽容地认为奥巴马要处理许多更急迫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全民医疗保险、世界金融危机等事务。那么，这一次，面对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所有阿拉伯联盟成员国）都期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多次表示支持（说这一问题已经“拖延太久”）的情况下，奥巴马只要顺水推舟、顶住犹太人的游说压力，举手之劳就可以“成名千古”了。

然而，奥巴马当局非常愚蠢地强烈反对推动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做法，称这样做会“适得其反”（激怒以色列、美国会取消援助）。奥巴马 9 月 12 日重申，如果巴勒斯坦完全建国的议案下星期在联合国大会开幕时递交给安理会，美国将使用否决权来加以阻止。美国的态度影响了本来不反对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欧盟。欧盟外交

---

<sup>155</sup> 引自赵京：“美国能实现中东政策的转换吗？”2009 年 7 月 26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obama\\_cairo.pdf](http://cpri.tripod.com/cpr2009/obama_cairo.pdf)

政策主管阿什顿说，欧盟目前没有明确的立场，即使巴勒斯坦这次没有加入联合国（实际上暗示加入不了联合国），欧盟不会“惩罚”巴勒斯坦<sup>156</sup>。看来，奥巴马最需要的是来自美国民众的呼声，帮助他拿定主意。

今天中午，我接到 **CBS 5 News** 关于美国是否应该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采访电话，感谢他们这时尽到了新闻机构的职责。我除了签署网上签名<sup>157</sup>外，决定用传真直接给白宫奥巴马（202-456-2461）呼吁。<sup>158</sup>

这封“关于巴勒斯坦完全联合国资格”的传真包括以下内容：  
一、呼吁奥巴马改变错误立场；二、1949年11月29日联合国总会第181号决议承认以色列建国的内容还包括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三、巴勒斯坦民众自从1948年和1967年被赶出家园的难民生涯以及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四、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和338号决议要求以色列退回到1968年以前的边界，2004年7月9日国际法庭对以色列非法占据巴勒斯坦领土的判决；五、美国在很多国际场合是唯一袒护以色列的国家；六、你的错误立场将让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再次确认美国政策的虚伪，丧失中东和平的良机；七、我从来没有投过任何人当总统，但这一次如果你采取正确和明智的决定，我下一次将破例投你一票助你再选。

奥巴马先生，请摆脱机会主义的政客打算，让人性、人道指导你的政策选择！

[2011年9月18日]

---

<sup>156</sup>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8, 2011.

<sup>157</sup> 这个网页也有中文：<http://www.avaaz.org/cs/>

<sup>158</sup>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letter\\_to\\_obama.pdf](http://cpri.tripod.com/cpr2011/letter_to_obama.pdf)

### 34. 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义者斯诺登

2001年我在 Adobe Systems 打工时，Adobe 的王牌产品 Acrobat 的一个漏洞被一个俄罗斯黑客<sup>159</sup>泄密，搞得 Adobe 非常恼火。当这个小伙子居然跑到美国来参加黑客会议时，Adobe 要求 FBI 逮捕了他！这可惹火了这帮安那祺主义倾向的团体，他们从洛杉矶赶到圣何西 Adobe 总部来抗议。Adobe 头头如临大敌，叫我们员工不许接触他们。这倒引起我的好奇，出去见识这些摇旗呐喊的好汉，听到他们的愤怒咆哮：“可耻 Adobe！自己产品质量不过关，还要动用国家权力来抓人！” Adobe 果然投降，赶紧请 FBI 放人。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安那祺主义黑客的组织力量，学到了在美国“no fight, no right”（权利必须争取才能得到）的道理，不过，这也埋下了我在“9/11”后被首当其冲裁员的远因<sup>160</sup>。

2004年我决定结束无国籍难民身份，也给小布什当局一个机会，试一试美国宪法是否灵光。结果证实自己处于无休止、无处申诉的被 FBI 黑箱操作调查背景的地位，也证实美国宪法确实被无法无天的“反恐战争”冻结了。有一天夜晚，我在圣何西会展中心的旗杆下独自徘徊良久，犹豫要不要在民主党大会期间切断绳索，降下美国国旗为宪法致哀。硅谷的反战运动高昂，我知道如果我“有幸”成为受难“公共人物”，劳动党、绿党、和平与正义中心、移民权益团体、宗教团体、劳工会议和县/市议会的朋友们会支援我，但我不是小布什“9/12 反恐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没有必要去唱主角。

---

<sup>159</sup>安那祺主义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称黑客也不是贬义。

<sup>160</sup>当天，所有公司头头和员工都仓皇离开，只有我一个正式员工坚守在总部大楼，与几个保安工人交换意见。以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批判，我知道总会有这么 blowback 一天的到来。我被裁员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全公司年度大会上，当所有员工站立为创始人鼓掌时，我不为所动，结果大家都把目光转向那个唯一坐着鼓掌微笑的卑微员工。我并不是富人权势的敌人，但更是贫苦民众的朋友。

正是我们的反战运动帮助奥巴马战胜了克林顿夫人并轻易入主白宫，我自己也在奥巴马上台后结束了十几年的无国籍难民身份。我们耐心地等待着奥巴马的行动，前不久，他终于宣布结束没完没了的“反恐战争”，要让宪法回到指导地位来。但多数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侵蚀已经麻木不仁，Edward Snowden 斯诺登的出现，正是对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当头棒喝。他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与他钦佩的、1971年向《纽约时报》泄露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和泄密给维基解密正在受审的一等兵布拉德利·曼宁一样，斯诺登“细心地挑选了外泄的文件，确保都是关系公共利益的材料。许多材料能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我没有泄露。伤害人不是目的，揭露真相才是”。艾尔斯伯格高度称赞斯诺登为美国民主体制做出了巨大的无法估量的贡献，并说自己等了数十年才看到“这样一位真正准备好以公民身份为他的国家冒生命危险的人，显示出战场上的人们该有的勇气”。其实，在历史上，连“建国祖父”、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的命名人潘恩都回不了美国，给香港一次机会光荣也未尝不可。

在香港的长毛同志的社会民主连线等已经动员民众，欢迎和呼吁当局保护这位当代自由英雄，不要污辱了香港“自由港”的名声。其实，最害怕斯诺登回到美国的正是美国有关当局，因为该受审判的正是这些权力机构，特别是在美国民众遭受经济危机之际用美国军事情报系统杀害、侵犯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以及美国平民的罪犯政策<sup>161</sup>。历史上，正是美国司法系统对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义者

---

<sup>161</sup>和平时期的军事机构的功能多用于情报收集。例如，西班牙内战期间，美国的军事观察员们最受共和政府的官员和民众的欢迎，得到最高的待遇到处收集情报，希望美国政府也能象国际纵队的林肯旅那样反对法西斯弗朗哥，但法西斯取胜后美国政府利用这些情报立即承认弗朗哥政府。Modern Warfare in Spain: American Military Observations o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ed. by James Cortada.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12.

的迫害（如芝加哥 8 位同志死刑、沙科和万塞提死刑、伯克曼 22 年徒刑等）唤醒了世界良知和正义，让我们拭目以待香港当局何去何从。

今天，谨以此文祝贺这位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义者 30 岁生日。

[2013 年 6 月 21 日]

### 35. 作为文明开化程度衡量的国家机构的透明化与民主化

不久前，我所在的社区召开会议，三个当地市警察（男）出席。警长（白人）向我们介绍负责我们社区安全的新上任的警察（白人），是伯克利大学英文专业的毕业生。另外一个经验丰富的警察是黑人。这个新开发的社区亚裔占多数，英文沟通非常重要，大家都很满意警察的工作汇报。随后，一个锡克教居民发言，介绍他有一天傍晚散步时被人用玩具枪差点击中眼睛，他当场报警后被急救车送往医院，才幸免留下后遗症。但是，当他向警察局查询时，被告知这不是一件值得立案追查的事件，警察局“不作为”不了了之。我们都同情他的遭遇，决议要问责警察局。锡克教的特殊衣俗很容易被美国主流社会歧视，9—11 之后，一个锡克教徒在加油站竟然被无辜枪杀。以我的经验，如果警察局或市议会里有锡克教徒，他们的安全就会被重视多了。

十年前，硅谷的安那祺主义青年小组在黑人将军鲍威尔的校园演讲时去抗议伊拉克战争，当地警察不抓白人、只抓了几个东南亚学生。有人想去警察局抗议，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我的一个在县政厅当官的原马克思主义者朋友出面疏通警察放人，特别不让留下“犯罪”纪录，免得这几个学生毕业后在美国找工作、转身份时遇到麻烦<sup>162</sup>。

前几天 5 月 28 日，在拥有 212 年历史的西点陆军校 West Point 背景下，奥巴马引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批判战争的愚蠢、倡导通过“人类制度的逐渐进化”实现和平，向穿着整齐制服的 1064 名毕业学员和家属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美国外交政策蓝图<sup>163</sup>。除了中文媒体广

---

<sup>162</sup> 赵京：“瓦德·邱吉尔对西方和平主义政治的病理分析”，2008 年 9 月 21 日。

<sup>163</sup>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5/28/remarks-president-west-point-academy-commencement-ceremony>



泛报道的“美国必须始终保持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等内容，奥巴马也提到“军事行动必须不带来更多的危险和敌人”、提高饱受责难的无人机“暗杀”政策<sup>164</sup>的透明度、以及军事行动的民主、人权目的。在提到中国最近在东海和南海的扩张时也批判美国国会的不作为：“尽管美国高层军事官员一再说，海洋法公约有助于提升国家安全，但国会参议院却拒绝批准这个公约，这让美国很难敦促中国根据公约解决海上纠纷。”不过，总的来说，场面相当冷淡，奥巴马有时要自我鼓掌以提醒听众他的讲话的重要性。而且，除了前言后语和“你们将有可能成为自 2001 年来第一届不用去伊拉克或阿富汗服役的军官”等个别片断，整个演讲与美国陆军的战略没有多少关联。当然，奥巴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除了面临裁减十个旅以及把独立作战单位从重装师向轻便旅的转换的命运，连美国陆军作为一个独立军种的存在价值本身，都可以讨论了。那样的话，西点就要搬到安娜泊里斯<sup>165</sup>去了。

实际上，随着大规模陆地战争可能性的减少，世界警察的角色主要靠美国海军（包括拥有航空作战力的海战军团或“海军陆战队”）来担当了。2014 年 1 月 30 日在海军校举行的别开生面的仪式，让未来的世界警察官按照他们的学业评定现场选择即将服役的舰艇<sup>166</sup>，很有透明性，多少让我们对世界警察“分配工作”的过程有所了解<sup>167</sup>。当然，对于担负世界警察使命的美国武装力量来说，与其在陆军校怀旧，不如在海军校听听退休“总司令”克林顿关于未来世界

---

<sup>164</sup> 赵京：“无人机的硝烟”，2012 年 5 月 28 日。

<sup>165</sup> Annapolis, 来自 Anna's place（安娜之地）。马里兰州府，美国海军校 U.S. Naval Academy 所在地。

<sup>166</sup> Naval Academy Future Surface Warfare Officers Choose First Ships  
[http://www.navy.mil/submit/display.asp?story\\_id=78893](http://www.navy.mil/submit/display.asp?story_id=78893)

<sup>167</sup> 我不由得想起自己 1985 年大学毕业时，因为思想独立、组织独立学生会选举被清华校方秋后算账，发配兰州、赶出北京的经历。

秩序的教导。他 2014 年 4 月 8 日对海军士官生 Midshipmen 的开讲<sup>168</sup>，除了为夫人将来的大选铺路外，倡导培养 3D (Defense, Diplomacy, Development) 人才，说明仅靠武力已经不可能维持美国的帝国地位了，最后特别向不爱读书的士官生们推荐三本 leadership (领导船舰-领袖资格) 书籍，值得普通公众也观看。我每次目睹类似相对公开的美国政治过程<sup>169</sup>，更坚定了阻止美国军事力量的年轻一代被安倍三世日本军国主义误导投入与中国的冲突的决心。

当我看到刚在新加坡闭幕的第十三届亚洲安全会议（也称“香格里拉对话”）上中日美官员们的闹剧，不由得回忆起 1992 年一个阴雨秋天，我在东京出席中日两国当局举办的庆祝“中日关系正常化 20 周年”会议，因为追讨被盗窃的关西 1989 年支援中国民主运动募到的捐款，被日本国立神户大学法学部雇用的中国学贼毒打。我当时紧握尖伞，浮现出耶稣、甘地被打的景象，一直忍受着直到被人拖开，后来到医院就诊，需要两周时间恢复。我随后到警察署报案，一个警视厅制服警察和一个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便服警察带我到现场拍照、记录四、五个小时，向我保证：日本是法治国家，一定要公正处理。过了几个周后，我没有接到任何联系，就直接再次造访警察署，却被告知根本没有我报案的纪录！更气愤的是：管辖神户大学的兵库县警“好意”转告我：“忘掉此案吧！如果你还要追究此案，日本政府可以把你定罪为“斗殴”，取消在留资格赶出日本！”与国立大阪大学曾经准备以“无完成学业可能”把我赶出日本的校园的做法同出一辙。那是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肮脏的一页记录。

我几年前在本地被有幸抽中为陪审团一员，但美国法官听到我与东京警视厅和日本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奇遇”以及联邦调

---

<sup>168</sup> <http://new.livestream.com/navy/events/2904612>

<sup>169</sup> 我在美国看的电视节目，主要是 C-SPAN 公共辩论、Charles Rose 时事评论和德国电视台。

查局好几年阻碍我申请得到一份护照的经历<sup>170</sup>，挥手免去了我的资格与责任，因为他们也怕如此经历会造成我对所有国家机构的“偏见”、鄙视。

非常痛心的是：我二十多年来对中日关系的悲观预测不幸成真，因为在不民主的政府与种族排外的当局控制下的中日关系，没有人权、自由的基础，连和平都不可及，何谈友好！25年前，杨振亚（大使）、唐家璇（公使）控制下的中国驻日机构指使学贼兼学奸混入学生运动，在日本人的“保护”<sup>171</sup>和策划下在大阪领事馆前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言“不承认李鹏伪政权”、叫嚣要“用血与火洗礼中国”、还要成立“流亡政府”等；但6月8日邓小平公开露面后又迫不及待执行北京的指令，勾结日本当局出卖迫害在日中国留学生，把我们赶出校园、赶出日本，暴露了在国家政权暴力下人性最丑恶的本性。

说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场民族悲剧，主要不是因为国内政治的诡秘变换、国际政治的肮脏交易，而是因为人性丑恶的势力靠欺骗、奸贼和暴力出卖、迫害和镇压了人性善良的愿望，把社会和文明拉向倒退和野蛮。从这一点上认清了事件的本质，才更清楚地理解这25年来的国内社会、国际政治的变迁，进而懂得为什么真正有历史价值的事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显现出人性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半野蛮、半开化状况。不管是中国的外交部/驻日机构、国家教委/大学，日本的地方公开警察或国家秘密警察、文部省/国立大学、外务省、法务省/外国人出入管理局，还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等我所

---

<sup>170</sup> 赵京：“宪法、共和，以及公民的权利与义务”，2009年7月15日。

<sup>171</sup> 日本政府因为在巴黎的七国峰会上签署了“保护中国留学生宣言”，文部大臣等在国会上也声称已经采取相应政策，最后只“保护”那个学贼，以神户大学法学部副教授的残羹向公共舆论显示其“保护”政策，利用这个学贼兼学奸迫害我们。

见识过的国家工具，都是人类文明尚未摆脱野蛮状态的证明。揭开历史真相<sup>172</sup>、推动国家机构的透明化、民主化不仅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文明开化程度的度量衡。

[2014年6月4日]

---

<sup>172</sup> 2009年9月23日民主党政权成立时，我致函首相鸠山，要求他公布1989年自民党执政时的把我们作为人质的对中交易资料：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

### 36. 美国海军海空陆特种兵队的战略使用

关于 The United States Navy SEAL teams 美国海军海空陆特种兵队（简称 SEALs 海豹），特别自从 2011 年 5 月 2 日突击猎杀本·拉登成功以来，成为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宠儿，中文媒体也广为喧哗<sup>173</sup>。但是，除了 SEALs 官方网站的宣传、主流媒体的神秘性报道、几部虚虚实实的电影以及个别经历者<sup>174</sup>的透露外，我们很难了解它的运作。在目前的美国军事预算大为裁减的背景下，只有特种兵和网络兵不减反增，更值得关注其战略/政策性使用。幸好，我们现在可以读到一本比较全面、通俗的介绍<sup>175</sup>。本文以此书为材料，简单回顾 SEALs 的战略问题。

在二战中诞生的 SEALs 前身 Underwater Demolition Teams 水下爆破队目的简单，相当于 Marines 海战军团的工兵，但 1962 年元旦正式成立的两支 SEAL 队（隶属于太平洋舰队和大西洋舰队）一开始主要是被开发来执行非常规战争、反游击战以及秘密行动，正好遇上越南战争。1963 年他们被派遣越南时听令于当时主导当地全局的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在湄公河三角洲与只有二战时缴获的简陋步枪的南越共产党游击队作战。虽然 SEALs 的队员们证明了他们的忠诚、勇气、凶

---

<sup>173</sup> 中文比较严肃的介绍主要从维基百科的翻译而来。有一些“中国特种兵击败美国海豹突击队”的编造，正好说明中国公众不了解 SEALs 的任务就是要避免格斗、战斗。

<sup>174</sup> 特种兵的规范要求退伍者不披露服役时的经历。有一个参加过陆军特种兵 Green Beret 的华裔美国人出版了他的失败从军经历，其中也发泄出对 SEALs 的嫉妒。Chester Wong, *Green Beret: Stories of an Asian-American Stumbling around U.S. Army Special Forces*, 2012.

<sup>175</sup> 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悍与牺牲<sup>176</sup>，以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最精锐尖兵<sup>177</sup>的炮艇加上武装直升机和炮兵的支援，SEALs 的战略战绩实在谈不上什么光彩，更多的是积累在注定失败的战争 war 中打赢战斗 battle 的战术经验。从战略上看，成本高昂的 SEALs 根本就不应该被投入到越南，而应该让低廉的南越本国军队去干——如果他们不能、不愿在自己的后方战斗，说明美国根本就不该介入该地区。由此可以看出，SEALs 一成立就面临着战略使用是否得当的问题。

美军自从越南战争以后所进行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 1983 年 10 月 25 日对英联邦一部分的格林纳达的入侵。SEALs 除了抢占电台等军事行动外，政治上的行动是在 25 日早上 6 点 15 分把 22 个队员从直升机上由绳索空降到英国女王任命的格林纳达总督 Governor General Paul Scoon 爵士的官邸，解除仅有的一个守卫（监视）警察的武装，等到第二天 7 点 30 分海海军团的到来，才于下午 4 点 0 分迫使总督签署了要求美国干涉的文件<sup>178</sup>。入侵遭到包括英国、加拿大在内的几乎全世界的抗议，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致电美国总统里根，抗议美国对一个独立小国的干涉。如果总督有足够的兵力和抵抗意志的话，SEALs 可能会把自身和美国的形象从世界警察变成世界侏子手。

---

<sup>176</sup> “While there may have been much wrong with some parts of the American armed service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it is impossible to level similar charges against the SEALs. The U.U. government may not have been able to enter peacetime with its honor intact but the SEALs certainly could.” 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133.

<sup>177</sup> “as the United States’ ‘tip of the spear’.” 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10.

<sup>178</sup> 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176-177.

1985年10月，美国情报得知绑架意大利 Achille Lauro 号船只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LO<sup>179</sup> 成员从亚历山大乘埃及航班逃走，在地中海派战机强迫埃及飞机降落在意大利的美国海军基地，SEALs 被运输机送去检查埃及飞机。但没有得到事先通告的意大利军方包围了 SEALs，重武装起来的双方差点干了起来<sup>180</sup>。1989年12月17日 SEALs 参与捉拿巴拿马“国家元首” Noriega 将军的行动，负责瘫痪他的飞机，付出不必要的伤亡。最后美国说服梵蒂冈交出逃进教皇领地的 Noriega，由美国药物执法局 Drug Enforcement Agency 出面把他抓回美国判刑。即便在得到联合国第 678 号决议“用所有必要手段”赶走伊拉克军队的 1991 年解放科威特的战争中，从事船只检查的 SEALs 唯一一次开火的情景是因为一艘满载两百名反战人士的船只试图突破禁运封锁线<sup>181</sup>。这些事例说明 SEALs 越来越多地面临国际政治的复杂局面，超出了 SEALs 自身能够及时独立判断处理的单纯军事功能。

小布什发动的“反恐”战争把 SEALs 推倒了巅峰，但 2003 年 3 月 26 日 SEALs 对伊拉克 Al-Qadisiyah 研究中心的突袭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武器 WMD<sup>182</sup>，没法得到美国政府最想得到的开战理由证据，因为伊拉克确实没有 WMD。被投入到一场政策性犯罪/错误的战争，还有什么荣耀可言？SEALs 最优秀的神枪手 Christopher Kyle（枪毙 160

---

<sup>179</sup> PLO 被美国定义为第一个跨国界恐怖组织，当然是因为美国在中东冲突中站在以色列一边。西德政府因为没有经验对付 Red Army Faction 红军派，也要靠 SEALs 制服恐怖分子。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215-216.

<sup>180</sup> 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220-222.

<sup>181</sup> 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204.

<sup>182</sup> 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234.

或 255 个敌人）在伊拉克战场第一次扣动扳机对准的是一名企图用手榴弹袭击海战队士兵的伊拉克妇女<sup>183</sup>。维基百科中文（但英文条目没有）提到：2012 年 7 月 SEALs 以伊斯兰女人头像当作战靶，被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American - Islamic Relations 抗议，几小时后美国海军宣布撤除这类型引发争议的战靶图像。我们没有读到操作手册之类<sup>184</sup>的文件，也不能确认这个消息是否属实，但它引发了 SEALs 在训练过程中为了克服军人的心理抵抗而灌输敌人意识的道德伦理忧虑。

猎杀本·拉登的成功似乎证明了 SEALs 的存在价值<sup>185</sup>。不过，这次成功除了腐败无能的巴基斯坦政府和军方的默认，也离不开情报的收集，而一个新的手段—无人机—正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情报收集兼目标攻击的功能<sup>186</sup>。与网络战一样，SEALs 和无人机的战略使用都面临新的国际法规范、道德伦理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不能只好奇 SEALs 的装备、战斗技巧和战术展开，更要关注美国和美国以外的国家<sup>187</sup>的 SEALs 等特殊行动部队的战略/外交/政治使用，让它们在国内服从透明、民主的统制，在国际上纳入公开的军控公约。

[2014 年 8 月 10 日]

---

<sup>183</sup>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_Kyle](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_Kyle)。纽约日报甚至报道说她当时还抱着小孩。

<sup>184</sup> 例如，刚进入海军校 U.S. Naval Academy 的学员要背诵 225 页的手册 Reef Points，也让公众知道/放心他们的生活规范。

<sup>185</sup> 本来军方也考虑用过 32 枚两千磅重的炸弹彻底炸烂本·拉登的楼房，但那样既无法证实本·拉登的死亡，也会引起巴基斯坦的更强烈抗议。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247.

<sup>186</sup> 赵京：“无人机的硝烟”，2012 年 5 月 28 日。

<sup>187</sup> 特别是以色列，其战争伦理往往超越人性的极限。



### 37.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治理的原点

2006年夏天，在硅谷圣何西市中心一家教会里举办过一场关于印第安原住民文化和安那祺主义运动的别开生面的晚会<sup>188</sup>。会场上也摆有不少安那祺主义书刊，其中有新出的The Blast影印再版<sup>189</sup>，撰写介绍的Barry Pateman现场签名。我犹豫了一下，没有购买，部分原因是因为知道自己正在被联邦调查局调查，阻碍着我的公民权申请，不想又加一些麻烦。对于国家来说，这个Blast（爆破、冲击）的名字就带来恐怖的联想。

我在“无政府主义对普遍政治自由的追求”中介绍过：“这些自由主义者中最著名的是移民自俄罗斯的犹太人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柏克曼和爱玛·古尔德曼。/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活跃着许多无政府主义的移民团体，但直到1892年5月发生在匹兹堡的数千名卡内基钢铁公司工人罢工才把柏克曼和‘赤恶爱玛’推向了全美乃至世界斗争舞台。为了筹款，爱玛不惜出卖肉体，而柏克曼的廉价手枪未能置卡内基公司总裁于死地，也使自己幸免于死刑。/比起在爱玛影响下铤而走险枪杀麦肯莱总统的无政府主义者Czoglosz，柏克曼认为自己的行动更符合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经济利益斗争中采取直接的行动‘宣传’）。”“那个接替卡内基担任公司总裁的‘无名之徒’（按照爱玛的话说，这家伙居然成为英雄柏克曼下手的目标，真是三生有幸）有权直接决定数千名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小的经济命运，他把工人们全部解雇并赶出了工人住宅。这一切必须受到正义的制裁，同时也警告整个贪婪无厌的美国资产阶级。既然美国政治制度不可能执行这

---

<sup>188</sup> 赵京：“西方和平主义政治的病理分析”，2008年9月21日。

<sup>189</sup> Alexander Berkman, 1916-1917. AK Press, 2005. 唯一可惜的是没有人重新编辑，列出索引。这个工作太艰巨。

种正义，柏克曼‘以身试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sup>190</sup>在我十年来与具有战略价值的美国、中国的几十个跨国公司交涉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柏克曼的身影，体会到柏克曼才是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治理的原点。

柏克曼在1916年1月15日的第1卷第1期The Blast声明从巴枯宁出发：“没有比摧毁更重要的了，所以The Blast是摧毁性的，所以The Blast是建设性的”。在短短一年半出版的29期（每期8页）、相当于一本大开本书的篇幅里，（提前释放）出狱的柏克曼正赶上世界大战动荡中美国政治社会的转换，以“革命劳工周刊”（实际上只能发行半月刊）的姿态横扫一切，在劳工法律案例（Caplan, Schmidt）、墨西哥革命（参见笔者对Magon兄弟的介绍<sup>191</sup>）、俄罗斯革命、爱尔兰问题、生育控制的宣传、通讯自由（反对美国邮局的审阅）、反战运动、无神论（特别是尼采的反基督教）等社会问题上大放异彩，比我来美国后读到的所有社会主义组织的刊物都冲锋陷阵、激励人生。例如，1916年5月16日出版的第1卷第13期刊登的意大利老战士马拉铁斯特对克鲁包特金等拥护英国击败德国的宣言的批判，成为安那祺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事例。1916年9月15日第1卷第19期转载了伊利诺州州长Altgeld无罪释放仍然在狱中的芝加哥干草市场安那祺主义受难者Fielden、Neebe和Schwab<sup>192</sup>的著名法令，至今读起来还感受到良知和理性的鼓舞。The Blast本身的命运，很像1916年12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22期中一个短小的记载所示。马公到旧金山来向一小群人介绍安那祺共产主义者在墨西哥的奋斗牺牲，会后一个人感叹道：“多么美好的梦想啊！-

---

<sup>190</sup> 赵京,2005年10月1日。

<sup>191</sup> 赵京：“墨西哥革命的良知和灵魂：安那祺使徒理加图·佛罗里斯·马公”，2010年6月17-25日。

<sup>192</sup> 赵京编《芝加哥的殉难者》，ISBN: 978-0-557-24143-9。

一只可惜无法实现。”“人类种族没有希望。”对此，The Blast 评论道：“但我们有马公兄弟这样的为了理想而生活的人，人类就有了希望。理想是人类进步的强有力因素。”这完全可以适用于 The Blast、柏克曼和安那祺主义者。因为反对征兵制，柏克曼和爱玛被判处两年徒刑，大战结束后被押解出境、遣送到俄罗斯，而在俄罗斯因为替克朗斯塔特的安那祺主义起义水兵<sup>193</sup>打抱不平，又被列宁“礼送”出境，成为这个世界的永久流亡者。

除了正面鞭笞国家权力和私有资本外，柏克曼还不断地向美国主流劳工组织呼吁，希望他们的支持和理解，但都是徒然。劳联-产联这些劳工组织本身会员率不断减少，那些脱产的职业工会官僚和雇员，不是像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劳工联合会那样，按照巴黎公社的自由原则组织起来，无法指望他们会动用劳工资源去与法庭、董事会对决。我自十年前与公司就人权等企业社会责任等治理问题交涉以来，多次寻求工会的合作，甚至主动在我的股东提案里加进他们的诉求帮助美国的劳工，但总是得不到正面回应。例如，“令我感到意外的是：SEIU 工会（有二百五十万会员）的代表不提人权问题，而是追问惠普董事会在收购英国软件公司 Autonomy 失败上的责任。我本来希望与他们合作，改进高盛集团、苹果公司等的人权政策，看来不能指望美国工会的律师和脱产专职人员了。”<sup>194</sup>

上面提到的高盛集团、苹果公司，今年我向它们提交的股东提案都被公司排除，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可了他们罗列的排除理由之一“不作为”，所以我只好在今年下半年再提交付诸明年的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了。与此同时，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

---

<sup>193</sup> 赵京编著《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 978-1-4583-0411-7。

<sup>194</sup> 赵京：“惠普 2013 年股东大会观感”，2013 年 3 月 20 日。

转型剧痛中必然产生大大小小的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等官商（官倒），却还没有出现一个自觉为劳工阶级奋斗牺牲的柏克曼。比起一个多世纪前柏克曼的牺牲，现在的自从大萧条以来制定的美国相关法规毕竟有所进步，我们没有理由不利用每一条可能的途径<sup>195</sup>，以“阿基米德杠杆”达到改善企业治理的 Blast（冲击波效应）。

[2015 年 1 月 31 日]

---

<sup>195</sup> 我不计代价在阿里巴巴上市的第一时刻购入几份“芝麻”股票，前天在阿里巴巴丑闻传出股价大跌时又购入“芝麻”股票，相当于买到了进入今年股东大会的两份门票，看看到时如何敲开阿里巴巴这个代表国际官僚•买办•资本的企业治理大门。